

復興崗學報

第 117 期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復興崗學報

出版者：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地 址：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 2 段 70 號

網 址：<https://www.fhk.ndu.edu.tw>

電 話：02-28913140

發行人：陳育琳

編輯者：「復興崗學報」編審委員會

主任委員：傅文鎬

副主任委員：彭成功 潘中庸

總 編 輯：蔡萬助

編審委員：王嵩音 余振民 李昌國 胡正申

范世平 馬振坤 郭育仁 程淑華

陳世民 傅文成 黃葳葳 羅至美

執行編輯：茆家麒 邱保龍 孫懋嘉 荊元宙

陳育正（以上均按姓氏筆畫排序）

封面設計：胡定傑

展售處：

五南文化廣場：400 臺中市中山路 6 號

電話：(04)22260330 網址：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104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www.govbooks.com.tw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出版

中華民國 50 年 6 月創刊（半年刊）

定價：新台幣 500 元

其他類型版本：無



本著作係採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臺灣授權條款

GPN: 2005000025

ISSN: 0429-8063

目 錄

復興崗學報 117 期目錄

後疫情時期之中共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新興趨勢及其侷限	黃秋龍	1
匯流趨勢下的軍事傳播研究：再思媒介生態學當代意義	馬祖耀	25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之職能導向初探	錢淑芬	53
從人力資本理論觀點淺析中國大陸人才戰略之發展與效益	邱勝浩	87
中共對台操作「輿論戰」之研究	洪銘德、黃恩浩	113
我國新南向研究之期刊計量分析	尹新豪	147

復興崗學報 117 期 109 年 12 月

復興崗學報

民 109 年 12 月，117 期，1-24

後疫情時期之中共武裝力量 多樣化運用新興趨勢及其侷限

黃秋龍

展望與探索月刊研究員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兼任副教授

摘 要

當全球還正面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中國大陸則相對處於後疫情復甦時期¹。中共正藉武警海上維權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軍事「口罩外交」國際公共產品，與複合「一帶一路」建設戰略需求，推進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簡稱：武力多樣運用)新興形式。本文選擇與研究題材特性相關的霸權／主導權(Hegemony)分析概念，解釋武力多樣運用形塑的霸權，如何取得解構空間，以及為什麼霸權復歸會伴隨著侷限性。研究發現，因著美國與盟邦夥伴關係疏離化與戒除(Abstain from)多項國際領導職能，以及國際強權(Great powers)與大國(Major powers)，對推動類似公共產品之意願或能力相對缺乏，進而讓中共外展國際活動空間得以解構。由於，或因其外展動機多出於自利與經濟現實考量，導致經常被理解為係「銳實力」政治影響力滲透，甚至與國際公民社會互信、共同安全責任感的社會形構條件顯得不足。從而，其霸權在國際社會關係再生產上的復歸上，出現反轉成侷限霸權主導優勢之難題。

¹ 所稱疫情係指 2019 年底以來，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所引發的疫情(亦稱武漢肺炎)，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命名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中國大陸則稱之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亦稱新冠肺炎、新型肺炎)疫情。

後疫情時期之中共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新興趨勢及其侷限

關鍵詞：《武裝警察法》、霸權／主導權、「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公共產品、軍事「口罩外交」

黃秋龍

Evaluating the New Rising Trends and Limits Based on the PRC's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Armed Forces in the Post-COVID-19 Era

Chiu-Lung Hua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Institute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ROC

Abstract

When the world is still facing the COVID-19, the Mainland China is in a post-epidemic recovery period. Meanwhil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s deployed the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armed forces which includes maintaining national maritime rights by People's Armed Police, promoting military "Mask Diplomacy", and strategically supporti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adopted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hegemony analysis framework and tried to explain how the hegemony shapes deconstructive domain and understand the hegemony's returning limi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ed tha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seems to alienate allies and abstain from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the Great powers are relatively lack of willingness and capability to promote global public goods, the PRC is therefore able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space. Because the PRC's expanding operations are generally tied to its economic status and self-interests, it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the "sharp power's" political infiltration,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formation to shape global civil society consensus and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As a result, when bring the "PRC hegemony" back in global social relations of reproduction, it turns to different problems limiting dominant hegemony.

後疫情時期之中共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新興趨勢及其侷限

Keywords: “People’s Armed Police Law”, Hegemony,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Global public goods, Military “Mask Diplomacy”

壹、前言

中共自 2019 年底以來，在面臨「疫後綜合症」、「港版顏色革命」、「美中科技冷戰」、南海爭端等等的國際政治博弈、軍事摩擦與外交攻防特殊時刻，卻將武力多樣運用領域－武裝警察部隊防範處置恐怖活動、海上維權執法、搶險救援和防衛作戰，於 2020 年 6 月 20 日，藉由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武裝警察法》(簡稱《武警法》)進一步明確化。不僅時機敏感特殊，更將對亞太周邊與臺海安全情勢造成影響。尤其，正當我國與全球投入防疫之時刻，更值得世人正視共軍武力多樣運用的新興趨勢，特別是涉及武警海警海上執法，以及共軍「口罩外交」(Mask Diplomacy)的策略動向，究竟存在哪些特殊與現實性。

貳、問題意識與研究概念

一、問題意識

事實上，中共自 2013 年 4 月 16 日發布《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以來，由於對內維穩、境外維持和平、反恐怖主義等非戰爭性軍事行動，涉及侵害人權普世議題或藉以對外擴張政治影響力之疑慮，從而經常伴隨國際社會負面評價與區域安全風險疑慮。相對的，中共仍不斷調整武力多樣運用戰略部署與行動策略，除了複合「一帶一路」經濟開發與基礎建設手段，甚至以外展式國際公共產品，做為武力多樣運用之新興形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以「經濟治略」(Economic statecraft)做為獲攫取武力展示與擴張外交影響力槓桿的形式，卻因此被識者視為美「中」關係的根本性變遷(Evan S. Medeiros, 2019, p. 99)。考察其所驅動的新興動力與方向，若仍以轉移內部矛盾或大陸生產力過剩輸出等取向來認知，將顯得片面而狹隘。鑑此，本文問題意識以為中共在後疫情階段，雖在武力多樣運用上取得優勢，為何卻同時面臨霸權擴張的侷限或難題。從而，將嘗試從外展式趨勢發展與架構性視

角，進行題材與問題之觀察解釋，期望能對主題意識之理解，更具有啟發意涵。

二、研究概念

對中共武力多樣運用題材與問題之理解，不僅有陷入因情緒、成見、價值觀等感情因素的語意謬誤，傾向為其進行負面評價，並引發貶義，認定其所複合的「一帶一路」建設也充滿風險。然而，卻未必能充分解釋為什麼既然「一帶一路」建設充滿風險，還能持續結合境外非戰爭性軍事行動。亦即，「一帶一路」建設究竟如何從基礎建設擴張到 5G 市場開發，以及除了傳統海陸線之外，為什麼又能延伸出冰上絲綢之路，更向中南美洲擴張；甚至，又複合「口罩外交」非戰爭性軍事行動，以國際公共衛生安全治理的公共產品，做為武力多樣運用之新興形式。易言之，對此主題事實進行分類，已無實質意義。故而，除了經驗可觸及的實體之外，理應同時存在一定的政策意涵，甚至是一種外展趨勢與影響力之擴展，需要藉由解釋，才能發現其特殊意義。

鑑於國際公共產品(Global public goods)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和非競爭性(Nonrivalrous)的特點，是成本和獲益超越國家藩籬、跨越多世代、跨域社群的共用產品。典型的國際公共產品，包括：穩定的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開放的國際自由貿易、良好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安全保障體系與公海航行自由等。而今，國際公共產品概念，已被應用於分析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指涉世界和平、區域合作、自由貿易、經濟增長、金融穩定、環境保護、病疫防治、智慧財產權保護、度量衡與標準的統一等易於產生重大外部效應的國際公共產品，並成為經濟全球化與國際關係的重要新興議題，對全球治理、國際安全產生深遠影響(Boundless Economics, 2020)。由此看來，國際公共產品既反映著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甚至說明生產該產品的意願能力是否對稱之社會關係；其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過程，並非建制於單一制度或純粹理念；它更因為在意象、影響力、價值觀上，對公共產品或物質層面上的優勢宰制(Dominant power)，而在世界秩序結構中形塑霸權／主導權(Hegemony)。因而，在國際霸權研究題材上，經常應用生產之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社會形構與世界秩序結構，做為三項分析層面

(Brian C. Schmidt, 2018, pp. 14-17)。由於，彼此在相互適應中，又會有條件制約；霸權既不至於無限上綱為帝國主義，卻又存在相對侷限或難題。

從而，本文研究概念，首先是就經驗歸納與理性認識的基礎上，描述新修正《武警法》與新興武力多樣運用趨勢。其次，衍繹其政策意涵，透視武力多樣運用的現實性；進而運用外展研究方法，從歸納武力多樣運用新興形式，再觀察解釋其外展趨勢，是否與國際強權或大國，對推動類似公共產品之意願或能力相對缺乏有關。最後，則從外展趨勢解釋共軍武力多樣運用，何以因此得到空間解構，同時卻又在霸權復歸上，面臨侷限或難題。

參、新修正《武警法》與新興武力多樣運用趨勢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王寧，於 2020 年 4 月 26 日，向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做修正《武警法》草案說明，稱該法「自 2009 年 8 月 27 日頒布實施以來，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衛人民美好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武警部隊依法履職和全面建設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據。隨著國防和軍隊改革不斷深化推進，現行人民武裝警察法已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需要重新修訂完善。」(聯合早報，2020)隨後，該法於同年 6 月 20 日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19 次會議修正通過，並於同月 21 日起施行(人民網，2020)。

新修正《武警法》，共 8 章 51 條，包括總則、組織和指揮、任務和權限、義務和紀律、保障措施、監督檢查、法律責任、附則等章(人民網，2020)。其中對武警領導體制、任務職責、兵力調動等方向進行調整，不僅有其特點與政策取向意涵，更隱喻維護「習近平核心」與政權穩定的政治現實。未來武警維穩、境外與跨域執法能力，將對我國與區域安全構成影響。

一、新舊《武警法》修正重點比較

新修正容主要是增加「組織和指揮」一章，將「任務和職責」一章調整為「任務和權限」；「總則」部分明確規定武警部隊擔負執勤、處置突發事件、反恐怖、海上維權執法、搶險救援和防衛作戰任務，並在「任務和權

限」章，細化執勤任務範圍規定，增加處置突發事件、反恐怖和搶險救援的任務範圍規定，對海上維權執法任務和防衛作戰任務做出援引性規定。同時，為適應武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和軍隊監察體制構建的實際，強化對武警部隊權力運行的監督，於第 6 章「監督檢查」明確中央軍委監察委員會、武警部隊各級監察委員會是人民武裝警察執行任務的法定監督機關，在執行執勤、處置突發事件、反恐怖、海上維權執法、搶險救援任務時，接受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社會監督(人民網，2020；中國網，2009)。

首先，第 1 章「總則」，將武警原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實行統一領導與分級指揮相結合的體制，修正為「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由黨中央、中央軍事委員會集中統一領導。」(第 2 條)；新增「武裝警察部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按照多能一體、維穩維權的戰略要求」(第 3 條)；原安全保衛任務以及防衛作戰、搶險救災、參加國家經濟建設等任務，明確為「六位一體」—「擔負執勤、處置突發社會安全事件、防範和處置恐怖活動、海上維權執法、搶險救援和防衛作戰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賦予的其他任務。」(第 4 條)(人民網，2020；中國網，2009)。

其次，第 2 章「組織和指揮」，規定武警由內衛部隊、機動部隊、海警部隊和院校、研究機構等組成(第 9 條)；指揮體制由原「調動、使用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執行安全保衛任務，應當堅持嚴格審批、依法用警的原則。具體的批准許可權和程序「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修正為「平時執行任務，由中央軍事委員會或者中央軍事委員會授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組織指揮」(第 10 條)，並明確指揮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平時與人民解放軍共同參加搶險救援、維穩處突、聯合訓練演習等非戰爭軍事行動，由中央軍事委員會授權戰區指揮。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戰時執行任務，由中央軍事委員會或者中央軍事委員會授權戰區組織指揮。」(第 10 條)；原有關調動、使用武警，具體的批准許可權和程序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修正「批准許可權和程序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遇有重大災情、險情或者暴力恐怖事件等嚴重威脅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緊急情況，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應當依照中央軍事委員會有關規定採取行動並同時報告。」(第 12 條)(人民網，2020；中國網，2009)。識者所關切的原「中國海警局」職能角色轉

變，前係由公安部分管海警工作的正部級副部長兼任，與「國家海洋局」是「一個單位，兩塊牌子」，對外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進行執法行動，同時接受公安部業務指導。然自 2018 年 3 月起，中共進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海警隊伍改隸武警部隊領導指揮，並調整組建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警總隊」，仍稱「中國海警局」(新華網，2018)。

再者，第 3 章「任務和許可權」，將原概括性的「安全保衛任務」規定，修正具體化為「執勤任務」(第 15 條)、「參與處置動亂、暴亂、騷亂、非法聚集事件、群體性事件等突發事件」(第 16 條)、「參與防範和處置恐怖活動」(第 17 條)、「參與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的搶險救援」(第 18 條)。協助政法任務，明確為「協助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執行逮捕、追捕任務，協助監獄、看守所等執勤目標單位執行押解、追捕任務，協助中國人民銀行、國防軍工單位等執勤目標單位執行押運任務。」(第 15 條第 7 款)(人民網，2020；中國網，2009)。

第四，對武警行使準司法警察職權進行規範，於第 3 章「任務和權限」第 20 條規定：「人民武裝警察執行任務時，發現有下列情形的人員，經現場指揮員同意，應當及時予以控制並移交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或者其他有管轄權的機關處理：(一)正在實施犯罪的；(二)通緝在案的；(三)違法攜帶危及公共安全物品的；(四)正在實施危害執勤目標安全行為的；(五)以暴力、威脅等方式阻礙人民武裝警察執行任務的。」第 26 條則明確武警境外執法規定：「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出境執行防範和處置恐怖活動等任務，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規定執行。」至於，海上維權執法任務，則由法律另行規定(第 47 條)。執行戒嚴任務，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規定執行(第 49 條)(人民網，2020)。

第五，於第 5 章「保障措施」第 32 條第 1 項，規範向武警通報情報訊息之規定：「為了保障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執行任務，中央國家機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依據職責及時向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通報下列情報信息：(一)社會安全信息；(二)恐怖事件、突發事件的情報信息；(三)氣象、水文、海洋環境、地理空間、災害預警等信息；(四)其他與執行任務相關的情報信息。」同條第 2 項，賦予情報訊息跨域數據庫職能：「中央國家機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建立情報信息共享機制，可以採取聯通安全信息網絡和情報信息系統以及數據庫等方式，提供與

執行任務相關的情報信息及數據資源。(人民網，2020)

概括看來，共軍新興武力多樣運用，不僅係以跨軍地、軍文關係改革，以及境外執法、複合準司法警察權與情報訊息跨域數據為多樣化表現形式。而且，若藉由近期美國詹姆士鎮基金會(The Jamestown Foundation)新建構的「隱形戰爭」(Stealth War)網站角度觀察，上揭多樣化表現形式，對應著特殊的戰略想定。亦即，在不對外(美國)公開武裝衝突前提下，優化使用經濟、網路與間諜等多樣手段，發展出超限戰(Unrestricted Warfare)規則(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0)。而今，美「中」強權間的撞擊，已進入後疫情時期，彼此對全球霸權與影響力之「隱形戰爭」，不可能戛然而止(Bonnie S. Glaser and Kelly Flaherty, 2020, p. 35)。其中，有關中共武力多樣運用新興形式之趨勢，勢必引起關注。

肆、透視武力多樣運用的政策意涵與現實性

中共論述多樣化軍事任務，在提出《2006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即已展開政策倡議，《2010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公布，亦曾宣示多樣化軍事議題，2012 年「十八大」報告中也宣示「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2013 年 4 月 16 日首度發布《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國防白皮書，承擔該白皮書擬制單位—中國軍事科學院國防政策研究中心，不僅具體闡釋武裝力量如何多樣化運用在政策議題上，影響共軍實際運作；而且，亦係首度結合安全戰略情勢，論述共軍戰略意圖與政策應用方向。時任擬制工作專家組組長、中國軍事科學院國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陸軍少將陳舟，認為武力多樣運用，係中共面對複雜多變的安全環境，首次公開武力多樣運用所需要堅持之五項政策和原則為：「一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和平發展的國家核心利益。中國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要堅持我們一貫原則，就是自衛原則。堅持戰略上的防禦、自衛和後發制人原則，就是我們講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其次，中國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必須是基於國家的核心安全需求，要以國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著眼維護和平，扼制危機和打贏戰爭。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第三要樹立綜合安全觀念，參加國家建設，搶險救災，維穩，打擊各種暴力恐怖活動，安保警戒任務，加強應急救援，

海上護航，撤離海外公民等行動能力建設。第四，深化安全合作，履行國際義務。中國武裝力量是國際安全合作的宣導者，推動者和參與者，是這次白皮書非常強調的一點。最後一點是要嚴格依法行動，嚴肅政治紀律。必須要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涉外的行動還要遵守聯合國的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要堅持在雙邊多邊條約的法律框架內行動，也就是說涉外的行動既要有合理性，還要合法性。」(中國廣播網軍事頻道，2013)

概括看來，武力多樣運用議題與政策應用，不僅在樹立綜合安全觀念，以及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能力建設；同時，也在為共軍對外爭取國際活動空間與形塑話語權，對內則在提高大陸社會對共軍之認同接受程度。質言之，也就是對內外部的意象、影響力、價值觀與霸權關係之社會形構，以及運用手段。證諸習近平在 2017 年「十九大」報告，即明確提出「新型安全領域」與「新型作戰力量 and 保障力量」相對應的形構觀念。事實上，其表現形式即係戰略預警、軍事航太、防空反導、資訊攻防、戰略投送、遠洋防衛等(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進而，以此參照未來武警非戰爭軍事行動，也與「新型安全領域」、「新型作戰力量 and 保障力量」有諸多互為對應之處。而今，武警海警不僅成為全球最大之武裝警察、海岸巡防力量，更擁有戰術運輸通用與攻擊型直昇機(Joel Wuthnow, 2019, p. 4)，反潛機、運輸機(執行客貨、防護、測量、巡邏、勘察、救護、跳傘等任務)，以及 2,000 至 10,000 噸排水量海警艦(配置水砲、集束防暴彈、發煙霧彈、導航等設備) (Michael Green, 2016)、大型登陸艦、飛彈護衛艦、布雷艦、破冰船、電子偵察船等陸海空立體聯合執勤能力(Joel Wuthnow, 2019, p. 15;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p. 71)。

易言之，這不僅是中共藉非戰爭軍事行動策略，服務於武力多樣運用戰略構想；同時，具體實踐在武警海警的武力多樣運用形式，也對應著戰略預警、防空反導、資訊攻防、戰略投送、遠洋防衛等「新型安全領域」，以及「新型作戰力量 and 保障力量」。事實上，武警在 2002 年期間，即成立海外維和行動訓練中心，投入非戰爭軍事行動(Joel Wuthnow, 2019, p. 29)。基此，對中共而言，武力多樣運用同時複合著政策意涵與現實性，意謂共軍在爭取國際活動空間、形塑話語權，以及霸權關係之社會形構。一方面，可能藉由武力多樣運用的解構與復歸，做為外展非戰爭性軍事之動力。再方面，也可解釋共軍武力多樣運用新興趨勢的直接原因，顯然與國際強權或大國，對推動

類似公共產品之意願或能力相對缺乏，從而解構了共軍國際活動空間與形塑話語權場域。

伍、共軍外展武力新興趨勢及其解構

從國際霸權觀念的生產社會關係、社會形構與世界秩序等三項分析層面看來，可用以解釋當國際強權或大國，因對推動海上維權、軍事「口罩外交」等非戰爭性軍事行動，或「一帶一路」基礎建設所謂公共產品之意願能力相對缺乏時，從而讓共軍國際活動空間得以解構。再者，從國際霸權分析觀念看來，則同時揭示了中共霸權不至於衍生為帝國主義，卻存在著相對的侷限或難題。

一、中共武警海上維權行動具有現實性

中共新興海上維權行動，係將軍事行動與準司法警察權相互複合起來，並體現在《武警法》對武警執勤任務範圍的細化規定，增加處置突發事件、反恐怖和搶險救援的任務範圍規定，對海上維權執法任務和防衛作戰任務新增援引性規定。然而，中共卻將此複雜問題，不僅由武警海警統攝事權，更具體反映共產黨人的辯證兩重性，亦即武警既朝向「六位一體」聯合作戰能力，又可為反恐怖主義任務(《反恐怖主義法》第 71 條)與境外執法履行準司法警察權。尤其，有關執行打擊海上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海上治安和安全保衛、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漁業管理、海上緝私等方面的執法任務，對民主體制國家而言，因經常係涉及跨部門與多領域的複雜問題，更容易與中共威權黨國體制產生磨擦或爭議。不僅未來兩岸面臨海上維權執法問題可能質變，除涉及我政府跨部門與多領域協調問題，也將造成我方需面對武警海警，甚至中央軍事委員會等指揮機關。有關兩岸海上執法合作的「對接」與適法性等問題，以及如何避免出現兩岸聯手維護「國家海上主權」疑慮，都將影響兩岸互動意願與程度，從而產生反轉倒逼效應，限縮其海上維權執法效能。再者，中共將軍事與準司法警察權相互複合起來之

海上維權模式，未必契合周邊國家共同安全認知與執法措施，從而相對侷限其維權執法效能或產生難題。

固然，共軍武力多樣運用新興趨勢，多可指涉非傳統安全治理領域，並做為參與國際活動空間之形式與政策論述，然卻仍面臨著內、外部條件侷限。一方面，因為中共官方投入非傳統安全治理之獲利必然有限，而且公民社會參與空間與能力也相對落後又不足。再者，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中共參與非傳統安全治理之態度依然舉棋不定。而且，中共習慣採取國家對國家的國際合作傳統模式，然而許多非傳統安全領域或威脅，卻經常來自於非國家(Nonstate)與次國家(Substate)的新興行動者。相對於國際社會，中共不僅最為缺乏與新興行動者交往經驗，也更不願與其等互動。甚至，近年來中共與周邊鄰國之主權或海事權益爭端，也將限縮共軍非傳統安全政策實踐能力。鑑此，美國極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分析中共參與全球非傳統安全治理，即指出中共宣稱深化國際維和行動、人道救援、災難救助與航線安全維繫合作，其武裝力量之運用是國際安全合作的宣導者、推動者和參與者。然而，其動機多出於自利與經濟現實考量(Lucy Best, 2020)。質言之，也就是為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需求而服務。

二、共軍「口罩外交」呈現內外有別戰略模糊考量

在德國領先群倫的智庫，也是歐洲專門研究中國大陸之最具規模機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統計分析自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來，今年3月13至6月19日，共軍空軍已曾向46國軍隊提供防護服、醫療用口罩、額溫槍等防疫物資(Helena Legarda, 2020)；6月25日起，則新增對玻利維亞、古巴、厄瓜多爾、秘魯、委內瑞拉等中南美洲國軍隊提供防疫物資(人民網，2020b)。

然而，共軍「口罩外交」卻有其特殊戰略意涵，其一，擴張戰略目標：將目標除了由亞洲、中東、非洲等傳統的開發中國家，擴及到日本、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已開發國家，藉以展現中共黨國與共軍在全球戰略重要性上的企圖心。其不僅具體服務於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需求，對該建設中亞、南亞、非洲與中東歐沿線國家軍隊提供防疫物資；抑或援助

對中共參與國際組織、多邊論壇，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國家，做為戰略著眼，尤其是針對歐洲聯盟與聯合國。其二，兩條路線運動：黨國與社群媒體，對內高調報導傳播防疫物資援外，以及「中國」是控制疫情的典型，用來投射軟實力與形塑話語權；對外刻劃「中國」能成功控制疫情，並做為援助他國的負責任「國家」。然而，對共軍援外訊息則刻意保持低調，即使《解放軍報》亦一反常態罕見報導，或內容從簡掠過。可見，中共內外有別的战略模糊考量，除意在改變吸引外媒注意與博取控制疫情讚揚的「大外宣」制式作法；相對的，於 2019 年發布《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以來，更著眼於藉「推動構建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新型安全夥伴關係」，「積極發展對外建設性軍事關係，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軍事外交新格局」，以及「積極提供國際公共安全產品」(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培養具有自我風格的負責任國際大國意象之戰略考量。

即使，當前共軍援外防疫物資不夠透明，或未必能充分解決當地國醫療資源匱乏問題，甚至未見得能改善接受國社眾或公民社會對「中國」的刻板意象。值得注意且不同以往的是，中共欲運用軍事外交做為外交手段，對當地政治菁英尤其是軍事部門菁英，既在聚積善意又為「確保買入(獲得)」(Securing buy-in)。從而，共軍援外防疫係以軍事部門為標定對象，強化彼此軍事雙邊關係，刻劃成處於危機時刻有別於美國與歐盟，彼此做為重要且可信賴的夥伴。進而，藉由受援國之軍事菁英，支持中共所偏好的全球擴張意圖(Helena Legarda, 2020)。隨著「力爭到 2035 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政策宣示(人民網，2020c)，以及中共建政 100 年 2049 年之到來，設定「在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上成為全球領導者」(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p. 4)，共軍將打贏戰爭、取代美國之戰略目標(美國之音，2019)。而今，雖然正值美「中」關係持續惡化，卻既給予中共投資軍事外交下定決心，又因新冠疫情令共軍援外防疫處於最佳機遇。尤其，共軍「口罩外交」相較於制式的中共黨國「口罩外交」，即使顯得規模微型，卻隱涵道德訓示(Moralizing undertones)，並藉此拉近與中共中央的連結(Helena Legarda, 2020)。質言之，提供國際公共安全產品，對運用影響力重塑國際生產社會關係而言，可用以修飾「一帶一路」建設的煽動性(Inflammatory)，或依對象不同，進行特製化敘事(Narrative)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 p. 8)。

整體看來，當前中共武力多樣運用，之所以出現新興趨勢，固然因國際強權大國，對生產運用該等產品的意願能力不相對稱有關。尤其，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政府主政以來，不僅因與盟邦夥伴關係疏離化，導致國際秩序解構，進而讓中共取得外展國際活動空間機會；而且美國戒除多項國際領導職能，也使得中共藉機積極形塑國際話語權(Bates Gill, 2020, 108)。易言之，隨著國際強權大國間，存在不對稱之生產社會關係，相對解構了中共外展武力多樣運用的國際活動與形塑話語權空間，包括運用所謂的武警海上維權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軍事「口罩外交」國際公共產品、非傳統安全治理等形式。同時，其社會形構過程，並非建制於單一制度或純粹理念，不僅呈現內外有別之戰略模糊考量，也經常因受援對象差異而有不同隱涵道德訓示，以藉此「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軍事外交格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2019)。從而，既拉近國際與中共中央的連結，鞏固習近平核心與政權統治優勢，也在世界秩序結構中，形塑其主導優勢之霸權地位。

三、武力多樣運用空間解構複合霸權復歸難題

整體而言，共軍武力多樣運用的新興趨勢，不僅武警非戰爭軍事行動，與「新型安全領域」、「新型作戰力量 and 保障力量」有諸多互為對應之處；而且共軍「口罩外交」亦係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範疇。事實上，也為「一帶一路」建設戰略需求服務，並以公共衛生安全治理的國際公共產品，做為武力多樣運用之新興形式。固然，此新興趨勢之所以出現，係與國際強權大國對類此國際公共產品，存在不對稱之生產社會關係有關，從而相對解構了中共外展武力多樣運用的空間，顯讓中共中央下定投資軍事外交之決心，共軍援外防疫亦處於最佳機遇，有利於形塑其主導優勢之霸權地位。

然而，從霸權分析觀念看來，霸權擴張卻不至於無限上綱為帝國主義，主要係決定霸權之生產社會關係、社會形構與世界秩序結構等三項層面，彼此在相互適應中又有條件制約。換言之，即使中共外展武力多樣運用空間得以解構，形塑其優勢霸權，然卻在霸權復歸中，仍將面臨相對侷限或難題。證諸，新冠疫情以來，黨國與社群媒體，對內高調讚頌中國共產黨；相對的，對外卻因面對國際霸權「誣陷中國政府疫情不透明」的怒氣與疑慮，則得採取霸權纏鬥、連橫合縱與勸服策略(Nikita Savkov, 2020, p. 20)。從解構與

復歸觀念看來，對內宣傳相較於對外橫縱勸服，不僅至高無上，且有助於解構黨國統治的合理性危機；然而，在對外霸權復歸上卻有相對侷限性(Bates Gill, 2020, 110)。同理，也說明共軍援外訊息刻意保持低調之必然。考察其原因，主要係黨國意志凌駕一切且至高無上。藉由檢視《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推動構建地區安全合作架構」、「積極提供國際公共安全產品」內容(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可以發現仍係以黨國與軍事菁英外展模式為主，其與當地公民社會之交往，以及大陸公民社會在國際參與空間與能力，則相對落後又不足，從而也侷限了對外高調宣傳之優勢。

2018 年 2 月 5 日，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與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Berliner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發表聯合報告「威權主義之進展：應對中國在歐洲政治影響力的日增」(Authoritarian advance: 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指稱中共正急速提升影響歐洲的力量，但其獨裁管制特性，卻對自由民主、歐洲價值觀與利益構成重大挑戰。中共主要透過公民社會、學術界、傳媒輿論與政治菁英影響歐洲政治。其目標在於就特定議題和政治議程獲得全球支持、削弱西方國家的團結，以及營造全球對中共現行政治體制更好的觀感(Thorstern Benner, Jam Gaspers, Mareki Ohlberg, Lucrezia Poggetti, and Kristin Shi-Kupfer, 2018, pp. 2 & 5)。顯然，中共黨國意志凌駕一切的特性，固然仍有機會解構其外展空間形塑霸權，然而霸權復歸卻有所侷限。正如當前武力多樣運用，可以多種形式呈現，然卻經常被理解成是「銳實力」(Sharp power)的應用或政治影響力滲透，徒增國際社會對中共向全球擴張的疑慮甚至恐懼。

中共黨國體制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所謂公民社會、社會團體或非政府組織，須由黨的幹部領導或掛靠政府機關。黨國主導優勢，既弱化公民社會參與國際活動空間與能力，也形成黨國單方面承擔社會治理的風險，導致社會矛盾易於激化為權力路線爭鬥與政治動盪。實際上，也反映出中共黨國體制，長期凌駕公民社會的內在體制結構難題。因而，未來後疫情時期的「大外宣」，中共仍將置身公民社會前沿，針對「反中國」聲浪，增加操作大陸民族情緒，以應對霸權復歸難題(Bates Gill, 2020, p. 98)。然而，就形塑話語權之方法與論述規範看來，難題之所以相互伴隨，其中關鍵機制，主要係來自於公民社會，以及賴以擴展與多樣化關係所形塑的文明場域，顯得較為欠缺。從而，中共若為黨國利益持續增加國際政治宣傳強度，不僅恐將激化霸

權間競逐，甚至也與形塑話語權軟實力，應放鬆黨的控制之規範，出現背道而馳難題(Bates Gill, 2020, p. 107)。

同理，武警海上維權非戰爭性軍事行動，不可能片面依賴其黨國有形能力，還得與周邊國家公民社會，建立互信與共同安全責任感。相對的，若是在缺乏互信與共同安全觀，恐將反轉為匱乏／無良治理(Poor Governance)。如同，在當前政治現實考慮下，周邊合作國家若欲獲得中共實惠，既要面對其軍事外交的擴張性政策(如海權宣示與維權、防空識別區劃設等)，又得勉強接受形式上的和平、合作宣示，即使有反對立場也只能保持沉默(Robert Sutter and Chin-hao Huang, 2013, p. 67)。鑑此，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與「一帶一路」建設相互複合，然若仍舊依賴黨國部門與國營企業進行外展政策，包括攫取國際戰略能源的自利取向不變，並企圖在全球治理上發揮影響力。顯然，將難以具體實踐環境資源永續發展，以及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普世價值(Richard Weitz, 2013, pp. 7-8)。

甚至，可能反轉為「弄巧成拙外交政策」(Self-defeating Foreign Policy)。尤其，中共為維繫其周邊安全，過度的對周邊進行投資，反而將伴隨負作用。因為，過於外展將讓周邊國家認為，中共意圖藉此影響其內部事務而感到憂慮；而且，中共之崛起，也使周邊國家社會不安全意識上升，為其帶來環境資源剝奪，大陸與當地勞動社群關係緊張、失業問題以及非法移民等問題。從而，讓原本各行其是的周邊國家，除轉向與美國、日本交往，以平衡中共政治影響力之外，也另行發展次級合作關係，以保護各自利益(Jeffery Reeves, 2013, pp. 140 & 144-145)。可見，若未經公民社會互信與共同安全責任感的社會形構，終將使得其外展政策弄巧成拙為「銳實力」滲透疑慮，以及衍生成遭國際社會質疑之難題。

由此看來，對中共新興武力多樣運用的霸權場域解構與復歸難題，也就是生產社會關係、社會形構與世界秩序結構等層面，彼此的相互適應與有條件制約。鑑此，以霸權場域之解構與復歸觀點，來檢視中共所謂「中國夢」、「新型大國關係」、「履行多邊主義承諾」、「新型安全夥伴關係」、「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治理」等多種世界秩序宣示。就該等宣示對照其擴張性軍工產業，以及反介入／區域阻絕戰略之投射威脅能力，在國際生產社會關係上，即顯得不相對稱。尤其，與周邊區域的社會形構不足，仍將限縮其武力多樣運用之外展。一方面，是否足以磨滅彼此對區域衝突的敵意，

依然不夠明確(Catharin Dalpino, 2013, p. 7)。再者，由於 2014 年的後阿富汗情勢，不僅美國態度仍不明朗，周邊與中共之合作動力，仍受到其等內部政權承續、青年失業與無良治理之制約，進而影響其等對外行動之抉擇與方向(Mamuka Tsereteli, 2013, p. 170)。事實上，周邊與中共合作，也必須在世界秩序結構中尋求戰略平衡(Roger McDermott, 2013)。顯見，即使中共武警海警海上執法與共軍「口罩外交」，做為武力多樣運用的新興形式，也對應著「新型安全領域」與「新型作戰力量和保障力量」，以形塑其霸權外展主導優勢。然而，當公民社會互信與共同安全責任感的社會形構不足時，或又因中共安全承認與威脅能力，在國際生產社會關係上顯得不相對稱時，又將在世界秩序結構中，限縮其霸權或主導權。

陸、結語

論述武力多樣運用政策議題，既為共軍爭取國際活動空間話語權，也在對內提高大陸社會對共軍之認同接受程度。共軍在中共政治體制中，正逐漸嘗試超越傳統角色。而今，武警海警海上執法與共軍「口罩外交」，成為共軍武力多樣運用的新興形式，不僅對應著「新型安全領域」與「新型作戰力量和保障力量」戰略意涵，也意謂著特殊的政策動向，表明中共對軍事外交更顯自信與下定決策，亦因新冠疫情令共軍援外防疫處於最佳機遇，進而朝世界秩序結構，形塑其主導優勢之霸權地位。尤其，武力多樣運用能為「一帶一路」建設戰略需求提供服務，並以公共衛生安全治理的國際公共產品，重塑國際生產社會關係，用以修飾外展影響力的煽動性，或進行特製化敘事。然而，從世界秩序結構角度看來，霸權外展卻有其現實性。

從國際霸權解構與復歸的分析觀點看來，美國與盟邦夥伴關係疏離化，甚至戒除多項國際領導職能，導致世界秩序解構，進而解構中共外展國際活動空間，並藉機積極形塑國際話語權。換言之，因國際強權或大國，對投入新興非戰爭性軍事行動，或國際公共產品之意願能力相對缺乏時，國際生產社會關係也隨之解構。固然，中共因此在武力多樣運用上取得優勢宰制，且在世界秩序結構中形塑霸權，卻不至於衍生為帝國主義，然在霸權復歸上，仍存在著相對侷限或難題。

概括而言，儘管中共在外展武力多樣運用，可以採取武警海上維權非戰爭性軍事行動、軍事「口罩外交」國際公共安全產品、非傳統安全治理等新興形式。然而，其動機多出於自利與經濟現實考量，甚至經常被理解為係「銳實力」的應用或政治影響力滲透，徒增國際社會對中共崛起的疑慮甚至恐懼。最值得關切的是，霸權之復歸不僅止於此侷限性，還將面臨霸權在國際生產社會關係再生產時的難題。亦即，霸權復歸必然面臨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係取決於再生產與社會形構是否相互適應。然而，中共外展武力多樣運用最關鍵的再生產要素－與國際公民社會互信與共同安全責任感的社會形構，卻顯得不足，又將反轉成為侷限霸權主導優勢之難題。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人民網(2020a.07.02)。中國人民解放軍向 5 國軍隊提供防疫物資援助。人民網網站：<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20/0703/c1011-31770151.html>。檢索日期：2020.09.03。
- 人民網(2020b.06.22)。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武裝警察法(2009 年 8 月 27 日第 11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10 次會議通過 2020 年 6 月 20 日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19 次會議修訂)。人民網網站：<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0/0622/c1001-31755160.html>。檢索日期：2020.09.03。
- 人民網(2020c.05.27)。「國防和軍隊建設 2020 年目標任務如何實現 習近平這樣要求」。人民網網站：<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20/0527/c1011-31726143.html>。檢索日期：2020.09.03。
-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07.24)。《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http://www.gov.cn/zhengce/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檢索日期：2020.09.0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2019.07.30)。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舉行建軍節招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網站：<http://new.fmprc.gov.cn/ce/ceun/chn/czthd/t1685044.htm>。檢索日期：2020.09.03。
- 中國網(2009.08.28)。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武裝警察法(全文)。中國網網站：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8/28/content_18416941.htm。檢索日期：2020.09.03。
- 中國廣播網軍事頻道(2013.04.16)。陳舟解讀《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中國廣播網軍事頻道網站：http://mil.cnr.cn/zgjd/201304/t20130416_512368654.html。檢索日期：

2020.09.03。

美國之音(2019.05.29)。中國軍方鷹派人士：中國意欲 30 年內超過美國。美國之音網站：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relations-20190529/4937028.html>。

檢索日期：2020.09.03。

新華網(2018.03.04)。《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新華網網站：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04/c_1122485476.htm。檢索

日期：2020.10.26。

聯合早報(2020.04.27)。中國擬修訂《人民武裝警察法》。聯合早報網站：

<http://www.izaobao.com/shiju/20200427/70485.html>。檢索日期：

2020.09.03。

英文部分

Benner, T., Jam Gaspers, Mareki Ohlberg, Lucrezia Poggetti, and Kristin Shi-Kupfer. 2018. Authoritarian advance: 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 Pp. 1-51.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http://www.gppi.net/publications/rising-powers/article/authoritarian-advance-responding-to-chinas-growing-political-influence-in-europe/>. 2020.09.03.

Best, L. 2020.01.07. What motivates Chinese peacekeepin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log/what-motivates-chinese-peacekeeping>. 2020.09.03.

Boundless Economics. 2019. Public Goods. Boundless Economics: <https://courses.lumenlearning.com/boundless-economics/chapter/public-goods/>. 2020. 09.03.

Dalpino, C. 2013. Multilater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15(1), 149-158.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c.pacforum.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1301q.pdf>. 2020.09.03.

Gill, B. 2020.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post-COVID prospects for soft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3(2), 97-115.

- Glaser, Bonnie S. and Kelly Flaherty. 2020. US-China relations hit new lows amid pandemic.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22(1), 27-42.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c.pacforum.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04_2001_USChina-2.pdf. 2020.09.03.
- Green, Michael. 2016.04.14. East China Sea tensions: approaching a slow boil. 2020 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nd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amti.csis.org/east-china-sea-tensions/>. 2020.10.26.
-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20. 07. 20. Press Release –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Launches New Website: Stealth War.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s://jamestown.org/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the-jamestown-foundation-launches-new-website-stealth-war/>. 2020.09.03.
- Legarda, H. 2020.08.03. The PLA's Mask Diplomacy. *China Global Security Tracker No. 7*,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https://merics.org/en/analysis/plas-mask-diplomacy>. 2020.09.03.
- Medeiros, E. S. 2019.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2(3), 93–119.
- Roger, R. 2013.10.01. Kazakhstan Prepares for Peaceful NATO Transition in Post-2014 Afghanistan. *Eurasia Daily Monitor*, 10(174).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sword%5D=8fd5893941d69d0be3f378576261ae3e&tx_ttnews%5Bany_of_the_words%5D=Afg&tx_ttnews%5Btt_news%5D=41435&tx_ttnews%5BbackPid%5D=7&cHash=b2c7a2c39e28865be70b8c30a599f953. 2020.09.03.
- Reeves, J. 2013. China's unraveling engagement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6(4), 139-149.
- Savkov, N. 2020. Chinese vi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mid rising Sino-American clashes. *China Brief*, 20(11), 18-22.
- Schmidt, Brian C. 2018. Hegemony: A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gGmbH: https://doc-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Schmidt_Hegemony_PDF_web.pdf. 2020.09.03.
- Sutter R. and Chin-hao Huang. 2013.05. China's growing resolv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A Triannual Electronic 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15(1). Pp. 67-74.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cc.pacforum.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1301q.pdf>. 2020.09.03.
- Tsereteli, M. 2013. Winners and losers of strategic games in Central Asia. *Asia Policy*, (16). Pp. 167-170,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http://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licy/AP16/Asia_Policy_16_Book_Review_Roundtable_July2013.pdf. 2020.09.03.
-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0.09.01.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Sep/01/2002488689/-1/-1/1/2020-DOD-CHINA-MILITARY-POWER-REPORT-FINAL.PDF>. 2020.09.03.
- Weitz, R. 2013. 09.27. China-U.S. military ties on the upswing. *China Brief*. 13(19). Pp. 6-10.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s://jamestown.org/wp-content/uploads/2013/09/China_Brief_Vol_13_Issue_09.pdf?x58715. 2020.09.03.
- Wuthnow J. 2019. China's other army: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in an era of reform.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https://inss.ndu.edu/Portals/82/China%20SP%2014%20Final%20for%20Web.pdf>. 2020.09.03

後疫情時期之中共武裝力量多樣化運用新興趨勢及其侷限

匯流趨勢下的軍事傳播研究： 再思媒介生態學當代意義

馬祖耀

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程博士生

摘 要

本文主要基於意識到數位、通訊與網路等科技形成的巨大媒介匯流，已然全面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軍事傳播研究領域，也體認到新傳播科技發展下，帶來傳播環境與生態的巨大變革，因而亟思應變與掌握。面對當今匯流科技快速發展以及傳播工具與方法的不斷演進，強調不同媒介特性的媒介生態學觀點與理論，當能強化我國軍事傳播相關研究的能量，進而有助提出包括國軍形象、軍事行銷、國防教育等有效之傳播策略，尤其是針對年輕世代。本文提出當代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一些契機，不僅拓寬媒介生態學的探索視野和觸角，並有益於往後相關研究內涵的豐富與完整。

關鍵詞：媒介匯流、媒介生態學、軍事傳播、跨學科研

Medium Convergence and Military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Media Ecology

Yao-Tsu Ma

Doctoral Candidate, Ph.D. Program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nd methods,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cology emphasizes different media's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expand the field of military communication-related research. Moreover, it thereby helps to propose som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building military image, improving military marketing, and promoting all-out defense education, for younger generat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d some major niches of contemporary media ecology research, which not only expand the horizons and tentacles of media ecology,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nrichment and integrity of related field.

**Keywords: Media Convergence, Media Ecology, Military
Communi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近年來，在軍事傳播領域面臨網路以及新傳播科技變革所帶來的挑戰，而相關主題的研究與探討從媒介匯流、社群媒介到大數據運用等，皆反映出當前國軍對於時代變遷的警覺與重視。本文主張，面對當今網路、數位科技快速發展以及傳播工具與方法的不斷演進，強調不同媒介(科技)特性的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觀點，當能強化我國軍事傳播與新聞相關研究的能量，進而有助於提出包括國軍形象、軍事行銷、國防教育等有效之傳播策略，尤其是針對年輕世代。

事實上，當代以網路為核心的新傳播媒介發展，形成所謂的媒介匯流現象，不僅改變新聞傳播產業結構與營運模式，同時也牽動傳播學領域的研究思維。面對匯流衝擊，由於能夠深刻考察當代媒介(科技)環境及其衍生現象之故，使得當代媒介生態學的重要性與迫切性，遠大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因此，媒介生態學可以做為(軍事)新聞學與傳播學領域，在媒介研究以及策略應用上的補充與強化。

壹、問題意識

網路、數位及行動通訊等科技高度發展下，面對面的口語肢體互動、平面紙張形式的讀寫、一對多大眾廣播等以往主流傳播行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已逐漸淡出、退場。而關於這些轉變，就傳播研究而言，它們意味著什麼？「傳播媒介」從過去平面(書籍、報紙、雜誌)與視聽(廣播、電視、電影)的簡單分類，到有線電視、錄放影機、衛星、電腦網路、光纖、雷射、高畫質電視、行動電話等「新傳播科技」；二十一世紀 Web 2.0 興起，YouTube、Facebook、Twitter、Line 等「新(新)媒介」開啟雲端紀元。傳播媒介不斷擴張疆界，而此刻電腦、電信與傳播媒介的匯流(convergence)趨勢，更持續地挑戰著傳播媒介的定義，傳播研究者又該如何看待與因應？

在一篇將 Lady Gaga 與 Bob Dylan 比較的文章評論中，陳立恆(2012)觀察到流行音樂主流，已經從 Bob Dylan「宣揚社會改革的詩意理想」過渡到 Lady Gaga「放大虛擬浮華的聲色崇拜」；宣告著上個世紀普遍推崇「雋永」與理想的時代精神，已轉移到強調追求短暫與刺激感的新世紀，它標誌著電視與網路兩個不同媒介文化的主宰時期。

今天，不斷推陳出新、多元複雜的媒介科技(包括各式平台介面、軟硬體、電腦設備、通訊載具等)，構成我們生活與生存的方方面面。單以「螢幕(screen)」為例，不僅成為串聯人們日常生活裡溝通、工作、娛樂、新聞資訊或知識來源的共同(甚至唯一)介面，也是當代人現代生活中的重要體驗媒介，甚至也是被人們稱之為現代性(modernity)的現象中最新的一個象徵或標示：重度地依賴各種螢幕。而根據《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所公布全台護眼趨勢調查顯示(聯合新聞網，2019.10.02)，國人每日 3C (電視、電腦、智慧型手機)的用眼時間逐年增加，去年(2019)更首度突破 10 小時(平均達 10.7 小時)，換言之，扣除一般睡眠時間，幾乎有 2/3 的時間都和 3C 產品為伍。

而日漸成熟的全球網路系統，不僅為媒介匯流時代揭開序幕，同時也為我們形塑出一個多螢(multi-screen)、跨螢(cross-screen)的新環境；跨螢是指依序使用不同的螢幕，多螢則是同時地利用多個螢幕裝置(台灣媒體趨勢報告，2013)。在多螢/跨螢趨勢下，也逐漸形成所謂的「媒介多工(media multitasking)」現象，台灣有高達 77.4%的人偏好一邊上網一邊看電視(蘇建州，2010)，對年輕世代的影響更甚，美國非營利組織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的研究報告，就指出年輕世代被數位科技所圍繞，媒介多工已是稀鬆平常(Roberts, Foehr & Rideout, 2005)。

上述之討論，不僅讓我們感受到大環境裡許多文化興味與社會趨向的一些質變，也都觸及一個重要的傳播議題：即媒介或科技如何形塑我們的生存環境，以及不同媒介是否存在著不同的傳播特性？這當中，傳播媒介技術以及形式層面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

貳、媒介匯流啟動軍事傳播新思維

近年來，網路及媒介匯流的快速發展，啟動軍事傳播研究的新思維，例如國防部近幾年所舉辦的「軍事新聞學術研討會」，也大多圍繞著新媒體、數位環境、Web 2.0、大數據等關鍵詞進行相關的探討，以回應新媒介科技時代的變遷與挑戰。因此，如何結合匯流時代的各種社會文化脈動，以及瞭解閱聽人傳播行為與心理，靈活而多元地運用數位、網路等新媒介或載具，適時而有效的進行軍事傳播工作，是當前國軍的重大課題之一。

在媒介匯流大環境背景下，軍事傳播學做為傳播學研究的一個支脈，無法自外於整體傳播環境變革之影響。同時，現代戰爭型態也進入新的紀元，並促成了軍事傳播學對於傳播者、傳播通道、接收者等傳播要素的不同思維(胡光夏、陳竹梅，2010)。無論是有別於過去以「資訊戰爭(information warfare)」、「網路中心作戰(network-centric warfare)」或「網路戰爭(cyber war)」為主流思維的「第四代戰爭」(莫大華、陳偉華、陳中吉，2018)，或是泛指 2010 年後之戰爭特性的「第七代戰爭」(王長河，2019)，都指向了未來「非正規戰爭」以及「傳媒心理戰」的重要性。

再者，當前我國與假想敵雙方的軍武力量仍有一定差距，處在類似「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的現實狀態，更應該採取非傳統策略以及戰術之新思維。因此，「軍事傳播」將成為未來的戰場，其使用的武器則為各種傳播媒介或技術，包括數位與類比，訴求對象則涵蓋大眾、小眾、分眾以及個人。軍事傳播研究者有必要更深入探索不同媒介(形式)的不同特質。以多螢跨螢的媒介使用為例，不僅要思考將訊息放在不同種類的螢幕上，還需要瞭解每種螢幕的各自特點、證明(或否證)使用該媒介的適恰性以及考量媒介使用的平衡等，以求達到最好的傳播效果，而這些都必須對於媒介特性有更細緻的理解與掌握為前提。

面對傳播環境的劇變，我們的(軍事)新聞傳播知識系統理當探索時代與大環境的特性、回應環境的變化，並對相關的知識內涵與結構予以修正或升級。我們所處的媒介匯流時代，它的特性之一即是各種媒介在技術和物質形式方面的消長演變，趨於更快速、更多樣態。

從實務面而言，軍事傳播相關事務涵蓋國軍形象宣傳、軍事行銷、國防教育、戰爭報導等範疇，本就牽涉不同性質的任務或目的，面對當代網路以及新傳播科技的快速演變和推陳出新，更添掌握傳播成效的複雜度與困難度。就此而言，做為一種研究方法、強調「媒介即訊息」以及不同媒介具有不同偏向的「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在當代軍事傳播研究上，應該被賦予更多的研究能量以及發揮更關鍵的角色。

參、網路與媒介匯流環境特徵

首先，網際網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深深地影響和改變人們的生存模式，這種趨勢還在日新月異地持續發展著。從政府到企業、從社區到學校、從工作到休閒娛樂，人類這種新型生存空間和生存模式集合構成了一種「網路社會(cybersociety)」(張真繼、張潤彤，2008)，它既保留了傳統社會的一部分因素，又體現出完全不同的新特徵。

一、網路環境的「架構」作用

在技術前提下，網路媒介提供的每一種功能、應用或服務，都是我們藉以相互互動或交流的介面，例如 Google 搜尋平台、部落格、Facebook、YouTube、網路遊戲等。每一種服務均組成了其特有的「社會」結構，人們在其中產生獨有的互動方式與習慣。日本資訊環境觀察家濱也智史，把網路上的這種服務或工具視為一種「架構(architecture)」或結構(蘇文淑譯，2006)。

那麼，架構有何作用呢？根據美國憲法學者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指出，控制人類行為與社會秩序的四種方法，除了規範、法律、市場，還包括架構。為了達到控制手法的有效運作，前三項方法都必須讓受控方(閱聽人、使用者)，經過內化其價值觀或規則的過程來完成；然而，「架構」則不受限於受控方原有的價值觀或想法，就技術上或物理上而言，他她們已被封固了行為的可能性，導致相當於「強制人們遵循某些事」的規則效應(劉靜怡譯，2002)；此「架構」作用於人們的無意識間、並形成「規則」(蘇文淑譯，2006)。

此外，傳播學者 Roger Silverstone 引用 Isaiah Berlin 的概念，宣稱現今的媒介環境已成為我們「經驗的一般性結構(general texture of experience)」的一部分(陳玉箴譯，2003:3)；所謂經驗的一般性結構，是指那些觸及生命基礎本質的經驗，以及那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或在與他人共處溝通時必然會擁有的經驗。在此，我們認同 Silverstone 把媒介當作「經驗的一般性結構」來研究的想法，因為網路科技下的現代生活，已是我們如此「理所當然且必然會擁有的經驗」。

換言之，現代人生活在網路社會空間裡，使用著媒介匯流下各種技術、工具(包括應用程式、軟硬體、資訊平台等)，沉浸在不斷變化、五花八門的

技術服務與功能裡。而從媒介生態學觀點，舉凡上述各種技術、工具、軟體服務等「一切人工製造物」都應該視為廣義的「媒介」，它們都會產生一種背景，即一種環境和相關技術的複合體；通常我們對這樣的背景渾然不覺，因為我們把它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既定事實」(何道寬譯，2010:170)，如同前文所提的架構或結構，它成為在人們無意識間作用的「規則」。也因此，麥克魯漢才會提醒傳播研究者，不要被媒介的「內容」所蔽，因而錯失理解媒介本身的性格，因為正是媒介(而非內容)本身塑造並控制了人事關聯與人們行動的規模和型態(鄭明萱譯，2006:37)。

二、網路媒介具有自主性

網路的功能從早期簡單的文字檔，到 1990 年代後有了影像和聲音，進入世紀之交則已經將通訊、廣電、電腦等媒介「匯流」，而形成「媒介中的媒介」(宋偉航譯，2000:27)。今天，將網際網路視為我們這個時代人們藉以交流互動最主要的媒介系統，是人們生活、工作、娛樂的重心處所，殆無疑義。不僅如此，隨著使用的普及，網路環境似乎形成「自生自長」的情況，像似「擁有自我生態系的生物」(蘇文淑譯，2006:270)。

如同科技思想家凱文·凱利(Kevin Kelly)所指出的，人類所創造的科技是一種具備欲望、意識和自主性的後設生物體，是一種能自我強化的創造系統，他將其稱為「科技體(Technium)」(嚴麗娟譯，2012:30；宋瑛堂譯，2012)；在此，科技體就是人類(身體或感官)向外延伸的成果，這正是麥克魯漢觀點的延伸。換言之，網路媒介環境的「架構」不僅會自我成長，並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三、媒介的配生

資訊科技朝向網路化、行動化以及個人化發展，也促成新媒介科技不斷演進的動力。Bolter (2007)指出當代新傳播技術的發展的「雙重性」，一方面媒介形式追求統一與匯流；另一方面，卻持續不斷地分化。尤其各種媒介形式(例如演算法)與裝置(例如行動裝置)的混搭與重組，會加速促成新媒介的出現、競爭、合併、演化的動態發展，就像 iPhone、Facebook 上的眾多應用程

式，融合了社交、遊戲、攝影、溝通、影音娛樂等各種形式(李蔡彥、鄭宇君，2011:76)。麥克魯漢曾用「媒介配生」指稱這一現象，例如無線電廣播和電影的配生，產生了有聲電影(嚴麗娟譯，2006:73)。在各種匯流(如媒介、數位)技術快速演化下，這種媒介配生現象，正方興未艾。

四、網路媒介建構文本

此外，「雙重性」也發生在文本的建構。日本媒介研究者吉見俊哉(蘇碩斌譯，2009:11)指出，媒介既具有技術形成的層次，也具有文本建構的層次。換言之，在網路或媒介匯流時代，須同時注意兩個互相作用的面向：一是做為技術、設備的媒介(例如 App 應用程式、手機、電腦等裝置)，二是各種類型文本互動的論述實踐，而這個面向與媒介的技術、設備面向既分離又結合。

從這個角度來看，則前者考察的重點在於這些媒介在特定時期的社會空間中，如何形成、被賦予什麼意義、如何被使用以及如何受到閱聽人的青睞；後者表明，如果只把分析侷限在文本(內容)的面向，將會錯失對於媒介性質的理解。

網路技術既自我生長又能不斷互相配生，《數位麥克魯漢》(宋偉航譯，2000)作者保羅·李文森(Paul Levinson)就將網際網路形容為「媒介中的媒介」，我們在使用網路空間(cyberspace)之際，同時也在創造並重塑這個空間。從(軍事)傳播研究角度，如何捕捉網路及匯流環境裡媒介複雜多變的演化軌跡，並試圖去探究、揭示這個生態系的「架構」與「規則」，找出適合它的對應方法與應用方式(無論是運用在勸服、宣傳或教育)，是當前一大課題。在這樣的理解下，強調研究媒介環境的結構、主張媒介環境調節人們的感覺和行為的媒介生態學(何道寬譯，2010)，似乎更能突顯其在(軍事)傳播研究上的當代意義。

肆、當前軍事傳播之媒介研究

國軍屬於政府體系的其中一環，從民主的角度，任何軍事傳播事務例如

國軍形象宣傳、軍事行銷、國防教育、戰爭報導，乃至國防人才招募等政策的宣達，除了要求達成傳播之目的，也期望透過傳播手段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而隨著網路及媒介匯流等相關科技的高度發展，傳播媒介(例如電腦、手機裝置、臉書社群平台)的影響力，不僅可以即時影響國內的輿論和民情，在某些條件下，也已經成為改變世界趨勢的重要力量。軍事傳播研究的探索，因而也進入新的紀元。

一、戰爭型態改變：軍事傳播愈形重要

從歷史發展來看，將軍事傳播作為戰力的運用，自古有之，從中國古代周幽王的烽火狼煙傳遞軍事訊息，到雅典士兵以奔跑傳遞「馬拉松」戰役的獲勝訊息，再到現代人利用飛行載具投下宣傳品，或是美國 C4ISR 通訊系統的應用等，軍事傳播隨著各種傳播技術、工具和手段的演進，一直扮演著武器之外的關鍵角色。

今天，在普遍追求和平的時代背景下，軍事傳播將成為未來戰爭型態演變的關鍵要素。以兩伊戰爭為例，美軍利用電子郵件、手機簡訊等現代通訊媒介，成功使得策反對象背叛或反抗海珊政權，這也就是 Webster (2003)其筆下繼工業戰爭(industrial warfare)之後的資訊戰爭(information warfare)；戰爭不再需要投入大規模人力，而代之以能夠處理複雜資訊武器設備的「知識戰士(knowledge warriors)」(胡光夏、陳竹梅，2010)。

換言之，現代戰爭型態已經改變，克敵致勝的重點在於如何癱瘓敵人的體系與意志；反之，則是如何強化我軍的體系與意志，而透過有效的軍事傳播策略，能夠在最低的人員物資耗損下達成戰爭目的。以資訊戰爭為例，其注重的就是國內與全球大眾的感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 (胡光夏、陳竹梅，2010)，包括如何提升外界對於國軍的看法與評價的能力。所謂「感知」即是人們如何根據接收的刺激以及對該實體的感受和想法，來考慮特定的人、情況、事件或任何事情。

關於上述的討論，對於軍事傳播研究而言有兩層啟示。一是從古代的烽火狼煙到現代的先進通訊系統，從媒介生態學的觀點，這些都屬於廣義的「媒介」研究範疇。二是指出傳播媒介或技術並非是中立性而具有偏向性，會導致閱聽人的思想或情感更「傾向」於某些方面，這也是媒介生態學的主

要概念之一。

二、軍事傳播之媒介研究

事實上，在軍事傳播研究的相關文獻中，也有間接或直接觸及媒介生態學概念及應用。例如，方鵬程(2004)在探討軍隊形象文章中，討論到單向媒介(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與雙向媒介(網路)的不同特性。同樣探討國軍形象，黃千珮等(2019)則強調，除了社群媒體(例如臉書)本身的不同功能，也應透過其他新聞管道、影音平台等輔助宣傳，以擴大時效與聲量。胡光夏(2007)的研究則指出，不同傳播科技(媒介)的出現，對於軍隊與媒體間的互動、戰爭新聞產製都帶來了新的考驗與挑戰。

在應用方面，面對新傳播科技的不斷演變，國軍在行銷策略上也隨之因應調整，例如從電影轉向電視劇、形象廣告、紀錄片等傳播形式，以觸達目標閱聽人(參閱鈞，2019)。此外，在多篇國軍行銷策略的效果研究(陳靜君，2010；曾雅琦，2013；鍾士宏，2013)提到，「體驗行銷」中的「感官體驗」對於閱聽人態度的影響顯著性最強；署名「謝鈞」的軍事作家因此主張，各類的國軍形象影片應該滿足閱聽眾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等，以增加對於國軍形象的好感(謝鈞，2019)。林正愷和潘漢強(2019)在關於新媒體時代公共危機事件處理的符號建構探討中，則指出不同媒介形式會對資訊或內容產生不同的影響，也會改變媒介內容敘事和結構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胡定傑(2019)在探討如何將設計思考導入國防事務傳達時，除了提到視覺傳達設計(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過程需要採取適當的視覺形式與媒介來傳播訊息，並指出使用圖文兩者結合的表現形式：資訊圖像(Infographics)，更能達到語言和文字所無法企及的效果。此外，邊明道(2020)則透過分析溝通媒介的兩種特質，探討遠距關係中軍人配偶的情感維持；其結論指出，不同的溝通媒體，有不同的媒體豐富性與同步性，媒介的這兩種特性會影響伴侶的溝通行為與情感關係。

大致來說，這些研究主要是從媒介的功能(單向與雙向或擴大聲量)，而較少從媒介的本質或結構切入；其中也有涉及傳播形式(電影、電視劇、紀錄片)或人的感官等議題，只是其最終焦點也仍是放在內容面向。即使有些研究觸及媒介本質(例如媒介形式影響內容結構)的探討，也大多輕輕帶過。胡定

傑和邊明道的研究，則可以視為媒介生態學的敲門磚，胡文涉及了媒介配生(圖與文)，邊文則涉及媒介如何「架構」情感。

本文提出，軍事傳播研究藉由媒介生態學的理论與方法，可以做為前述媒介相關研究的補充與強化，使得軍事傳播的媒介研究的知識地圖更擴大、更為完整。

三、媒介生態學的發展處境

只是，當前媒介生態學取徑的研究能量不足，則是事實，這與其學術處境有關，在中外傳播學界其實早見端倪。傳播學者 Karsten Renckstorf 和 Denis McQuail 爬梳 1950 年代以來的歐美傳播研究，再根據行動典範和研究旨趣，歸納出三大發現：「以媒體為中心」、「以閱聽人為中心」以及「以文化為中心」(Renckstorf & McQuail, 1996)。翁秀琪(2011)則批評以這樣的觀點或模式來分析和瞭解當前的新傳播媒介環境，顯然已經有所不足，並直言這樣的分類完全忽略了英尼斯(Harold Innis)、麥克魯漢等一脈相承的媒介生態學派的觀點。

同時，不少媒介學者提出疑惑，例如 Van Loon (2011)質問，既然傳播乃是藉由媒介而發生，為何在媒介形式多樣的現代社會，媒介(尤指媒介科技)本身及其如何影響人們生活的議題，在我們的傳播研究中卻處於邊陲？林文剛也叩問(媒介生態學)這個研究文化、傳播與技術的理論視野，並學養深厚且橫跨多門學科，為何卻長期被排擠到傳播學領域的邊緣(何道寬譯，2010)。

至於國內傳播學界，從蘇碩斌(2009)在《媒介文化論》譯序中的感嘆，可見一斑，他指出台灣學界對於媒介生態學觀點源頭的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大多未能捕抓他關於媒介所含涉的真正意義，而讓理論或研究的深度滑溜而過，殊為可惜。而從上述對於國內軍事傳播研究文獻討論中，也反映出了同樣的境況。本文主題的「再思」，即是基於以上媒介生態學發展的這些處境的呼籲式回應。

伍、媒介生態學概述

討論至此，「媒介」一詞成為我們考察傳播技術對於訊息傳播、個人心理乃至社會現象或文化變遷的首要關鍵字。然而，「何謂媒介？」這是一個根本而困難的問題。媒介一詞源自英文的 *media*，它是 *medium* 的複數形式(翁秀琪，2011:56)；只是，無論使用中文或英文名稱，在指涉或對應相關概念時，其具體內涵經常令人混淆不清。媒介概念的釐清，關乎究竟指涉的是內容、媒體機構、還是技術與形式？更關乎媒介生態學的理论關懷旨趣為何？因此需要加以說明。

一、正名：「媒介」與「媒體」

蘇碩斌(2009:XI)根據 Raymond Williams 對於 *media* 一詞的歷史考察，指出其在當代擠壓了三重意義：其一是中介物的意義，最早起於古老儀典裡介於人神之間傳遞訊息者，例如薩滿、靈媒；其二是技術的意義，指的是 19 世紀運輸及通訊浪潮的工業文明，例如電話、無線電；其三是資本主義組織的意義，尤其是 20 世紀的大眾傳播機構，例如報社、電視台等。

Williams 對於第二與第三層意義的註解，正是「*media*」含義分歧的問題所在。而在中文裡，「*media*」則常因不同的脈絡或用法被譯為「媒介」或「媒體」。一般而言，中文傾向以「媒體」指稱機構或組織意義的 *media*，而以「媒介」指稱形式意義的 *medium* (蘇碩斌，2009:XI)。

首先，從字源上來看，*media* 原本是英文字 *medium* 的複數形式(翁秀琪，2011:56)；而麥克魯漢最重要的觀點「媒介即訊息」，其原文為「*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使用的字眼是 *medium*，而不是 *media* (McLuhan & Fiore, 2008；蘇碩斌譯，2009:72)。媒介生態學重要旗手之一的梅洛維茲 (Joshua Meyrowitz)，更直接主張把媒介生態學取名為單數的 *medium theory*，以強調它研究單一、或是每一類型(*type*)媒介特性的取徑，用意即在於要把它與大部分複數的 *media theory* 區別開來(李明偉，2010:41；唐士哲譯，2013: 209-233)。

在這樣的區辨下，媒介生態學英文名稱 *media ecology*，其中 *media* 的概念其實更接近 *medium* 的使用意義。因此，鑒於相較於傳播內容或傳播機構，媒介生態學研究更重視媒介技術或形式本身，以及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本文將 *media* 對應為「媒體」，指涉傳播機構或組織之意義；而將 *medium*

對應為「媒介」，指涉其技術或形式上的意義(這正是媒介生態學所關注的範疇)。

二、界定：媒介外延與媒介匯流

整體而言，媒介生態學對於媒介的定義，屬於一種「泛媒介論」，其媒介外延甚廣，例如衣服、窗戶、照片等都可以視為媒介(李明偉，2010:41)。麥克魯漢即主張，任何器物或科技的廣泛使用，即使不是定義明確的傳播媒介，都會以特定的格局，塑造人們的思想、行為，以及交流的方式(唐士哲譯，2013；林薇譯：215)。可以說，在大部分情況下，媒介生態學傾向將「一切人工製造物」都視為廣義的媒介(何道寬譯，2010:170)，它們也都是人體(或感官)的延伸。

聚焦當代新傳播科技，科技學者謝清俊(2006)對於媒介的界定，有助於理解媒介生態學觀點的媒介概念：媒介包括記錄用的媒介材料、依媒介材料而創造的工具、依工具而發展的技術，以及配合此工具和技術所做的資訊基礎建設等。因此，媒材性質或形式是媒介概念的核心，例如十九世紀之前「物質媒材」當道；1870 年代電報、電話發明，到 1990 年代電腦、網際網路、電子通訊等技術普及之後，則進入「能量媒材」階段，無論是利用聲、光、熱(如紅外線)、電、磁，甚至於分子都屬於能量的形式；在此基礎上，更發展到利用 0 與 1 編碼存取資料的「數位媒材」階段(謝清俊，2006)。

至於匯流現象，根據多位傳播學者(Huang et al., 2006:227-228)在研究了相關的文獻後，將匯流歸納為四大類：內容(content)、形式(form)、企業(corporate)以及角色(role)。其中，內容匯流與傳播或新聞組織之間的内容合併或共享方式有關；形式匯流則涉及允許「視頻、音頻、數據、文本、靜態照片和圖形藝術」相結合或組合的技術；企業匯流指的是媒體組織合併後相關部門進行的整合；角色匯流則是與媒體工作者跨平台工作的能力有關。

從上面的討論中，顯然媒介生態學關注的是「形式匯流」這一範疇，是承載內容的媒介相關技術或載體，在本文「媒介匯流」稱之；此外，由於匯流過程涉及媒介形式、技術(包括數位軟硬體、平台)等性質的寬泛界定，因此「數位匯流」或「科技匯流」等用語，嚴格說也都符合媒介生態學廣義的媒介概念及其指涉。

三、學術定位

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的定名始於 1968 年，首創者是麥克魯漢，但正式使用並予以學術建制化的則是 Neil Postman(何道寬譯，2010)。從學派發展歷史來看，「media ecology」這一用語自 1960 年代被引用以來，已經被普遍理解為一種觀點或方法、一種探索或研究的領域，以及一門課程(胡菊蘭譯，2016:7)。

首先，林文剛在主編的《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何道寬譯，2010)書中，開始將媒介生態學做為一個領域進行研究，並在該書網羅了此領域大部分的理論、基本概念以及相關發展。稍後，Lance Strate 在〈Echoes and reflections: On media ecology as a field of study〉和〈On the binding biases of time and other essays on general semantics and media ecology〉兩篇著作中又做了全面回顧和補充(胡菊蘭譯，2016:7)，更奠定了媒介生態學的學術指標。

大陸學者何道寬(2006)和李明偉(2014)則將媒介生態學與經驗學派、批判學派列為傳播學三大學派，強調媒介生態學是經驗與批判兩種典範之外，關於整體傳播研究的另一重要觀照視角。經驗學派著眼於內容，分析在其他條件都恆常的情況下，不同的傳播內容會引起何種反應；批判學派聚焦於權力，研究政治、經濟等權力因素如何操控傳播以達到目的；媒介生態學則強調不同媒介的特性(李明偉，2014:41)。而稱之為「學派」，根據傳播學者李金銓(2014:8)指出，表明了它們所提出的問題、使用的方法，對傳播研究都有根本的影響。

近年來，傳播學者夏春祥(2015)主張將媒介生態學視為一種研究方法，他引用《科學方法百科》(王海山、王續琨，1998:3)將方法界定為「一種活動過程，就是主體有目的地藉助於中介手段，按照一定的規則與程序，聯繫與把握客體的過程」，並指出生態學方法成為用來「揭示這種相互作用的機制，才能認識生物型態結構變化的原因及其發展歷程與趨勢」的重要工具；進而，連結媒介生態學成為把握與理解「做為媒介背後主要推動力量的科技，與人類日常生活的關係」的一種方法：

基本上，方法論談的是方法的方法，亦即是對研究對象所採取研究路徑的一種檢視與反省。由此來看，原本就強調形式，以有別於傳統傳播理論重視內容的媒介生態學，實在不適合單以討論的實質內容來藉以界定。……媒介生態學可以作為一種方法，亦如符號學的作用一般；而其理論意義，則應該從媒介一詞加以界定，用以凸顯它所依賴的傳播行為在人類事物上有其優先性。(夏春祥，2015:160)

事實上，Neil Postman 就曾經表示，媒介生態學思想源頭麥克魯漢的觀點是給我們指明思考媒介的一種方法(范龍，2009:120)。也如同李明偉(2014)在《知媒者生存：媒介環境學縱論》書中所言，媒介生態學可以為傳播研究提供關於媒介環境以及個人或社會之間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洞見。

四、重要概念：媒介即環境

這個學派其研究取向的概念基礎，根據波茲曼本人的界定：認為媒介是複雜的訊息系統，媒介生態學則試圖揭示隱含其中本有的結構，揭示它們對人們的感知、情感、認識和價值的影響(何道寬譯，2010:34)。這是對麥克魯漢觀點的直接呼應，即一旦社會的主流傳播媒介有所改變，其符號系統也將發生根本的變化，而這樣的媒介變化必然使人們的感官發生根本的變化(McLuhan, 1962)。

在上述的概念基礎上，身為媒介生態學重要推手之一，林文剛(何道寬譯，2010:34-38)提出從兩個層面來理解媒介生態學：一是在生理－感知層面上，把每一種傳播媒介設想為一種感知環境；二是把每一種傳播媒介設想為一種符號環境。前者探究媒介如何使我們感官的形貌發生變化？這樣的變化又如何改變我們接收資料的方式？因為媒介生態學主張，我們是用這些資料來理解和構建或重構周遭的世界。後者則是要研究感知和符號這兩種環境，在人們構建周遭世界時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再者，媒介生態學的任務是檢視多種媒介共存的動態關係，考察它們的互動如何產生或構成一個感知－符號環境，「這個符號環境的新語言的密碼尚待我們去破譯」(何道寬譯，2010)。今天，我們處在多種媒介匯流的網路空間環境裡，我們使用(甚至同時)若干種媒介及其形式(文字、靜態圖像、動態影像、語音、電腦、手機等)，也就是多種符號系統的組合，其感知－符號

環境在性質上更加複雜，這雖增加了探索上的困難度，卻也提供更多的觀察向度和題材。

起源於北美的媒介生態學派(media ecology)，學術圈盛行一種簡單的比喻來形容它的基本觀點：各種媒介構成了人類生存生活的一種環境，人就像是生活在水(媒介環境)中卻渾然不覺的魚(何道寬，2007)。但麥克魯漢也曾表示，當媒介環境發生巨變之時，也正是媒介環境的社會意義突顯之時，就像池水乾涸之後，魚兒才能體會到水的重要意義。李明偉(2014:21)則指出，媒介變革的速度越快，力度越大，對身處其中的人們的影響就越強烈。而網路是迄今為止擴散最大也最快的傳播媒介，現代人沉浸此網路環境中，受其影響之鉅大可想而知。

五、媒介變革的整體性特徵

除了理解單一媒介的特性，媒介生態學更關注不同媒介間的消長演變，對於個人、社會或文化的影響。Neil Postman 闡明媒介(形式、技術、內容載體)之間的變革不是數量上增減損益的變革，而是整體的生態變革；此生態就是環境科學家所謂的生態，重要的媒介變革會牽一髮而動全身：

你把毛毛蟲從它棲息的環境裡清除掉時，剩下的環境並不是單純減去毛毛蟲的環境：你得到的是一個新環境，你重新架構了生存的條件；同理，你把毛毛蟲放進一個沒有毛毛蟲的環境時，整個環境也為之一變。媒介環境運行的機制也是這樣的。一種新技術並不是什麼東西的增減損益，它改變一切。(何道寬譯，2010:18)

在此，如同 Neil Postman 將自然科學借用到社會學科，自然科學中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與混沌理論(chaos theory)，亦可以用來說明媒介生態學在意義探詢過程中的兩種特質：前者指的是在一個動力系統中，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蕭如珀、楊信男，2008)。後者則主張表面現象上的混亂，其實一旦能夠從整體的關係角度加以把握，那麼(媒介)系統中的某些律則就可能被揭示出來(夏春祥，2015)。

關於媒介變革的整體性影響，還伴隨著另一種現象：突變臨界(break boundary)。意指任何媒介都處在某種臨界點上，可能突變為另一種模樣；最

常見的突變臨界成因，就是前文提到的媒介間的配生(鄭明萱譯，2006:73)。Neil Postman(蔡承志譯，2007:48)則指出，重要的新媒介會改變論述的結構，也就是改變符號環境，其一開始也都是漸次遞增，接著就達到臨界點。

六、媒介生態學的理论命題

媒介生態學的基本觀點認為，「媒介」是一種傳播過程中，引起接收者生理、感官作用的物質或技術。在此認知基礎上以及從「媒介即環境」的概念裡，林文剛(何道寬譯，2010:38-40)指出媒介生態學嵌入了三個互相聯繫的理論命題：

其一，媒介生態學假設，傳播媒介不是中性、透明和無價值標準的管道。媒介固有的物質結構和符號形式扮演著界定特性的角色，形塑了何種資訊會以及如何被編碼和傳輸、如何被解碼(例如數位文本與印刷文本體現了截然不同的兩套符號結構和物質結構或物質形式)。其二，不同傳播媒介中固有的不同物質形式和符號形式，預先就設定了相應的不同偏向。其三，媒介生態學進一步假設，傳播技術促成的各種心理或感覺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結果，往往和該傳播技術固有的偏向有關。

據此，從(軍事)傳播研究的角度，例如可以思考媒介是如何成為環境，也就是探問媒介結構如何界定訊息的性質、媒介有何偏向以及媒介的變化產生什麼樣的生態性影響，尤其是探究媒介環境和閱聽人的認知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聯。

總括地說，做為一個學派，媒介生態學有其對於媒介研究的思想傳統、清晰的理念和核心觀念，並吸納了多維的學術觀點，開展出諸多的理論觀點或主題，本文礙於篇幅，僅能做呼籲式的表述和提要，無法詳盡列舉介紹。至於，如何恰當或有效地運用這些理論命題或解釋性觀點，林文剛則建議，可以看研究者想要解決何種問題，以及看問題處在何種具體的社會脈絡當中(何道寬譯，2010:41)。只是，前文提及媒介生態學取徑的研究能量不足，學術處境落於邊陲，受到重視的力度尚有待提升。

陸、媒介生態學的當代契機

本文提出重思媒介生態學的當代意義及其發展的幾個契機，並例舉非傳播領域的一些研究成果，旨在說明這些跨領域研究不僅呼應媒介生態學研究的當代意義，也有助於擴大媒介生態學的理论視野。

首先，把對於(不同)媒介具有不同性格與(潛在)作用的這種想像與理解，放到當今新媒介科技的脈絡中來看，顯得格外具有意義。其一，在媒介形式上，它幾乎集結了包括口語、文字、聲音、攝影、靜態圖像、動態影音等所有的跨媒介(transmediality)樣態，有些媒介技術更已觸探到我們嗅覺、味覺與觸覺等全感官範疇，這使得媒介與人的關係因被高度擠壓而不可分割的狀態，尤甚於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其二，媒介生態學關切的核心，是傳播媒介的變化如何促進文化根本的、大規模的或生態的變化(何道寬譯，2010:41)，但由於歷史因素，以往研究者觀察媒介變化的時空跨度總是相當巨大。而今，在網路及媒介匯流環境下，各種主流、非主流媒介(技術)之間的興替消長，不僅趨於複雜、密集而且快速，已非往昔動輒百年千年大尺度時空的媒介演化規模。戲劇性地說，這像是一場媒介頻頻更迭的世紀變臉秀。

早在上世紀末，媒介匯流才初發展之際，國內已有一些傳播學者即試圖揭示其影響層面。例如鍾蔚文等學者(1996)，就曾引用 Innis (1965)的觀點提醒傳播研究者，除了在表面層次上必須熟悉各種媒介的條件，在深入的層次上，強調使用新科技不僅只是技術考量，它同時也是一種思維的革命；例如文字媒介出現之後，促進了邏輯思考能力的發展，因而也改變了人們思考的方式。

較為可惜的是，這些蘊含典型媒介生態學所傳達的基本觀念，在後續的學術能量上「較嚴肅的討論尚未多見」(鍾蔚文等，1996)，本文希望提出有利於媒介生態學發展的一些契機，藉以重思媒介生態學的當代意義。

一、契機之一

若回顧媒介生態學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在時空方面，研究者所考察以及處理的主題大多偏重於長時期、大範圍(這主要是囿限於以往人類主流傳播媒介技術演變歷史緩慢的現實因素)；這也導致在分析取向上，比較多是採取主觀性、詮釋性的論述推演為主。雖然，能夠從宏觀角度，分析媒介對於文明

興衰以及文化變遷的影響，卻較缺少媒介短期效應的即時觀察，更遑論做為宣傳或說服之應用。

而探索當代媒介科技影響的契機之一，就在於各種媒介在技術和物質形式方面的嬗遞演變，趨於更快速、更多樣態；換言之，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研究者能夠在較短時期內，便可觀察甚而捕捉到媒介間興衰消長所帶來的個人、社會以及文化效果，並適時地轉化為傳播策略之操作。

匯流時代新媒介技術不斷更新，不僅改變閱聽人的使用經驗，也改變閱聽人與外在世界的互動與認知模式(李蔡彥、鄭宇君，2011)，而這種改變的頻率不再是以世紀而是以日、月為單位。(軍事)傳播研究藉助媒介生態學觀點，得以深度探索媒介科技與閱聽人的接合關係，例如它如何影響閱聽人的認知、情感、認同、價值觀，甚至夢想。

二、契機之二

此外，除了傳播學領域，目前已有許多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從各自的專業領域，逐一證明或提出有利的資料、數據以及研究發現，能夠呼應媒介生態學的諸多理論觀點，這必然有助於以往媒介生態學總是被批評過於「宏觀」、缺乏「實證」的刻板印象，這些專業領域包括語言學、行為科學、心理分析、(腦)神經科學、社會學甚至哲學等各領域。

以往媒介生態學對媒介效應之探索，借用跨領域知識大多做為概念的輔助說明或註解。拜當代科學發達之賜，提高了相關研究的質量、速度以及準確性。例如，數位視覺研究者 Deikman 透過實驗證明，電子媒介能刺激人的右腦，強化人們對媒介(形式、構造)的感知，也讓知覺越發敏銳(賴玉釵，2010:102)。可以說，當前是媒介生態學學說或觀點進入「驗收期」的一個最佳階段。

篇幅所限，本文僅就上述關於媒介生態學研究的契機之二，擬舉出幾個有名的非傳播領域的科學實證成果，以助瞭解傳播學科之外其他領域的一些學術研究，如何與媒介生態學的理論觀點產生聯繫或呼應：

首先，行為科學家 Ted Nordhaus 等人曾基於早期數位科技的高速發展，而研究消費信用對人類大腦產生的效應(Nordhaus & Shellenberger, 2007)。結果顯示，用信用卡付帳的人願意透支去度假的情況，幾乎是用支票付帳者的

兩倍；而經常使用信用卡的人，大多不記得自己付了多少錢。其它相關研究也發現，使用信用卡的人所花的錢，通常比使用現金的人還要多，給的小費會比較多，在拍賣會的出價也比較高(廖建容譯，2015:83-85)。將金錢視為一種社會媒介或內在希求與動機的延伸，這儼然就是麥克魯漢所宣稱「現代心理分析理論的中心思維，就在於金錢情結與人體之間的關係」(鄭明萱譯，2006:166-170)」的後續註解。

第二個實驗是關於電視會影響人們夢境的顏色。根據英國蘇格蘭 Dundee 大學心理學家 Eva Murzyn (2008)的研究發現，大部分 25 歲以下的年輕人做的是彩色的夢，55 歲以上的人的夢經常是黑白的。研究者的解釋，這應該是小時候只接觸黑白電視的關係，而在時隔 40 年之後，他們依舊作著黑白的夢(黃心健，2013:94)。這是關於長時期接觸不同電視媒介影響人們做夢色彩的媒介生態學證據之二。

第三個實驗稱為「看不見的大猩猩」(Invisible Gorilla)，它原本是心理學家 Daniel Simmons 和 Christopher Chabris 在 1990 年代晚期所設計的實驗。該研究的結論大意是說，由於「無心的盲目」，人們往往專注於一項任務，而無法察覺到外部資訊(即看不見從旁經過的大猩猩)。而在 21 世紀的今天，當媒體文化研究者再播放「看不見的大猩猩」的測試錄影帶給年輕學生觀看，卻幾乎每個人都看到了大猩猩(林薇譯，2016:86-87)。該實驗的推斷是，在電玩遊戲和觸控螢幕伴隨之下長大的世代，已經習於以不同的方式在觀看我們的世界。這是關於電玩或觸控螢幕媒介，改變了年輕人觀看世界的方式的媒介生態學證據之三。

援引這些傳播學領域以外的實證研究，在於表明這些非傳播領域的研究實踐，往往與媒介生態學的學術旨趣不謀而合，有其重要的學術匯流意義；而藉助這些跨領域學科的研究成果，不僅能為媒介生態學的理论基礎帶來更多的信心來源，也同時能夠拓寬媒介生態學的探索視野和觸角，並讓研究內涵更豐富與完整。

柒、結語

隨著匯流科技與各類互動式科技的不斷發展與普及，不僅使得我們的媒介環境、社會型態、媒體特質、消費者習性等，都處於一種持續變遷、不斷進化的動態發展邏輯之中，同時也在快速影響著傳統以大眾傳播媒介為基底的傳播生態(唐士哲，2014:3)。可以說，當前是媒介與傳播的關係，處於最蓬勃、卻也最動盪的年代，(軍事)新聞傳播領域首當其衝。

全球傳播概念正在發生變化，軍事傳播學的涵蓋範圍，已經從傳統的口語傳播、單向的大眾傳播時代，進展到強調差異的分眾傳播、甚至是傳播者與受眾界線模糊的泛眾傳播時代。今天，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概念下，一切都是媒介，媒介形態且在不斷快速循環演變。以往軍事傳播研究較偏重三個基本分析層面：傳播內容的產製、內容以及閱聽眾的接收(Oates, 2008)，或是將探討的主題焦點大多放在媒體組織上(方鵬程，2005)，在萬物皆媒的匯流時代稍顯不足，以擅長分析媒介形式及其特性的媒介生態學，可以做為這方面的補強。

事實上，媒介生態學深知「技術心理學」的重要性，它是研究人在技術創新影響下的心理狀態的一門科學，媒介生態學學者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曾強調，我們的心理現實並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往往取決於我們的環境(包括我們自己的技術延伸)對我們施加的影響，甚至形成一種足以形塑社會趨勢的技術文化場(techno-culture field) (汪冰譯，1998)。而軍事傳播事務的核心使命之一，即是希望透過不同溝通介面影響個人、群體、整個社會以至國際之間。

整體而言，媒介生態學主張媒介(形式、技術)的本質帶有某些「偏見」，因此會傾向於某些方向，而輕忽其他方向。就像在同樣因素下，掌管科技動態的物理學和數學，容易偏向某些行為(例如演算法導致同溫層現象)。因此，從軍事傳播研究而言，探究並把握媒介偏好的方向，讓我們的期望與目標臣服於各種媒介的基本趨向，就能把媒介的好處發揮到極致。而使用特殊的媒介科技時，若能配合偏好的軌道，便更容易控制複雜性、提高獲益以及減少傷害(嚴麗娟譯，2017:25-30)。

基於以上的認知脈絡，本文認為媒介生態學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就在於能夠提供必要的思想洞見與觀察方法，幫助我們更確實理解並解決當代個人、社會與媒介科技之間糾纏的諸般課題。也期待(軍事)傳播研究，可以在媒介生態學既有方法與理論基礎上，持續整合散落於各領域(也包括傳播領域

本身)的知識資源與經驗，成為一有系統的研究領域，如同翁秀琪(2011)所倡言的「概念系譜學」方式，深究各類與媒介相關的概念，以掌握新傳播技術快速演化中，不斷突現的(emergent)攸關新媒介的各種重大議題。

最後，一如媒介生態學將歷史以媒介分期的傳統，軍事傳播學者胡光夏(2007；2010)曾依照傳播科技發展歷程，將媒體報導戰爭的歷史概分為平面媒體、電視戰爭、衛星與有線電視及電視直播與網際網路等四個戰爭報導時期。今天，在智慧手機、社群媒體、影音媒介、大數據等科技融合交揉發展下，全球的戰爭報導也將進入第五個階段：媒介匯流時期；它強調多種媒介技術或新舊媒介之間取代、互補以及組合，如何影響訊息傳遞和閱聽人感知的多元可能性思維。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長河(2019)。〈第七代戰爭〉。《台北論壇》。發表日期：2019年3月14日。資料來源：<http://www.taipeiforum.org.tw/view/517.php>。
- 方鵬程(2004)。〈我國軍隊形象塑建之研究—公共關係取向的探討〉。《復興崗學報》，2004年，82，145-168。
- 方鵬程(2005)。〈導論〉，樓榕嬌等著，《軍事傳播：理論與實務》，3-18。台北：五南圖書。
- 台灣媒體趨勢報告(2013)。〈失控的螢幕！〉。《動腦雜誌》，凱絡媒體台灣媒體趨勢報告編輯小組，(2013.09.17)。資料來源：<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19138>。
- 宋瑛堂譯(2012)、伊萊·帕理澤。《搜尋引擎沒告訴你的事》。臺北市新店區：遠足文化。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 何道寬(2007)。〈媒介環境學辨析：媒介環境學評論之二〉，《國際新聞界》，第1期。
- 李金銓(2014)。〈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一些個人的初步思考〉。《傳播研究與實踐》。第4卷第1期，2014年1月，1-21。
- 李明偉(2014)。《知媒者生存：媒介環境學縱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蔡彥、鄭宇君，〈資訊科技與新媒體研究之發展〉，《傳播研究與實踐》，第1卷第1期，2011年，75-76。
- 汪冰譯(1998)、德克霍夫。《文化肌膚：真實社會的電子克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Derrick de Kerckhove (1995). *The Skin of Culture*.
- 林薇譯(2016)、尼可拉斯·莫則夫。《給眼球世代的觀看指南》。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Nicholas Mirzoeff (2015). *How to See the World*.
- 林正愷、潘漢強(2019)。〈新媒體時代公共危機事件處理的符號建構—以陸軍工作失慎事件微電影為例〉。《國防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三期，2019年9月，41-60。
- 何道寬譯(2010)。《科技奴隸》。台北市：博雅書屋。Neil Postman (1992).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 何道寬譯(2010)、林文剛編。《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臺北市：巨流出版。頁 159-197。Casey Man Kong Lum.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
- 宋偉航譯(2000)、保羅·李文森。《數位麥克魯漢》。臺北市：貓頭鷹出版。Paul Levinson (1999). *Digital McLuhan: 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
- 胡光夏(2007)。〈傳播科技發展及其在不同時期戰爭中的新聞產製〉。《復興崗學報》，2007年，第90期，37-72。
- 胡光夏、陳竹梅(2010)。〈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復興崗學報》，2010年，第98期，1-26。
- 胡定傑(2019)。〈設計思考導入國防事務傳達對讀者接受度之初探－以我國2017年國防報告書為例〉。《復興崗學報》，114期，175-236。
- 胡菊蘭譯(2016)、蘭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麥克盧漢與媒介生態學》。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
- 范龍(2009)。《媒介的直觀：論麥克魯漢傳播學研究的現象學方法》。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翁秀琪(2011)。〈什麼是「蜜迪亞」？重新思考媒體〉。《傳播研究與實踐》。第1卷第1期，2011年1月，55-74。
- 夏春祥(2015)。〈傳播的想像：論媒介生態學〉。《新聞學研究》。第125期，143-174。
- 陳立恆(2012)。〈Lady Gaga vs. Bob Dylan〉，《聯合報》，刊登日期：2012年4月30日。資料來源：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060910.shtml#ixzz1tUUFNuU9>。
- 陳玉箴譯 (2003)。《媒介概念十六講》。新北市：韋伯文化。Roger Silverstone.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 陳靜君(2010)。《體驗行銷運用於文化創意產業之效果研究－以電視劇「新兵日記」為例》。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唐士哲譯(2013)。〈典律的反文本：麥克魯漢的《瞭解媒介》〉。《傳播研究的典律文本》。頁 209-233。台北市：五南。Elihu Kats, John Durham Peters, Tamar Liebes, Avril Orloff (Ed.) (2003). *Canonic Texts in Media Research*.
- 唐士哲(2014)。〈重構媒介？「仲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新聞學研究》，第12期，1-39。
- 徐慧萍、延英陸(2015)。〈當前媒體匯流環境下軍事新聞對社群媒體應用之研究〉。《復興崗學報》，第107期，1-30。
- 張真繼、張潤彤(2008)。《網絡社會生態學》。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

- 莫大華、陳偉華、陳中吉(2018)。〈第四代戰爭的理論發展與研究議題：以戰略溝通活動為例〉。《第十二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 黃心健(2013)。《科技蜃樓》(Technology Mirage)。臺北市：大塊文化。
- 黃千珮、陳非易、羅揚(2019)。〈閱聽者反饋與文宣效益－解析社群媒體場域中的國軍形象影片〉。《復興崗學報》，2019 年，第 115 期，95-132。
- 曾雅琦(2013)。《數位行銷與閱聽人體驗之研究－以「台灣特戰部隊」、「台灣菁英部隊：陸戰蛙人」紀錄片為例》。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明萱譯(2006)。《認識媒體：人的延伸》。台北市：貓頭鷹出版。
- McLuhan, Marshall (199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 廖建容譯(2015)、保羅·羅伯茲。《衝動效應：衝動型社會的誘人商機與潛藏危機》。臺北：遠見天下。
- Paul Roberts (2014). *The Impulse Society: What's Wrong with Getting What We Want*。
- 蔡承志譯(2007)。《娛樂至死》。台北市：貓頭鷹出版。
- Neil Postman (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 劉靜怡譯(2002)。《網路自由與法律》。台北市：商周出版。
- Lessig, L. (1999).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 賴玉釵(2010)。〈「傳播」若成為獨立學門，會抑制研究多元化之情況嗎？－從「反對建制學門」的辯論談起〉。《傳播與管理研究》，第十卷，第一期，82-110。
- 蕭如珀、楊信男(2008)。〈羅倫茲和蝴蝶效應〉，《物理雙月刊》，三十卷一期。資料來源：<http://case.ntu.edu.tw/blog/?p=1616>。
-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幾個極端的想法〉。《新聞學研究》，第 53 集，107-129。
- 鍾士宏(2013)。《體驗行銷、體驗價值、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以 102 年全民國防暑期戰鬥營新增營隊為例》。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碩士班碩士論文。
- 謝鈞(2019)。〈品牌斜槓 e 世代「國軍行銷策略」經得起考驗嗎？〉。《流行文化與軍事傳播》，發表日期：2019 年 3 月 13 日。
- 謝清俊(2006)。《謝清俊談人文與資訊》。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維運管理分析分項計出版子計畫(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資料來源：<http://cdp.sinica.edu.tw/cchsieh/book/hcc-book1-35.pdf>
- 聯合新聞網(2019)。護眼調查 國人日用 3C 逾 10 小時 乾眼症年輕化。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080674>。檢索日期：

2020.06.15。

邊明道(2016)。〈溝通媒介對遠距關係中之軍人與配偶維持情感之影響－美軍相關研究文獻之後設分析〉。《復興崗學報》。民 105 年 12 月，109 期，55-76。

蘇文淑譯(2006)。《架構的生態系：資訊環境被如何設計至今》。臺北市：大鴻藝術。濱野智史(2008)，アーキテクチャの生態系 情報環境はいかに設計されてきたか。

蘇建州(2010)。〈網路使用者之媒體共用偏好與網路關鍵字廣告效果研究〉，《新聞學研究》，第 103 期，1-42。

蘇碩斌譯(2009)。《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台北：群學。吉見俊哉，メディア文化論：メディアを学ぶ人のための 15 話。

蘇碩斌(2009)。〈因緣：譯作的偶然與感觸〉。吉見俊哉原著，蘇碩斌譯，《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頁 IX-XIII。台北：群學。

嚴麗娟譯(2012)。《科技想要什麼》，台北市：貓頭鷹出版。Kevin Kelly (2010). *What Technology Wants?*

嚴麗娟譯(2017)、凱文·凱利。《必然：掌握形塑未來 30 年的 12 科技大趨勢》。台北市：貓頭鷹出版。

英文部分

Bolter, J. D. (2007). Digital essentialism and the mediation of the real. In H. Philipsen & L. Qvortrup (Eds.), *Moving media studies-remediation revisited* (pp.195-210). Danmarks: Samfundslitterature Press.

Huang, E., Davison, K., Shreve, S., Davis, T., Bettendorf, E., & Nair, A. (2006). Bridging newsrooms and classrooms: Prepa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for converged medi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8 (3), 222-260.

Innis, H. A. (1965). *Empire &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Kevin Kelly (2016). *The Inevitable: Understanding the 12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will shape our future*.

McLuhan, M. & Fiore, Quentin. (2008).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Penguin Group UK.

Murzyn, E. (2008). *Do we only dream in colour? A comparison of reported dream*

- colour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with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black and white media. *Conscious and Cognition*, volume 17, Issue 4, December 2008, p.1228-1237.
- Nordhaus T. & Shellenberger, M. (2007), *Break Through: From 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 to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Oates, S. (2008). *Introduction to Media and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Renckstorf, K. & McQuail, D. (1996). Social action perspectiv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In K. Renckstorf, D. Mcquail, & N. Jankowski (Eds.), *Media use as social action: A European approach to audience studies* (pp. 1-17). London: John Libbey.
- Roberts, D. F., Foehr, U. G., & Rideout, V. J. (2005). *Generation M: Media in the lives of 8–18 year olds*. Retrieved from <http://www.kff.org/entmedia/upload/Generation-M-Media-in-the-Lives-of-8-18-Year-olds-Report.pdf>.
- Van Loon, J. (2008). *Media techn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 Berkshir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Webster, F. (2003). Information Warfa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edited by D. K. Thussu and D. Freedman, pp. 57-69.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Zaltman, Gerald. (2003). *How Customers Think Essential Insight into the Mind of the Market*.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匯流趨勢下的軍事傳播研究：再思媒介生態學當代意義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之 職能導向初探

錢淑芬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系

摘 要

根據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相關規定，顯示非學分課程對政戰初官人才培育具有重要影響。然而，軍官養成教育的相關研究中，有關非學分課程架構之理論基礎的探討，甚付闕如，尤其在國軍「為用而育」的教育政策下，軍官養成教育該如何透過非學分課程，以提升軍校育才與部隊用才的連結，值得重視。本文主旨就在於論述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對軍官養成教育的特殊意義，並探討非學分課程架構的理論基礎，以及從職能觀點探討非學分課程該如何發揮培育功能。在論述上，首先說明初官人才培育應該重視職能觀點的理由，並針對政戰官科說明初官職能及其中構面之一的核心職能的意涵，希望能夠為非學分課程的教育功能奠定理論基礎。其次，從軍人職業及工作場域的特殊性，論述政戰初官養成為何需要設置非學分課程。接著，論述初官培育的養成環境和校園文化結合初官職場特性，對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達成國軍「為用而育」政策的重要意義。最後，參考職能導向課程相關文獻，就職能導向課程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上，綜整為四項規畫重點，分別是：1.課程目標與多元性職能內涵。2.以實務技能為主的課程模組。3.以政戰初官職場特性作為課程規劃藍圖。4.重視學習成效評量。

關鍵詞：初官、職能、非學分課程、軍官養成教育、政戰官科

An Preliminary Exploratory about Competency-Based Orientation of Non-credit Curricula of the FHK College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hien Shu-Fe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Fu Hsing Kang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FHK College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it is shown that non-credit curricula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ultivating the Political Warfare officers' talent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non-credit curriculum structure in the military education. Under the military's policy "education for use," it is worth exploring how to use non-credit courses for officer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link between milit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demands of troop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the non-credit curricula of the FHK College to military officer development education,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non-credit course structure, and examine non-credit courses' cultivation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ence.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discussed how to make non-credit curriculum planning to be a competency-based program.

錢淑芬

Keywords: Initial-officer, Competency, Non-credit curriculum, Military officers develop education, Political warfare

壹、前言

一、研究緣由

20 世紀後期，先進國家將攸關人力素質良窳的「職能」，視為提高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重要議題。目前泛太平洋地區已建立國家職能標準制度的，包括美、日、澳、新加坡、香港等(工研院產業學院，2015)。我國於 2010 年通過的「產業創新條例」，其中第 18 條即是針對產業人才資源發展之能力內涵而特別訂定的，於是成為我國推動職能基準的重要法源。該條例主要在於肯定以職能基準與能力鑑定作為產業發展之必要性，並作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置職能基準、訓練課程、能力鑑定規範與辦理職業訓練等服務資訊之依據(勞動部，2019a)。行政院各部會截至 2019 年 7 月，已經完成職能基準建置的共計有十個部會，惟國防部尚未躋身其中(勞動部，2019b)。這些部會所發展建置的職能基準，累計有 454 項獲得職能基準品質的認證標章，透過 iCAP 平台公告後提供各培訓單位、學校、企業等機構組織，運用於相關領域的人才甄募、培育、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勞動部，2019b)。

國內產業界咸認為建置產業職能基準，可以提供企業作為用人標準之參考，不僅讓求才與求職雙方能夠適才適所，也有助於組織降低徵才與辦訓的成本。此外，產業職能基準也能提供學校及培訓機構作為課程規劃的參考，使培育對象或受訓人員能夠學習到符合職場需求的職能。近年來，國內民間不論是工商企業、學校或法人機構等，都相繼投入職能建置及相關應用，累積的成果頗為豐碩。國軍近年來積極推動官兵考取國家專業證照，這也顯示國軍對職能的重視，但是對於職能分析與應用，卻明顯不足。當國軍邁入全志願役常備部隊以後，該如何在甄才、育(訓)才、用才等方面，提升官兵人力素質以符合國軍推展的「精兵政策」(國防部，2019a)，已成為重要議題。職能相關文獻指出，職能可廣泛應用於組織的人資管理與發展上，包括甄選、培訓、安置、績效考核等方面，對於提升人員的工作績效、發掘潛在人才、組織管理效益等也頗多助益(Kennedy & Dresser, 2005; Cardy & Selvarajan, 2006; Goldman & Scott, 2016; Stone, Webster, & Schoonover, 2013)，值得國軍參考。

國軍開始實施募兵制後，為提高社會青年加入國軍的意願，應該加強國軍各類官科(職務)的專業如何接軌社會職場上相關的產(行)業，俾利於志願役士官兵、常備役軍士官的服役經驗，在退伍後轉業能夠與社會就業接軌，例如服役期間的專業成長能夠得到社會相關專業領域的認可，提高在社會上謀職的就業競爭力與職場工作表現。目前行政院積極推動的我國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乃是提供國軍與社會產業或職(行)業接軌的良好平台，對於敦促國軍提升教育品質與訓練成效、或是提高社會肯定國軍專業形象與職業聲望等，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軍校教育若有職能基準提供參考，對於課程規劃或教學設計、校園文化塑造等，將更有利於軍校育才與部隊用才之間的密切連結。

二、問題背景

培育人才是大學校院的成立目的，並以學位頒授作為對畢業生具備專業學能的認證。如何透過學分課程培養學生的專業學能，就成為大學校院系(組)主要的教育目標。國防大學基礎學院各系(組)對學分課程的規劃，在學位授予相關法則和專業領域要求水準的規範下，大致上與一般民間大學無甚差異；另一方面，在國防部對人才培育「為用而育」的政策下(國防部，2019a)，國防大學基礎學院仍有別於民間學校，差別主因在於該校基礎學院包括政戰學院、管理學院、理工學院等，是以培育國軍陸、海、空軍的軍官人才為主(國防大學官網／設校宗旨，2020)。由於部隊環境和軍事任務的特殊性，該校為了培養符合國軍需要的初官人才，有必要對養成環境、課程與教學做某些特殊規畫與設計，而這些通常不在學分課程的範圍之內，所以該校需要由校部和院部兩層級，另外量身訂做符合需要的相關課程。依照該校訂頒的「國防大學學生研究學則」第 57 條、基礎學院訂頒的各年班教育計畫，把為配合教育目的之特殊性而訂定的這些相關課程稱為「非學分課程」(國防部，2019b；國防大學政戰學院，2020)。

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為例，「非學分課程」是指由校、院層級，在各年班的教育計劃中，依照各學年度的武德教育目標規畫相關課程，並在課程實施之前先訂定出課表，課表內容包括科目名稱、教學目標、授課年班與時數、授課人員與上課學生、上課地點與時間、成績評量(核)方式等。依照

「國防大學學生研究學則」第 57、62 條，正期生在畢業前必須完成四個學年非學分應修課的全部科目(含上課時數)，以及所有科目的成績評量(核)都必須達到及格標準，才能取得畢業資格。由於這些科目不屬於學分課程的範圍，故不計入畢業學分。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實施時間，涵蓋入伍教育(八週)、暑期教育(八至九週)和學年教育(18 週)，相關課程主要包括體育課程、軍事訓練基本教練與軍人特質教育等課程。

國防大學基礎學院的非學分課程，在全部教育時數中原就佔有相當份量。以該校政戰學院為例，四個學年(八個學期)的學分課程共計應修業 128 學分(至少)。若以一學分每週授課一小時計算，一個學期(18 週)每學分的教育時數為 18 小時，八個學期共計 128 學分的教育總時數為 2,304 小時(至少)。在非學分課程這部分，除了學年教育會安排課程，另外在入伍教育和暑期教育也有安排課程，總計四個學年的非學分課程的教育總時數為 2,088 小時(至少)(國防大學政戰學院，2020)。依照上述，政戰學院的課程時數就非學分與學分的比率來看大約是 48%：52%，顯示兩者在教育時數的比重上幾乎是各佔一半。除此之外，非學分課程的學習評量(核)結果也將影響畢業資格的取得，國防大學依據國防部相關法則所訂頒的「國防大學學生研究學則」第 57、62 條(國防部，2019b)，規定學分和非學分的成績都必須達到及格標準才符合畢業資格，兩者之中只要缺其一就無法取得學士學位，也不能授予少尉軍階和取得任官資格。由此可見，國防大學基礎學院非學分課程對初官人才培育的重要性。

國防大學基礎學院雖有設置非學分課程，希望使部隊用才和軍校育才之間可以有更佳連結。但是，該如何發揮非學分課程對初官人才的培育成效，值得重視。以政戰學院為例，該院於 2006 年改隸國防大學後的第一次校務評鑑時，非學分課程才粗具整體性規劃，相較於該院各系(組)的學分課程仍有待加強之處。目前大學系(組)對學分課程的科目規劃與學分配比，主要是依照專門領域例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史哲學、生物科學、醫學、藝術…等，參考各領域所包括之各種學門對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要求來訂定之。不過，近年來國內外有感於「學用落差」的問題日益嚴重，於是各國政府開始推動由產、官、學、研各界，就某專業學門或某產(行)業進行職能基準的建置與發展，提供企業組織作為人力資源管理的參考，或是提供大學育才作為相關系(組)規劃學分課程的參考，希望可以藉此改善學用落差的問題(勞動

部，2019；工研院產業學院，2015)。雖然，目前國軍政戰官科尚未建置職能基準，無法提供政戰學院各系(組)的學分課程和校、院層級的非學分課程作為規劃參考；但是，職能觀點及國內高等教育開始興起的「職能導向課程」，對軍官養成教育精進非學分課程仍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是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對培育政戰初官具有重要功能，是故該如何透過非學分課程提升軍校育才與部隊用才的連結，使國軍人力資源效用的發揮可以更大，已是刻不容緩。

管理領域所指的職能(competency)，強調適應生活和勝任工作的所需條件是多面向的，因此職能基準的含括面向除了著重認知層面，還包括技能層面和情意層面；由此可見，職能觀點想要修正過去偏重學識的缺失，這與近年來帶動教育改革的素養理念，不謀而合。教育領域所指的素養(competency)，認為學校教育不應只偏重學科知識的傳授，還應該培養學生具備生活適應、人際關係、社會參與或終身學習等相關素養，以及課程與教學應強調與真實生活情境的結合，而這也是「全人發展」教育的主要精神(蔡清田，2019；黃琇屏，2019；張芬芬，2019；許家驊，2019；王佳琪，2017)。由此可見，職能觀點與素養理念的意義相通。近年來，國內外的大學校院系(組)，除了參考職能基準來訂定教育目標、規畫課程和教學活動，更直接發展職能導向課程(張淨怡，2018；呂良正，2014；鄭霈絨、吳志富，2014；張一蕃，2014a)，其實就是國內高等教育對素養理念的一種回應。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的非學分課程，依照規定直接影響畢業資格和學位取得，顯見非學分課程對培育政戰初官人才的重要性。然而，若要加強非學分課程的培育成效，使部隊用才和軍校育才可以有更佳連結，則應加強對非學分課程架構之理論基礎的探討，以及研擬更合適的課程規畫和教學活動。本文認為可以嘗試將「職能導向」導入非學分課程，本文主旨就在於針對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對政戰初官職能培育的重要意義做理論性探討，並從職能觀點論述非學分課程該如何發揮初官養成的培育功能，以及如何將職能導向課程應用在培育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非學分課程上。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論述

一、職能理念導入軍官養成教育

管理領域的「職能」與教育領域的「素養」，其實兩者的意義相通且關係密切。國內教育學者認為現代公民的應有素養乃是多元層面的，例如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三大面向九大項目，即是依照核心素養(core competency)的多元性內涵，就如何培養學生成為現代公民而訂定的(教育部，2014)。大致上，素養的多元性內涵，可歸納為認知(學習知識所需的理解、分析、邏輯等核心能力)、情意(態度、價值與欲望)、技能(專業技術應用)等三種層面(李坤崇，2013；蔡清田，2016；林永豐，2012；Carrigan, 2018；Rychen, 2004；Anderson, Krathwohl & Bloom, 2001)。其次，認為個體為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素養，必須是經由中小學到高等教育的連貫性和持續性的培育，以及能夠將學校所學真正落實到實際生活的情境中，方能克竟其功。因為素養的形成與發展必須經過長時期的學習、反省思考與行動實踐，並且累積不同情境與學習領域的應用經驗，以提升在複雜環境中完成任務與促進社會發展的能力(Rychen & Salganik, 2003; Stein, McHenry, Lunde, Rysst & Harstad, 2001 引自黃琇屏，2019)。因此，除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配合新課綱推動素養導向課程，到了大學教育接著推展職能導向課程，不僅延續十二年國教的素養教育理念，同時也因應國內近年開始推動的職能基準建置與發展，將職能觀點導入大學教育的課程與教學。

管理學領域對「職能」的定義，是指能夠勝任某職務或成功扮演某角色的所需特質，這些特質可以歸類為不同層面(例如能力、知識、技術、態度與價值觀等)，以及這些特質對個人工作表現的影響，可以透過客觀的標準和評量方式來衡鑑之，也可以經由培育訓練來加強之(Bertoncelj, 2010; Byham & Moyer, 1996; Raymond 1999; Arthey & Orth, 1999)。雖然，有些學者認為屬於人格深層的特質是與生俱來的，較不容易像技能和知識可以藉由後天學習或培訓而予以改變或發展(Spencer & Spencer, 1993; Draganidis & Mentzas, 2006)；但是，仍有學者認為涉及職務的任何情境或活動，不論是個人的知識、技術或是性格，都有可能經由體會、了解及經驗累積來加強或發展之(Campion, Mumford, Mogeson & Nahragang, 2005; Raymond, 1999)。此外，也有學者認為職能是與生俱來與後天學習的綜合體，其中的潛能和個性是與生俱來的，技能和知識是後天學習的，這兩者之間會互相影響而產生綜合效果

(Lucia & Lepsinger, 1999 引自黃新福、趙浩然，2014)

一般而言，職能區分為四大類，分別是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y)、管理職能(managerial competency)、職務職能(functional competency)及一般職能(general competency)。「核心職能」就組織專屬性(organization-specific)而言，不僅適用於組織內的所有成員，還應該要能夠反映該組織的中心價值、願景、使命及中長期的經營策略。此外，核心職能也可以是指執行某特定工作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管理職能」是指主管人員執行特定職務或角色時，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及特質的總和，當職位層級不同或職務不同，需要具備的管理職能也有所不同，例如高階決策、中階規劃、低階執行，或是因為部門不同例如行銷主管、生產線主管、研發主管等，在管理上需要具備的職能即有所差異。「職務職能」是指與職掌內容直接相關的專業性技術，也就是可以有效達成工作目標所需具備的特定技能，例如會計要具備收支憑證編制能力、營繕工程要具備發包能力等。「一般職能」是指從事某類工作必要的門檻才能，例如書寫能力、電腦操作基本技巧等(李威穎，2010；劉志綱，2016)。

以政戰官科為例，本文參考管理學的職能觀點、教育學的素養理念、國軍政戰工作的主要內容、職場環境等，將國軍政戰初官職能定義為，政戰初官在適應職場和勝任工作上所需的職能基準。大致上，政戰初官職能基準，可以歸納為核心職能、管理職能、職務職能、一般職能等四大類。理論上，「政戰初官核心職能」是指，政戰初官不論軍種、單位或政戰職務的不同都應具有的職能基準，包括認知層面應有的核心能力、情意層面應有的基本素養、技能層面應有的關鍵技能等，例如核心能力是指學習如何適應職場和勝任工作之相關知識所需的認知性能力，基本素養是指對軍人價值與角色規範、國軍使命、國軍政戰工作等產生認同、學習動機與積極態度等情感與意向，關鍵技能是指應用專業技術的基礎能力，使部隊基層政戰工作得以順利執行之。「政戰初官管理職能」是指，政戰低階幹部為領導士官兵與管理基層部隊，在認知、情意、技能等層面需要具備的基準條件。「政戰初官職務職能」是指，執行政戰工作的某項職務例如心輔、新聞、文宣、人事…等所需之基準條件。「政戰初官一般職能」是指，執行政戰工作時無論任何單位與職務，都需要具備的基準條件，例如軍歌教唱、簽呈公文、簡報和 ppt 製作、單位預算編列和經費結報…等。

國防大學基礎學院的教育宗旨，在為國軍培育武德武藝兼備之領導與專業人才(國防大學，2020)，對正式課程(含學分與非學分)的規劃即須以此教育宗旨為依據。依照目前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現況，本文認為其中頗多與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含意有相通之處，以及課程內容所強調的也大多是不分軍種、單位和職務的政戰初官皆應具有的，這亦符合該校基礎學院以培育國軍陸、海、空軍之領導與專業人才的教育目的。隨著職能受到產、官、學、研各界的重視，如何讓職能養成能夠在學校教育落實即成為關注議題，其中與職能導向養成教育(competency-based nursing education)密切相關的職能導向課程，即是其一。然而，由於目前國軍政戰官科尚未建置職能基準。因此，本文談及政戰官科職能時僅能做概念性說明，對於政戰官科職能的構成類別之一的核心職能，本文也只能做定義說明，並無法具體指出其中究竟涵蓋了哪些職能基準，尚有待未來研究完成對國軍政戰初官職能基準的建構，屆時即可作為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規劃參考。

二、非學分課程對軍官養成的重要意義

常備役軍(士)官係合法使用武力的一種職業，人才培育必須經過特別的養成過程。理論上，這類職能的某些部份幾乎不會運用在其他職(行)業，例如武器操作、戰場抗壓、統御士兵、戰術操演…等，亦即該類職能在就業上會受到職業特殊性的限制。於是，政府為了確保國軍單位對初官人力需求的質量無虞，因而特別成立國軍軍(士)官校院。其次，正期生(公費)在入學時必須與國家簽訂契約，以確保學生與國家皆能履行雙方應有的權利義務。因此，國軍軍(士)官校院的數量不僅有限，並且在國軍「為用而育」的教育政策下，軍事校院的教育目標必然會有不同於民間學校的特殊之處。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對初官人才的培育，為何需要規畫特別課程？非學分課程對初官養成究竟有何重要意義？本文將從軍人職業場域的特殊性來論述之。社會上有些職業的入行者，他們可能在未成年或剛滿 18 歲就已經擲出了生涯碇錨(career anchor) (Schein, 1987)。這些職業的入行者在進入職場之前，通常會先在特定場域中，就自己的碇錨職業開始接受預期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俾利未來在職場上可以勝任該種職業而預先做角色準備(Merton & Kitt, 1950; Moskos, 1971)。在軍事校院接受初官養成教育的正期

生，他(她)們選擇軍旅作為自己未來的職涯，就是屬於已經擲出生涯碇錨，並開始在特定場域中接受預期社會化的年青人。

現今社會需要專業理論知識及技能的職業，大多會要求入行者在進入職場之前，必須先在高等教育學校接受相關專長的正規教育，並以相關學位或專業證照作為入行門檻。雖然，企業組織在徵才上重視相關學歷證明，或是雇主可能重視對自己員工的組織社會化，但卻未必會要求員工的畢業學校，必須是具有預期社會化的完整功能。某些職業由於工作性質和職業場域的緣故，例如軍警、教師、醫護、餐旅等，對入行者會先施予完整的預期社會化。因此，這些職業通常會成立專屬學校，並依照職場特性來規劃特定的培育制度，例如軍警院校、醫護院校、餐旅院校、師資培育中心(大學院校附設)等。當軍事校院被賦予預期社會化的教育功能，就是希望透過完整且系統性的初官養成教育，能夠為國軍培育出符合軍隊需要的初官人才。

初官養成教育在發揮預期社會化的功能上，主要是透過軍事社會化。軍隊透過系統性的訓練方式，使入伍者蛻變成為正規軍人的過程，社會學稱之為軍事社會化(military socialization)，並強調軍事社會化可以對受化者產生重新改造的影響。此外，由於軍事任務和軍隊特性的緣故，軍人角色演化出獨特的內涵與屬性，這也是為什麼軍隊需要採取特殊的訓練方式，讓入伍新兵或官校新生經過軍事社會化的洗禮後，能夠轉變成符合軍隊要求的樣子。(Cooper, Caddick, Godier, Cooper & Fossey, 2018; Godfrey, Lilley & Brewis, 2012; Hajjar, 2005; Hockey, 1986)對軍(士)官學校的學生而言，他(她)們在學校所接受的預期社會化，即是軍事社會化的早期階段。

政戰學院對正期生施予預期社會化的目的，就在於讓正期生畢業後轉換身分成為政戰初官時，能夠適應軍人角色並勝任幹部職務。然而，若要使正期生畢業後任官，可以適應部隊和勝任職務，軍官養成教育還需要針對軍職場域的特性，量身訂做以培養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為主的特別課程，非學分課程即具有這種重要功能。不過，初官場域特性該如何融入軍官養成教育中？接著，後面將說明軍官養成教育如何透過非學分課程和非正式課程，將初官場域特性融入對初官職能的培育中。

三、軍官養成教育的特殊性

教育學制一般區分為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依照政戰學院的各年班教育計畫來看，政戰學院的課程也可區分為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正式課程是指學校規劃有完整詳細的課表，包括科目名稱、教學目標、授課年班與時數、授課人員與上課學生、上課地點與時間、成績評量(核)方式等。政戰學院的學分課程和非學分課程，由於都符合上述這些要件，所以都屬於是正式課程。兩者的差別在於，正式課程各科目完成學期應授課時數並通過評量(核)標準後，其中必須計入畢業學分的稱為學分課程，其餘的則屬於是非學分課程。不論是學分或非學分課程的成績評量(核)結果，都必須全部達到及格標準，才能取得畢業資格。

從職能觀點而論，學分課程與政戰初官職務職能的培養有關，非學分課程與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培養有關。依照職能觀點，政戰初官職務職能主要是依照職務類別的專長領域，設定應具備的專業性知識與技能，這部分主要是由政戰學院各系(組)依照自己的專長領域來規劃學分課程；換言之，由於系(組)之間的專業學門不同，在課程規畫上即有明顯差異。然而，政戰初官核心職能乃是不分軍種、單位和職務之不同的政戰初官皆應具有的，所以非學分課程是由校、院層級負責規劃和執行之，授課對象為全院學生不分系(組)之不同。

非正式課程是指在正式課程以外，由學校規劃與教育目的有關的措施或活動。以政戰學院對初官核心職能的培育為例，除了以非學分課程為主、學分課程為輔之外，還會結合校園生活設計出各種與軍事社會有關的措施和活動，包括實習幹部制度、榮譽制度、學長(姐)制、服儀與禮節、寢室內務檢查、回報制度、衛哨勤務等，這些都可稱為是非正式課程。其中有些是屬於政戰初官的核心職能，有些則是屬於管理職能的範圍。目前政戰學院關於上述教育活動的實施，皆是由校、院層級依據相關條例或規則，先完成實施辦法的訂定。

軍官養成教育的特殊性，在於為使正期生畢業後具有任職初官所需的核能力、基本素養和實務技能等，強調培育方式需要模擬軍事化生活和部隊實務等職場特性，例如校園生活結合軍事化管理，校園設施嵌入軍隊文化，校園環境中充分安排認識部隊基層實務工作的學習機會，以及對此還規畫有實作練習或實踐所學的相關活動等。因此，讓培育環境和校園文化具有軍隊場域和實務工作的特性，規定學生住校且採取集中管理，然後設計符合軍事

社會化模塑原理的制度與技術，就成為落實培育工作的重要措施。接著，後面將說明軍校環境或校園文化融入初官職場特性，對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達成「為用而育」目標的重要意義，以及職能導向課程為何有利於與這種特殊性的結合。

軍事教育機構是國軍單位之一，軍隊的全控制制度(total institution)與軍事文化(military culture)，同樣影響著軍官養成的培育環境與校園文化，也是對初官職場特性的一種反映。本文參考相關文獻，對校園文化的解釋是，以一套價值體系為中心，透過一系列正式(成文)和非正式(不成文)規範、盛典及儀式、典範與楷模、象徵符號與語言、有形器物等將這套體系中的價值與信念呈現出來(Coll, Weiss, & Metal, 2013; Soeters, Winslow & Weibull, 2006)。大致上，這套體系的構成要素可以區分為物質性和非物質性兩種層面，以及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關聯，例如校旗和校徽因為標示著象徵符號，而成為具有特殊意義的物件。

以國防大學基礎學院的校園為例，舉目可見這兩種文化層面的構成要素。在文化物質層面能夠凸顯校園特色的，一般常見的有校區大門口的衛兵崗哨、外形方整且線條簡單的校舍建築、筆直整潔的道路、充滿陽剛氣息的校園設計、室內井然有序的擺設、統一形式的穿著和生活用品、整肅的儀容、排列整齊的隊伍和一致的行進步伐、此起彼落的敬禮動作和問候聲等。另外，在文化非物質層面能夠凸顯校園特色的，一般常見的有四處可見的精神標語(象徵符號)、英雄人物的塑像或畫像(典範與楷模)、盛典中必見的隆重禮儀、嚴格的軍紀營規(規範)、口令與行動(語言與肢體動作符號)等。軍事教育機構的校園文化在這兩種層面之間，並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交融、不易分割。

校園文化對人員的影響既深且廣，因而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首先，它不受到教室空間和上下課時間的限制，可以對個體產生全面性且延續性的影響。其次，它可以與生活密切連結，提供學生實踐所學的真实生活情境，深化學生的學習經驗與心得，穩固學生的學習效果，進而達到認同與內化。譬如袍澤情誼和團隊精神是校園文化的重要內涵，其中的袍澤情感可以促進成員之間的凝聚力，讓學生對自己所處的學習環境產生歸屬感，這種情感連結也有助於同學之間的切磋和勉勵，進而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投入。又譬如團隊精神可以培養學生對自己所屬團隊的認同感與向心力，包括以成為

其中一份子為榮、重視團隊榮譽與形象且願意為此而付出等。因此，軍官養成教育將袍澤情誼和團隊精神相關的價值、信念和規範等融入校園環境之中，讓每日身處其中的學生，不論是生活作息、課堂學習或課後活動，隨時隨地都受到渲染，以期能夠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由此可見，當校園的文化力愈強，愈有助於教育理念的傳遞和教育工作的推動，尤其是當校園文化可以彰顯學校特色時，將更有助於提高學校的培育成效。

在校園文化中，盛典和儀式也是組成文化的重要部分。盛典是一種公開舉行的正式集會，針對集會舉行的主要目的會有一套隆重的儀式，譬如晉升典禮、授階儀式、有功敘獎人員表揚等，讓傑出表現或實踐某價值的具體事例，能夠透過盛典及儀式以茲表揚，也藉此宣揚集會目的所要傳達的價值、信念或規範(Machalek, Katayama, Patrey, & Born, 2006)。就教育功能而言，不僅可以樹立楷模以茲鼓勵大家效法，還可以宣揚及鞏固組織所重視的核心價值、信念、規範等，使其能夠不斷傳承下去。另外，軍方在重要紀念節日，也會透過典禮和儀式來追思緬懷歷史人物的志節情操，藉此向學生宣揚和傳遞其中的重要價值。除此之外，校園文化中不論是物質層面或非物質層面，隨處皆可觀察到與軍人核心素養的密切關係。

綜合上述，為了培養正期生的政戰初官核心職能，除了培育環境以軍官職業特性和軍隊工作場域為藍圖，還在課堂之外讓正期生可以從日常生活中，透過真實情境有實踐和練習的機會。其次，無論是正式課程或非正式課程，都需要培育環境和校園文化的密切結合。當軍官養成環境和校園，是以初官職業場域的實際情況為藍圖，同時結合軍事化生活管理，讓正期生在校修業的四年期間，每天都浸潤在這般的校園之中，可謂是透過潛移默化來培養正期生的初官核心職能，這使軍事基礎學院的預期社會化功能可以充分發揮之。再者，校園文化不論是有形器物的制服、儀表、教學設備、會場布置、桌椅排列、裝置藝術、寢室物品、軍事教練場和器械、隊伍形式等，或是非物質層面的階級觀念、軍紀營規、精神戰力、英雄楷模、口令與動作等，這些都可以結合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運用在對初官核心職能的培育上。

四、職能導向課程規劃要點之探討

我國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的實施所強調的素養導向課程，其實與職能導向課程有相通之處，例如素養與職能的基本含義、課程目標的訂定方向、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的教育理念等。主要差別在於素養導向課程的實施對象，主要是接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中、小學生，課程強調如何為未來實現全人發展奠定基礎。職能導向課程則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為主，課程強調提升就業競爭力及未來適應工作場域和社會生活的應有職能，是故課程的培育目標、科目配當與教學活動等，著重如何與職場需求相銜接。由於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教育對象為大學生，課程目標在於培育正期生未來適應軍旅生涯發展的所需職能，所以職能導向課程可以作為非學分課程未來精進的參考，希望能夠對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及實務技能的培養有所助益，尤其是職能觀點對培育成效的重視，也甚為符合國軍「為用而育」的目標。此外，素養導向課程強調全人發展教育理念，對非學分課程也具有相當的啟發性。

我國目前實施職能導向課程的大學系(組)中，除了接受由政府授權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及管理科學學會，對課程品質認證進行審核的大學系(組)，主要包括工程、技術、資訊、建築及華文商管等部分領域(張一蕃，2014b)，此外有些其他系(組)也開始重視職能導向課程(鄭霈絨、吳志富，2014)。接著，將針對職能導向課程意涵、職能導向課程與成果導向教育的關係、職能導向課程與總整性課程的關係提出說明，然後綜整出職能導向課程的規劃要點，作為後面說明職能導向課程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上的參考。

(一)職能導向課程意涵

職能導向課程強調，除了培養一般學術知能，還應重視對特定職場所需技能的養成，尤其是指整合所學、解決問題和完成工作的實務技能。於是科目和教學包含相當比重的技能訓練，目的在於透過對實務的實作練習，達到培養職能所需的實務技能。大學系(組)採取的職能導向課程，一般是指針對某產(行)業的職場需求或職能基準，設定課程目標及規劃以技術訓練性質為主的課程模組。模組包含與課程目標有關的配套性科目，這些科目從基礎到複雜、從簡單到整合，對低年級到高年級循序漸進實施授課，讓學生培養出該產(行)業所要求的職能基準(張一蕃，2014a；張一蕃，2014b)。其次，由於職能觀點強調適應生活與勝任工作的基準是多元面向的，是故課程模組所包含的科目，在教學目標上也應結合職能的多元面向，亦即除了重視認知性的

核心能力之外，也強調產(行)業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培養，以及情意層面的陶冶。再者，職能導向課程為落實課程目標，還強調應針對課程預期培育的職能基準，實施教學與學習的成效評量。

目前國內大學(含高等技職教育、科技校院)有採行職能導向課程的系(組)，幾乎都是以學分課程為主。由於政戰學院為培育部隊基層政戰工作所需的初官人才，除了學分課程還需要有非學分課程，尤其是對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培育更是有賴非學分課程。理論上，政戰初官職能是指正期生畢業後任官，在適應部隊生活和勝任工作上所需的職能基準，大致上包括核心、管理、職務和一般等四類職能。其中的政戰初官核心職能是指，不論軍種、單位或職務之不同的政戰初官都應具有的職能基準，包括認知層面應有的核心能力、情意層面應有的基本素養、技能層面應有的關鍵技能等。其中，核心能力是指學習如何適應職場和勝任工作之相關知識所需的認知性能力，基本素養是指對軍人價值與角色規範、國軍使命、國軍政戰工作等產生認同、學習動機與積極態度等情感與意向，關鍵技能是指應用專業技術的基礎能力，使部隊基層政戰工作得以順利執行之。就上述對非學分課程的說明來看，可謂符合職能導向課程的主旨，以及就職能觀點強調的多元面向而言，未來針對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培育，若欲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時，在教育目標上除了重視認知性的核心能力之外，還應包括情意性的基本素養、技能性的專業技術與應用能力等。

(二)職能導向課程與成果導向教育

職能導向課程與成果導向教育，可謂是一體兩面。成果導向教育(outcomes based education)強調課程與教學乃是實現教育目標的重要途徑，而成效評鑑則是維持課程品質與教學成效的必要措施，並以學生學習成果作為評量教育目標執行結果的依據(Rao, 2020; Spady & Marshall, 1991; Spady, 1994)。職能導向課程強調學以致用，課程目標主要是參考職場需求或職能基準來訂定畢業生學習成果(graduate attribution)，尤其重視產(行)業對特定之實務技能的要求。接著，依照課程目標規畫課程架構(包含科目配置與學分配比)，並透過學習成果評量來了解目標達成情形。由此可見，學生學習成果代表著課程與教學的職能培育成效，而這也是成果導向教育的主要精神(Donnelly, 2007; Berlach & McNaught, 2007; Aema & McCoy, 2009；李坤崇，2018)。依照上述，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若欲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為了確保

課程與教學對初官核心職能的培育成效，亟須掌握成果導向教育重視學習成果評量的精神。

(三)職能導向課程與總整性課程

總整性課程具有實踐職能導向養成教育的精神，目前我國大學系(組)採取職能導向課程的，其中有些就是採取總整性課程(capstone course)(劉玉昀，2016；呂良正，2014；張本杰，2014；鄭霈絨、吳志富，2014；劉曼君、呂良正，2014)。總整性課程是透過配套性的課程模組，結合專題形式讓學生在實務操作中，練習如何將過去所學做整合性的應用，並藉此檢視學生在核心能力與專業性技能上的發展情形(鄭霈絨、吳志富，2014；張本杰，2014)。

依照職能導向課程強調職能與課程必須扣緊的觀點，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若是以培育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為主，且欲規劃為課程模組方式，則模組的配套性科目和教學活動即需扣緊部隊基層政戰工作的所需職能。由於部隊基層政戰工作大多屬於實務性質，於是課程與教學應以實作性與整合性為主，盡量讓學生在實務操作中，練習如何將過去所學做整合性的應用，同時可以讓學生從中學習如何發揮自己的專長，並省思如何加強或修正自己的缺失，並藉此檢視學生在核心能力與專業性技能上的發展情形。其次，由於對正期畢業生學習成果係採取職能多元化的觀點，所以在規劃課程模組時，科目配置即需配合多層面學習成果的要求，來設計對應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活動。總之，非學分課程若採課程模組方式來規劃職能導向課程，表示課程從基礎到複雜、簡單到整合規劃為循序漸進的配套性科目，課程目標和教學活動特別強調實作性和整合性，以培養正期畢業生具備部隊基層政戰工作所需的實務技能及其他重要的相關職能。

(四)職能導向課程的規劃要點

職能導向課程的規劃要點，綜整以上說明可以歸納為下列四點：1)課程目標應參考相關職能基準並符合職能多元性的原則，使學生能夠在認知、技能、情意等層面符合職場需求。2)學習過程與職場之間需要有深度連結，尤其是加強對職場所需之技術性、應用性和整合性的相關職能，以校正過去偏重學術知識卻忽視實務技能的缺失，而這也是改善學用落差問題的關鍵。3)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應加強實務技能，並採取以技術訓練為主的課程模組，在規劃上可以與產(行)業界共同商討之，俾利學生培養出符合產(行)業的所需

職能，使學生畢業後可以與職場無縫接軌。4)重視學習成效評量，以維護教學品質與課程品質管理。接著，後面第參部分將就上述四點歸納，進一步說明職能導向課程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規劃上。

參、分析與討論

職能導向課程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上

本文主旨之一，在於探討如何將職能導向課程，應用在培育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非學分課程上。這部分將先介紹國防大學基礎學院係以武德武藝為教育目標，並說明政戰學院正式課程(學分、非學分)與武德武藝教育目標的對照情形。然後，針對前述綜整的職能導向課程的規劃重點(或要領)，說明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規劃上。

一、武德武藝的教育目標與修業課程

國防大學轄屬的政戰學院、管理學院、理工學院等基礎學院，設立目的在於為國軍陸、海、空軍培育「武德武藝兼備」的領導及專業人才(國防大學，2020)。武德教育是以校、院層級負責規劃的非學分課程和非正式課程為主，但由於武德需要有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為底蘊，所以某些通識課程(學分)也會與武德教育有關。武藝教育是與官科類別的專長領域有關，主要是由政戰學院、管理學院、理工學院的各系(組)依照自己的專長領域來規劃學分課程，惟不屬於本文的探討範圍。國軍的官科類別是依照軍事任務特性來區分之，國防大學基礎學院著重於培育政戰、管理與理工等專業的官科人才。其中的政戰學院是以培育國軍未來的政戰(一般)官科、政戰(專業)官科的軍官人才為主，管理學院是以培育國軍未來的軍法官科、行政官科、財務官科、經理官科的軍官人才為主，理工學院是以培育國軍未來的通資電、工兵、運輸、化學、兵工、測量、工程等軍官人才為主(國防部，2014)。國防大學基礎學院正期畢業生的官科類別，是依照陸、海、空軍等各單位的每年缺額，採取抽籤方式來決定分發。

國防大學基礎學院依照官科類別的專長，雖然在課程規劃上有所不同；

惟軍人武德不會因為初官的軍種不同或官科有別而產生明顯差異。因此，國防大學各基礎學院的教育方針，除了強調文武兼修也會強調術德兼備。其中的「術」是指專業知識與技能(譬如通資電工程、財務會計、醫療護理、心理衛生…等)，類似於不同官科類別各具有不同專業領域的專長，這是軍官在達成任務上必須具備的職能條件，也是武藝教育的重點。另外，「德」這部分以政戰學院為例，是指勝任領導角色和管理部隊應具有的內在涵養、言行表率與基本技能(例如體能戰技、領導官兵等)。綜合上述，正式課程包括有學分課程和非學分課程，政戰學院各系(組)必、選修的學分課程，就職能而言是以培育職務類別的專業性職能為主，校院層級必、選修的非學分課程，是以培育初官能夠勝任領導角色和管理部隊所需的核心職能為主。

二、職能導向課程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上的應用

這部分將先介紹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現況，接著說明如何將前述綜整的職能導向課程的規劃要點，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規劃上。

(一)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現況

依照「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大學部 112 年班(第 69 期)教育計畫」，將教育範圍區分為入伍教育、暑期教育、學年教育。學分課程的實施時間以學年教育為主，非學分課程的實施時間則涵蓋了入伍教育(八週)、暑期教育(八至九週)和學年教育(18 週)，依照各學年度的武德教育目標規畫相關課程。非學分課程目前包括有體育課程、軍事訓練基本教練與軍人特質教育課程。接著，後面概要介紹非學分課程的現況。

1.在學年教育實施的非學分課程

(1)體育課程(四個學年共計 288 小時)包括有基礎課程(基礎運動能力、體適能)、體能戰技課程(手榴彈投擲、五百公尺障礙超越、戰鬥體適能、刺槍術、武裝游泳、水上游泳、初步運動、戰地運動、草坪運動、持槍運動)、游泳課程、運動興趣選項(排球、桌球、網球、羽球、壘球、木球)等。

(2)軍事訓練基本教練(每學期 36 小時，四個學年共計 144 小時)包括單兵徒手基本教練、伍持槍基本教練、班持槍基本教練、排持槍基本教練、連級教練等。

(3)「軍人特質」這部分，依照民國 106 年 7 月 1 日修訂的「國防大學基

礎學院軍人特質教育課程實施作法」(草案)，軍人特質教育課程區分為五大主軸，分別是敬業樂群、典範學習、心理素質、孫子兵法、人文素養等。全學程四個年級共八個學期總計校必修 178 小時、院選修 78 小時，合計 256 小時。詳細說明如下：

- A. 「敬業樂群」校必修包括有服務學習(48 小時)、國際禮儀(8 小時)等共計 56 小時。院選修包括有讀書會(16 小時)、職涯規劃(2 小時)、軍歌練習及賞析(8 小時)、主官親教(含懇親會 16 小時)、公文書處理概說(含新聞應處 2 小時)、心理衛生教育(8 小時)、各院特色課程(8 小時)等共計 60 小時。
- B. 「典範學習」校必修包括有愛國影片賞析(32 小時)、傑出校友座談(8 小時)、中外戰史(8 小時)、部隊實務工作傳承(2 小時)等共計 50 小時。院選修包括有歷史人物評介(16 小時)、校園巡禮(2 小時)等共計 18 小時。
- C. 「心理素質」校必修為心理素質訓練共計 24 小時。
- D. 「孫子兵法」校必修為孫子兵法共計 24 小時。
- E. 「人文素養」校必修為人文素養共計 24 小時。

2.在入伍教育實施的非學分課程

入伍教育實施的非學分課程是以軍事教育與訓練為主，受訓期間(八週)必須在校(營)區住宿，除例假日外不得離開校(營)區。課程內容以軍事基本訓練與生活教育並重，著重於單兵、伍基本教練，學習單兵兵器機械訓練、射擊預習及實彈射擊，以及培養規律生活暨嚴守軍隊紀律的習性。入伍教育的訓期為八週，每天上課八小時，每週五天共計 40 小時，八週總計 320 小時。

3.在暑期教育實施的非學分課程

暑期教育的非學分課程，區分為軍事訓練與政戰專業訓練。受訓期間必須住宿校(營)區，除例假日外不得離開校(營)區。暑期教育共計實施三次，每次的訓期為九週，每天上課八小時，每週五天共計 40 小時，每期九週總計 360 小時，三次的暑期教育總計 1080 小時。

依照各年班教育計畫的「拾、考評方式」和「拾貳、畢業暨任官」的規定(依照「國防大學學生研究生學則」辦理)，學生修滿規定學分並經考試(核)成績及格(含訓育、體育及軍事訓練)方得畢業暨頒授學士證書。其中的訓育成績(教育計畫稱之為德行教育與政訓活動)即是對軍人特質的考核，體育成

績是指對體育課程的考核，軍事訓練成績是指對軍事訓練基本教練課程、入伍教育等的考核，以及上述的訓育、體育和軍事訓練等皆屬於非學分課程的範圍。依照規定惟有上述的非學分課程都修滿規定時數並經考核成績及格，才符合畢業資格。學分與非學分課程兩者之中，只要其一的考(核)試成績未達及格標準，就無法取得學士學位，也不能授予少尉軍階和取得任官資格。

(二)如何規劃為職能導向非學分課程

依照前述綜整的職能導向課程規畫重點，本文嘗試就如何將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提出以下重點：1)課程目標在於培育政戰初官所需之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專業技能等核心職能。2)以政戰初官職場特性作為課程規劃藍圖，強調學習過程與職場之間的深度連結。3)科目規劃與教學設計應重視部隊基層政戰實務工作所需的實務技能，尤其是加強對職場所需之技術性、應用性和整合性的相關職能，並規劃以實作練習或實務實習為主的課程模組。4)重視學習成效評量，以維護教學品質與課程品質管理。

1.課程目標與多元性職能內涵

職能觀點強調適應生活和勝任工作的條件，不是單一面向而是多元層面的。從成果導向教育和職能導向養成教育而論，畢業條件或謂畢業生學習成果及據此訂定的課程目標(Aema & McCoy, 2009)，就應符合職能多元化的觀點。因此，職能導向課程的教育理念，認為課程目標應該與多元化職能基準相互對應。同樣地，初官適應軍隊生活和勝任工作的所需條件也是多元層面的，理論上政戰初官職能的組成，可歸納為核心職能、管理職能、職務職能、一般職能等四種類別，且各種類別的職能內涵同樣也都為多元性質。依照前面對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定義，係指政戰初官不分軍種、單位、職務之不同都應具有的職能基準，理論上應包含屬於認知層面的核心能力、屬於情意層面的基本素養、屬於技能層面的關鍵技能等等各種層面的基準項目。

未來若將非學分課程規劃為職能導向課程，且國軍政戰官科完成對政戰初官職能基準的建置，則對課程目標的訂定即可參考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由於核心職能基準是為多元層面，所以非學分課程的目標，也應該涵蓋與認知、技能與情意等層面相關的職能基準，然後進行以下的檢視與策進，包括：1)現有科目可以對應到的課程目標是哪些。2)應達成的課程目標中，還有哪些目標尚缺乏可以對應的科目。3)現有科目中無法與課程目標做對應的是哪些。4)依照課程目標的權重，現有科目的授課時數是否適當。

根據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相關計畫(請參閱前述的「(二)政戰學院非學分現況」)，課程內容大致可區分為軍人特質陶冶和軍事基本技能(包含體適能訓練、肢體動作基本教練、體能戰技訓練等)等兩個主要部分。依照上述，未來非學分課程的精進，關於課程目標的訂定，可以參考政戰初官核心職能，進行以下的檢討與策進：1)分別屬於軍人特質和軍事基本技能的現有科目，各可對應到哪些課程目標。2)分別屬於軍人特質和軍事基本技能的現有科目中，無法對應課程目標的科目有哪些。3)應達成的課程目標中，還有哪些目標尚缺乏可以對應的科目。4)依照課程目標的權重，目前分別屬於軍人特質和軍事基本技能的現有科目的授課時數是否適當。此外，培養正期生的領導和處理部隊實務的能力，理論上也是政戰初官職能的重要構面之一(係屬於政戰初官管理職能的部分)，惟這部分的培育是以非正式課程為主、非學分課程為輔。至於與政戰工作主要職務內容(心輔、新聞、文宣…等)直接關聯的知識和技能，則需要透過學分課程的教學與學習，這部分與專業職能的涵義相近(請參考前面「表一」)係屬於政戰初官職務職能，但不屬於本文探討範圍。

2.以實務技能為主的課程模組

職能導向課程認為，若要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就應結合職場需求或職能基準。職能導向課程的特點，即在於透過以實務技能為主的課程模組，以及強調整合性和實作性的教學方式，來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相關職能。在科目規劃上，強調將科目由基礎到複雜、單元性到整合性，規畫成循序漸進的課程模組，並且結合著重實務性與操作性的教學活動，採實作性質的專題形式進行配套性的課程規劃。目的在於讓學生透過實務操作可以應用過去所學，也將有助於學生綜整過去所學。其次，透過實務操作還可以讓學生檢視自己過去所學，了解自己在各項職能基準上的發展情形，並覺察自己的專長且善加發揮，以及省思自己的缺失並予以加強或修正之。總之，職能導向課程以實務性為主，強調對認知、技能和情意等層面的整合與應用。

由於部隊基層政戰工作大多為實務工作，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培養，因而需要規劃實務技能的科目和教學活動。理論上，這些實務工作的所需職能，大多是建立在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基礎上，非學分課程的目的即是讓正期生紮下未來成為政戰初官後，執行這些實務工作所需的核心職能。未來若將非學分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且完成對政戰初官職能基準的建置，則關於

非學分課程該如何規劃以實務技能為主的課程模組，可以參考以下職能導向課程對科目規劃與教學設計的重點，並對現有科目與教學進行檢討與策進，包括：1)教學活動(內容)著重實務性與操作性的練習，以學生實作為主，教師從旁指導。2)科目規畫由基礎到複雜、簡單到整合，宜採整合性的課程模組。3)科目授課進度從低年級到高年級循序漸進。4)課程目標對核心能力、基本素養、專業技能的培養，強調認知性、技能性、情意性的整合發展和實際應用。

3.以政戰初官職場特性作為課程規劃藍圖

在管理上，職能觀點認為工作績效良窳的影響因素是多元的，於是職能基準除了包括勝任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還包括適應生活和維持良好人際關係等所需的相關條件。由此推論，初官職能與軍人職業場域或軍隊特性之間具有密切關係，因為營區內的官士兵無論是生活作息、演訓操練、公差勤務和人際互動等，都與部隊環境、軍隊文化等職場特性直接相關，是故未來若將非學分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即應將初官職場特性融入其中。接著，後面將說明政戰初官的職場特性究竟是指什麼？非學分課程該如何將政戰初官的職場特性融入其中？

軍隊是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裝組織，戰備與作戰是成立軍隊的目的。為了使官兵能夠善用武力以達成任務或是有效執行後勤支援任務，新兵入伍後即開始接受嚴格的教育訓練，一般常用軍事社會化的概念來解釋之。在軍事社會化過程中，士官兵可能會因為壓力和挫折而產生適應問題，於是士官兵的部隊適應就成為影響戰力的直接因素。政戰初官分發到基層部隊後，大多是擔任排長、連輔導長的職務，主要工作即在於協助單位士官兵適應部隊生活、達到操練要求標準、完成演訓任務、順利執行勤務、維持官兵士氣、維護部隊安全等，上述這些顯然與士官兵經歷的軍事社會化有著密切關係。因此，政戰初官到部隊任職所面對的工作場域究竟有何特性，可以從士官兵所經歷的軍事社會化來深入瞭解之。

基於軍隊特性和軍事任務的需要，軍事社會化強調角色鑄模的規格化和塑程標準化，期使受化者之間在經過去個別化後，可以出現愈來愈多的相似性，也可以愈益符合軍人角色期許的樣子，這些從軍隊對規律性、團隊性、一致性的嚴格要求即可明顯看到(錢淑芬，2013)。由於這種模塑過程是由內到外包括觀念、態度、儀容、肢體動作、生活習慣等整體性且大幅度的改

造。因此，如何讓士官兵適應部隊對規律性、團隊性和一致性的規範要求，即成為政戰初官的重要工作。此外，對士官兵的這種大幅度改造，必需要有一套模塑制度和技術，以及這種改造需要在全控性的基礎上方可順利進行(錢淑芬，2014)。因此，在政戰初官的工作場域中，對單位士官兵的部隊適應有著密切關係，並且也會直接影響單位士氣與工作績效的，就都成為政戰初官所面對的職場特性，例如處處可見的全控性、規律性、團隊性和一致性等。

模塑制度是指一套與軍事社會化功能有關的法規命令、行政規則、俗成慣例、傳統等所形成的系統性規範，這套規範的主要作用在於建構模塑場域的全控性。模塑技術是指在全控制度的基礎上，使受化者能夠鑲入軍人角色鑄模的一套操作方法，受化者必須學習如何適應模塑過程和達到模塑要求(錢淑芬，2010)。另方面，軍事校院為了讓正期生學習如何成為正規軍人，也必須採取系統性的教化策略、模塑制度和技術。因此，正期生在接受軍官養成教育時，自己也已經開始經歷軍事社會化。其次，正期生的軍事社會化是持續不斷的過程，包括從初官養成階段、畢業後任官到後來的軍旅生涯發展等，初官在這個過程中既是受化者，也是對部隊官兵使用這套教化策略、模塑制度和技術的施化者。

政戰初官職能意指適應部隊生活和勝任工作的所需條件，是故甫到部隊任官後，面對軍隊環境和軍事任務的特殊性，如何掌握職場特性與因應調適，就成為其適應軍隊生活和勝任部隊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政戰學院無論是課程內容、校園環境、校園文化、生活管理制度、培訓方式等，若能將政戰初官工作場域的這些特性融入其中，將更有利於對政戰初官核心職能的培育。教育學制雖可分為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但為達成初官人才「為用而育」的目標，這兩種課程都需要以政戰初官職場特性為規畫藍圖，並且彼此之間相輔相成。例如，將校園建構為類職場的學習場域，其中融入了全控性、規律性、團隊性、一致性等，讓正期生在具有軍隊場域特性的學習環境中，接受非學分課程對軍人角色的塑造和軍人特質的陶冶、學習軍事基本技能。其次，將課堂學習擴展到校園生活中，例如透過生活管理規定、實習幹部制度等，讓正期生有充分機會可以模擬如何扮演領導角色、如何執行團隊管理工作，經由累積實務經驗以培養未來政戰初官執行行政戰工作所需的核職能。

4.重視學習成效評量

「成果導向教育」強調課程教學是達成教育目標的重要途徑，並以「學生學習成果」作為評量教學成效的依據。依照成效評鑑的四大向度(PDCA)，計畫、執行、檢核和行動(Plan, Do, Check, Act)，不論是「成果導向教學與評量」的導入或是「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的建立，重點在於以下四個層面：1)訂定成果導向的教學目標與畢業生應達成的學習成果。2)依照訂定的教學目標與畢業生學習成果，完成課程規畫與教學設計。3)提出學習成果的評量方法。4)持續改善課程與教學。(劉曼君，2018；蔡小婷，2014；高等教育評鑑中心，2013)政戰學院未來若欲將非學分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該如何將「成果導向教學與評量」應用在非學分課程上，可以從下列方向來思考：1)探討初官核心職能的次級面向和組成要素，使課程規畫和教學設計有所依據。2)如何將初官核心職能的面向和要素，轉化為具體明確的非學分課程的教學目標和畢業生應達成的學習成果。3)依照上述教學目標與畢業生學習成果，如何規劃出系統化的課程地圖。4)如何建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以維護課程品質與培育成效。5)如何加強非學分課程的師資培養。

肆、綜合討論與建議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依照相關規定，學分和非學分的授課時數，分別佔教育總時數的比率，幾乎各為一半(52%：48%)，以及學分和非學分的課程成績，都必須達到及格標準才符合畢業資格，顯示非學分課程對政戰初官人才培育的重要性。然而，在國軍「為用而育」的教育政策下，非學分課程的教育目標究竟有何不同於學分課程，以及軍官養成教育該如何透過非學分課程，提升軍校育才與部隊用才的連結，值得重視。本文主旨就在於論述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對軍官養成教育的特殊意義，並探討非學分課程架構的理論基礎，以及非學分課程該如何發揮其對初官養成的培育功能，本文主要是從如何將非學分規劃為職能導向課程做理論性探討。

政戰學院目前非學分課程的教學內容，可以區分為對軍人特質的陶冶教化和軍事基本技能的鍛鍊，也依照各年級分別規劃這兩部分的相關科目和授課時數。但是，由於非學分的課程架構尚缺乏理論基礎的探究，因此在課程目標的設定上，較缺乏具體明確的依據作為參考。其次，也因為缺乏較具體

明確的課程目標，所以科目規劃和教學活動的統整性尚有待加強。再者，為提升課程品質或教學成效還需要有信、效度良好的衡鑑方法，惟若缺乏具體明確的課程目標，則難以完成之。

本文對於非學分課程架構之理論基礎的探討，主要是從素養理念、職能分析、職能導向課程與軍事社會化等進行探討。首先，論述初官人才培育應該重視職能觀點的理由，並針對政戰官科說明初官職能及其中構面之一的核心職能的涵義，希望能夠為非學分課程的目標奠定理論基礎。接著，從軍人職業及工作場域的特殊性，論述政戰初官養成為何需要設置非學分課程。之後，論述初官培育的養成環境和校園文化結合初官職場特性，對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達成國軍「為用而育」政策的重要意義。最後，參考職能導向課程相關文獻，就職能導向課程如何應用在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上，綜整為四項規畫重點。

本文對於非學分課程該如何發揮其對初官養成的培育功能，主要是從如何將非學分規劃為職能導向課程做理論性探討。倘若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目標，在於培育正期畢業生具有適應部隊及勝任工作所需的政戰初官核心職能，則如何依照職能導向養成教育和成果導向教育來規劃非學分課程，攸關非學分課程對初官人才培育的落實。首先，本文就國防大學基礎學院的教育目標為「武德武藝」，說明學院目前的課程規劃與「武德武藝」的對應情形，以及政戰學院正式課程(學分、非學分)與「武德武藝」的對應情形。其次，概述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的現況，然後參考職能導向課程規畫重點，探討如何將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規畫為職能導向課程，探討方向大致為課程目標與多元性職能內涵、以實務技能為主的課程模組、以政戰初官職場特性作為課程規劃藍圖等。

依照職能觀點，非學分課程的目標訂定若要能夠符合部隊用才需求，以及課程品質和教學實施若要成效更佳，則需要有相關的職能基準為依據。由於目前國軍政戰官科並未有職能基準的建置與發展，是故本文談及政戰官科職能時，僅從理論上概述可區分為四種職能類別，包括核心職能、管理職能、職務職能、一般職能等，對於這些職能類別也僅能就內涵做概念性說明，並無法具體指出它們的職能基準。因此，尚有待未來研究完成對國軍政戰初官職能基準的建構，屆時即可作為政戰學院非學分課程在培育政戰初官核心職能上的規劃參考，俾利非學分課程可以提出更符合部隊用才需求的課

程目標，作為課程設計、教學活動及成果評量的依據，使課程與教學的規畫、實施和成效評量可以更有效。

一般而言，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會選擇以某種取向為主。若是選擇以職能導向為主，則課程設計的主要原則，在於課程必須能夠對應畢業生核心能力(張淨怡，2018；劉曼君、呂良正，2014；容繼業，2014；隋復華、廖榮鑫，2009)。目前政戰學院雖有訂定大學部的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核心價值。基本素養包括有領導溝通、專業倫理、國際觀、軍人特質、排級幹部指揮能力、研析解決問題、終身學習能力、團結合作、輔導服務等九項，核心能力包括有領導管理、輔導服務、溝通協調、解決問題、研究分析、思辨創造、團結合作等七項，核心價值包括有愛國、誠實、榮譽、關懷、奉獻、犧牲等六項。但是，學校如何解釋或區分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核心價值之間的涵義有何不同？這些項目分別歸納為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核心價值的依據為何？這些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與核心價值對初官人才培育的重要性究竟為何？其中是否有需要增修的地方？目前非學分課程大致區分為軍事基本技能和軍人特質，這些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核心價值等跟這兩部分之間究竟有何重要的關聯？若要改善或精進非學分課程，即有必要正視上述問題，希望未來由於政戰官科職能基準建置、非學分課程理論基礎的建立、課程與教學精進方法的研發等，能夠明確澄清或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2015)。泛太平洋地區國家職能標準制度簡介。取自 <https://icap.wda.gov.tw/index.aspx>(擷取日期：2019-06-19)。
- 王佳琪(2017)。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核心素養課程：評量的觀點。臺灣教育評論月刊，6(3)，35-42。
- 李坤崇(2018)。成果導向教育與工程教育認證實務(電子資源)，Outcome based education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practice (iRead eBook)。臺北市：高等教育出版，智勝文化總經銷，初版。
- 李坤崇(2013)。大學生通識核心素養量表之編製。教育研究月刊，225，137-155。
- 李威穎(2010/04)。從 TTQS 談職訓局所屬職訓中心如何推動職能分析專案。取自 <http://tps.wda.gov.tw/Column-Files/435fd399ba1446abb532f2bce29f49de.PDF> (擷取日期 2019/07/09)
- 林永豐(2012)。核心素養/能力。教育大辭典。檢索自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辭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Online).<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453916/>。
- 呂良正(2014)。臺大土木系 Capstone 課程經驗分享。評鑑雙月刊，49，21-24。
- 容繼業(2014)。追求卓越、成就典範：高雄餐旅大學的人才培育機制。評鑑雙月刊，50，29-33。
- 許家驊(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核心素養導向教學策略之理念、設計實務與省思。臺灣教育評論月刊，8(10)，13-18。
- 國防部(2019a)。「第十章第一節 人才培育」，中華民國 2019 年國防報告書，頁 172。取自 <https://www.mnd.gov.tw/NewUpload/歷年國防報告書網頁專區>(擷取日期：2020-01-15)。
- 國防部(2019b)。「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的第 24、28、30、40、47

- 條。台北市：國防部。
- 國防部(2014)。「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官科表」，〈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附表一。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新修訂。
- 國防大學官網/設校宗旨(2020/01/15 擷取)。取自 <https://www.ndu.edu.tw/p/412-1000-965.php?Lang=zh-tw>
- 國防大學官網/政戰學院/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2020/01/15 擷取)。取自 <https://www.ndu.edu.tw/p/412-1000-965.php?Lang=zh-tw>
-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2020)。「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大學部(正期班)112 年班教育計畫」。台北市：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2013)。102 年度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取自 <http://www.heeact.edu.tw/public/Attachment/292917512518.pdf>
- 黃琇屏(2019)。淺談師培生應具備的核心素養。臺灣教育評論月刊，8(12)，6-11。
- 黃新福、趙浩然(2014)。人身保全人員職能量表之建構與調查。管理資訊計算，第 3 卷特刊，100-117。
-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取自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639-1.php?Lang=zh-tw>。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9a)。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推動方案(104-106 年)(核定本)。http://www.wad.gov.tw/cp.aspx?n(檢核日期：2018-07-19)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9b)。業務專區/職能基準/各部門所建置之職能基準。取自 <http://www.wad.gov.tw/cp.aspx?n=BBF5C83DDCCEE939>(檢核日期：2018-07-19)
- 隋復華、廖榮鑫(2009)。軍校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與通識教育課程之設計：以空軍官校為例。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1(4)，83-104。
- 張一蕃(2014a)。以「職能導向學位課程認證」協助科技校院發展特色。評鑑雙月刊，50，47-49。
- 張一蕃(2014b)。再論職能導向學位課程認證。評鑑雙月刊，51，36-38。
- 張本杰(2014)。Capstone 課程設計：實務專題不只是規劃「一門」課。評鑑雙月刊，49，25-28。
- 張芬芬(2019)。素養是師生共構融會貫通的活知識：108 課綱知識論。臺灣教

- 育評論月刊，8(10)，01-05。
- 張淨怡(2018)。推動五大領域認證：IEET 確保畢業生核心能力。評鑑雙月刊，73，7-11。
- 蔡清田(2016)。「領域／科目核心素養」的課程設計。臺灣教育評論月刊，5(5)，142-147。
- 蔡清田(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核心素養課程改革。評鑑雙月刊，80，25-29。
- 蔡小婷(2014)。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內涵分析。評鑑雙月刊，50，22-28。
- 鄭霈絨、吳志富(2014)。設計領域的 Capstone Course。評鑑雙月刊，49，32-34。
- 錢淑芬(2014)。軍事社會化模塑原理與制度設計。台北市：國防大學出版。
- 錢淑芬(2013)。全控機構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化：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初官養成教育的模塑制度為例。復興崗學報，103，147-174。
- 錢淑芬(2010)。「穿制服的人」與制度化作用：軍人角色模塑的理論性探討。復興崗學報，99，45-80。
- 劉曼君(2018)。建構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的教學與評量。評鑑雙月刊，72，49-51。
- 劉曼君、呂良正(2014)。透過 Capstone 課程：培育與檢視畢業生核心能力。評鑑雙月刊，49，17-20。
- 劉玉昀(2016)。成果導向教學與評量策略研討會：IEET 推動 Capstone 課程。評鑑雙月刊，60，56-57。
- 劉志綱(2016)。公部門公共關係人員職能模式與職能導向課程之建構－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轄下分署為例。南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人力資源管理碩士班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台南。

英文部分

- Aema, M. G. & McCoy, Jan. (2009). Competency-based Nursing Education Guide to Achieving Outstanding Learner Outcomes. New York: Springer.
- Anderson, L. W., Krathwohl, D. R., & Bloom, B. S. (2001). A Taxonomy for

-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New York: Longman.
- Arthey, T. R., & Orth, M. S. (1999). Emerging Competency Methods for the Futur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8(3), 215-225.
- Berlach, R. G. & McNaught, K. (2007). Outcomes Based Education?: Rethinking the Provis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Western Australia. *Issu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17 (1), p.1-14.
- Bertoncelj, A. (2010). Mannager's Comptencies Framework: A Study of Conative Component, *Ekonomska Istrazivanja*, 23(4), 91-101.
- Byham, W. C. & Moyer, R. P. (1996). Using Competencies to Build A Successful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Inc.
- Campion, M. N., Mumford, T. V., Mogeson, j. D. & Nahragang, J. D., (2005). Work Redesign: Eight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4(3), 367-390.
- Cardy, R. L. & Selvarajan, T. T. (2006). Competencies: Alternative Framework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Business Horizons*, 49, 235-245.
- Carrigan, M. (2018). Mentoring as Convers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oice Theory & Reality Therapy*, 37(2), 97-110.
- Coll, E., Weiss, L., & Metal, M. (2013). Military Culture and Diversity. Cited by *Handbook of Military Social Work*. Edited by Allen Rubin, Eugenia L. Weiss, Jose E. Coll. John Wiley & Sons, Inc.
- Cooper, L., Caddick, N., Godier, L., Cooper, A. & Fossey, M. (2018). Transition from the Military into Civilian Life: an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Competence.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44(1), 158-159.
- Donnelly, K. (2007). Australia's Adoption of Outcomes Based Education: A Critique. *Issu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17 (2), 183-206.
- Draganidis, F. & Mentzas, G. (2006). Competency Based Management: A Review of Systems and Approach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omputer Security*, 14(1), 51-64.
- Godfrey, R., Lilley, S. & Brewis, J. (2012). Biceps, Bitches and Borgs: Reading Jarhead's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sculine) Military

- Body. *Organization Studies*, 33(4), 541-563.
- Goldman, E. & Scott, A. R. (2016). Competency Models for Assessing Strategic Thinking. *Journal of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9(3), 258-280.
- Hajjar, M. (2005). The Public Military High School: a Powerful Educational Possibility. *Armed Forces & Society*, 32(1), 44-62.
- Hockey, J. (1986). *Squaddies: Portrait of a Subculture*. Exeter, England: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 Kennedy, P. W. & Dresser, S. G. (2005). Creating a Competency-Based Workplace. *Benefit & Compensation*, 42(2), 19-23.
- Machalek, R., Katayama, D., Patrey, E., & Born, H. (2006). Suspending Routine Duty: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ilitary Holidays and Ceremonies. *Armed Forces & Society*, 32(3), 389-404
- Moskos, C. (1971). 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 and the ROTC. I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Sage Research Progress Series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keeping. Sage Publications, Inc.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 Merton, R., & Kitt, A. (1950). Continuities in Social Research. In R. K. Merton & P. F. Lazarsfeld (Ed.), *Free Press Glencoe III*.
- Rao, N. J. (2020). Outcome-based Education: An Outline.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Vol.7 (1), p.5-21.
- Raymond, A. N. (1999). *Employe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 Rychen, S. (2004). Key Competencies for All: an Overarching Conceptual Frame of Reference. In D. Rychen & A. Tiana (Eds.), *Developing Key Competencies in Education* (pp.5-34). Paris: UNESCO.
- Rychen, S. & Salganik, H. (2003). A Holistic Model of Competence. In D. Rychen & L. Salganik (Eds.), *Key Competencies for a Successful Life and a Well-Functioning Society* (pp.41-62). Gottingen, Germany: Hogrefe & Huber.
- Schein, H. (1987). Individuals and Careers. In Jay Cors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p.155-71). Englewood Cliffs. N.Y.: Prentice-Hall.
- Soeters, L., Winslow, J. & Weibull, A. (2006). Military Culture. Cited by

-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Military, Edited by Gseppe Caforio.
- Spady, W. G. (1994). Choosing Outcomes of Significance. (The Challenge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Vol.51 (6). p.18.
- Spady, W. G. & Marshall, J. (1991). Beyond Traditional Outcome-Based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 Curriculum). Educational Leadership, Vol.49 (2).p.67.
- Spencer, L. M. & Spencer, S. M. (1993). Competence at Work: 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 Stein, B. J., McHenry, G., Lunde, J., Rysst, J. & Harstad, J. (2001). Which Key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tes Will a Technology Company Look for?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Oslo, Norway.
- Stone, T. H., Webster, B. D. & Schoonover, S. (2013). What Do We Know about Competency Mode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ection and Assessment, 21(3), 334-338.

復興崗學報

民 109 年 12 月，117 期，87-112

從人力資本理論觀點淺析中國大陸 人才戰略之發展與效益

邱勝浩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生

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係從人力資本理論觀點，淺析千人計畫對中國大陸人才戰略之關係，作者認為千人計畫目標就是要推展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強國，因為人才就是決定科技與經濟興衰的關鍵，本文發現中共借鏡世界各國引才經驗，推展百人計畫、長江學者獎勵計畫，接續發展千人計畫目的就是為彌補人才缺陷，改變生產力形式建設 AI 人工智慧社會型態體系，本研究同時運用馬克思資本論檢視千人計畫鞏固社會型態結構功能性及其矛盾現象。

關鍵詞：人力資本理論、資本論、千人計畫、人才流動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s and Benefits of China's Talent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Qiu Sheng-hao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Abstract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and China's talent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goal of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is to promote the power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due to the reason that talent is the key to determi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ferred to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of attracting talents and promoted the Hundred Talents Program and the Yangtze River Scholars Reward Program. The goal of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is to supplement the shortage of talents, change the form of productivity, and build an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ety. This research also employed the Marx's Capital perspective to asses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Keywords: Human capital theory, Das Kapital,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Talent flow

壹、前言

繼中共 18 大後，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海外留學生返陸就業規模攀升，已達 231.36 萬人返陸，占改革開放以來返陸總人數的 73.87%，2017 年國家自然科學獎獲獎的海歸派占名單比例超過 60%，(王輝耀，2018)若依人才流動－勢能效應之視之，勢能效應學者認為，使靜止物體離開地表，同時已將物體本身重量轉換為能量，再使物體落於地表的高度也決定所產生的回饋力量強度，這個轉換過程獲得的能量謂之勢能(位能)，由於大陸海外人才急遽逆流是源自經濟高速發展所帶動而來的人才磁場效應，人才的素質優劣，將決定國家科技水平的高度，相對地經濟的興衰也決定吸引人才回流－磁吸效應強度。

尤其大陸加入國際經貿組織(WTO)後，在人才不斷挹注前提下，對區域周邊國家的政治、軍事、科技及經濟市場亦造成與之俱來的威脅，尤其近年「千人計畫」在潛移默化下的驟然發展，同步的威懾性也倏忽成為國際世界東亞地區的新興焦點。

1964 年大陸首次利用海歸菁英為中共研析仿製「核彈」、「導彈」、「衛星」產製所謂的「兩彈一星」科技能量，掀起國際一陣譁然，近年美國 FBI 查獲多起大陸利用「千人計畫」收買專家學者竊取醫療個資、商業機密以及科技等產權案件，其中以 2018 年美國華裔物理學家張首晟，疑似竊取 AI 人工智慧、生技科學等高領域與大陸合作最為震撼，案經追查後張教授逕而墜樓身亡，所行疑點不免令人疑慮。

本文以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以及貝爾斯(Gary S. Becker)人力資本理論作為觀點淺析中共千人計畫發展與影響，探討大陸人才培育與國家發展現象，蒐集官方資料文獻分析法，研析中共發展千人計畫軌跡，藉由研究途徑檢視千人計畫意圖，窺探其核心目的與臆測未來發展方向。

千人計畫扮演中國大陸人才戰略工程興衰的重要角色，是凝聚菁英能力創造國際地位崛起的關鍵策略，從 1978 年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開始不斷以凝聚及招攬人才為口號大舉提升人才數量規模，尤其 1994 年大陸中國科學院推起「百人計畫」1998 年大陸教育部推行「長江學者獎勵計畫」引進約四千人

(科技發展促進編輯部，2009) 2008 年推展「千人計畫」甚至在 2012 年發展出「萬人計畫」，透過引進、吸收、組織、群眾等作為發展規模，此舉除彰顯中共長期在菁英領導外，同時亦可凸顯出大陸人才在結構上已產生根本上變化，究其欲急迫更變現狀的行為，亦可窺探出人才不足之隱憂，以及欲提升國際地位野心。

邇來，大陸政治、經濟、科技以及國防武力等方面確實已在國際地位逐步崛起，但是國際之間卻頻傳大陸運用銳實力手段發展統戰策略，採取千人計畫途徑分別在學術及業界等研發機構，取得商業機密、科技產權、渦輪技術及醫療機密，並透過等各地設置的孔子學院管道企圖扭曲資訊誤導群眾，引起世界國家撻伐，權益受損國家甚多尤以美國為首，除嚴厲譴責外更強烈抵制大陸。

然而，本研究研判千人計畫除作為統戰策略用途外，必然也運用於國家人才培育戰略發展手法，經知識的交流與吸收不斷生成轉化，提高內部知識水準強化外部實力。基於此觀點作為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於淺析中共千人計畫的成果與影響以供各界參考，當前中共為追逐國際世界與美國步伐，視人才培育為高度發展策略意圖，卻並未建構符合自身國情之人力資本理論途徑，本文援引美國人力資本理論觀點，檢視千人計畫對人才戰略工程影響與發展效益。

本研究提出三項假設，第一項假設：千人計畫的發展並不會受國際撻伐與美國譴責而止步。第二項假設：千人計畫的發展對海歸派與本土派學者會產生長期的衝突與對立。大陸在追求 2050 年前完成實踐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強國的前提下，許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勢必急遽扭曲轉型。鑑此，第三項假設：千人計畫能改善中國大陸整體經濟環境之能力將是有限度的。

貳、人力資本理論與大陸人才戰略發展

一、人力資本理論的特徵

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 1960 年將理論系統化，1961 年 3 月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投資人力資本理論」，說明人類所獲得的

能力與知識即是資本形式的一種，(Theodore W. Schultz, 1961)這是一項投資性策略，由於回饋報酬可觀且人力資本亦可適時代替補充生產的不足，西方社會對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已超過物質資本，綜觀高回饋率與代替性的優勢，即顯示出經濟的關鍵源自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其中人力資本投資計有 5 項：1.個人或家庭在遷移適應的工作機會。2.在職工作者的培訓。3.非企業組織的成人教育及農業推廬。4.醫療設施及保健服務 5.初、中及高等教育。

舒爾茨認為經濟增長過程的人力資本理論俱備 3 項因素：

- 1.人力資本欠缺的國家無法有善經營物質資本。
- 2.僅有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同步增長，(Theodore W. Schultz, 1960)經濟發展才能繼續前進。
- 3.人力資本是最有可能限制經濟增長的因素，需要掌握上述才能有效為經濟成長形成助力。

美國經濟學家，貝克(Gary S. Becker) 1964 年對人力資本理論發展新的觀點奠定理論基礎，在《人力資本：理論和實證分析》專書指出，人力資本理論分析中提出假設：「學校教育可提高收入及生產力，主要是透過提供知識、技能與方法分析問題」。文本中同時也透過檢驗推測出關鍵的答案即「科技」拓展，(Gary S. Becker, 1993)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其他投入的知識生產。

本研究揭示中共建政迄今並未發展所謂的人力資本理論做為人才培育範疇，仍僅參酌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以及史丹利等專家學者發表之人力資本理論觀點做為修正的方針，在長期深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意識形態下萌芽的大陸，對追求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強國的目標與理念。

二、大陸人才戰略工程與「人力資本理論」

2016 年 3 月大陸策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社會發展第十三年規劃要綱》啟動重大人才工程戰略，培育人才項目計有科技創新創業、青年菁英、企業經營管理、專業技術、國家高技能等 5 項，依循千人計畫、萬人計畫途徑，引進從事創新、俱備突破關鍵技術、發展創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和科技領軍人才。

2016 年 8 月中國科學院依據《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十三五

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及《中國科學院『率先行動』計劃暨全面深化改革》，制頒《中國科學院十三五發展規劃要綱》，制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結合國家戰略「一帶一路」部署，將科學技術成果合理化轉移給發展中國家。

大陸的千人計畫是否可運用「人力資本理論」檢視？當前大陸運用千人計畫手段配合「一帶一路」策略與國際世界共享資源野心，引進人才共同開發大陸，2017 年引進創興及創業人才數量遽增，留學返陸學生達 48.09 萬人；從 1978 年至 2017 年底有共 313.20 萬人返陸發展，可窺視大陸對於人力資本投資的視野，接續反瞻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政策推動經濟結構質量並重、新型城鎮化、提升全民教育及健康、推進農業現代化等工作，其核心理念皆於各領域闡述人才吸引、培育、安置的重要性，亦可說明中共極為重視人力資本投資的決心，當前大陸經濟總體量已位踞世界第二，尤其在未來經濟發展為尋求更上一層的突破，大陸勢必持續發展人力資本的投資策略，同時也會把其人才核心重點置於科技打開經濟嶄新的突破口。

鑑此，亦可援引美國經濟學家貝克對人力資本理論分析中提出假設結果：「提升經濟關鍵即科技拓展」，檢視驗證大陸在《十三五規劃》國家發展戰略之意圖與軌跡。

三、實踐小康社會朝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小康社會」思想在中國歷史回顧之中，最早可追溯自春秋戰國時代、秦漢隋唐、北宋清時期，然而在不同朝代階段對於「小康」解讀亦不相同，鄧小平在 1979 年提出「小康社會」概念，(樂意、秦晶，2016)同時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理念融入於大陸的「小康社會」，致力在生產發展基礎上使人民生活擺脫貧困逐步從溫飽達到小康水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00)打造城市建設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締造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2017 年中共第 19 次全國代表大會，習近平指出：2020 年以前，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期。2020 年至 2050 年是小康社會轉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期。第一階段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結構

下，基本實踐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階段 2035 年到 2050 年前，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結構下，實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習近平，2017) 基此，戮力於提升國家經濟、科技實力，伺機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致力人民的平等參與及發展權利獲得保障，法治社會基本建設，各方面制度越趨完善，達成國家治理體系及能力的現代化基本實現，繼而實踐現代化強國目標。

以改善國家內部人民生活環境營造祥和社會氛圍之名，引進國際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研發各項技術企業專業領域，除挹注大量資金在各項建設的物質資本外，亦投入資本在引才及育才，期盼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策略引進外籍及國內籍專業人才，以打造完善城鎮環境憧憬吸引更多海歸學者菁英人才，共同持恆營造更高層次的國家生活品質。

參、當前大陸發展千人計畫的特色

為詮釋千人計畫特色，藉由歷史沿革脈絡窺探千人計畫在國家經濟及科研關係產生的現象，逕自抽取出千人計畫在國家內部的因素，運用歷史文獻分析去偽存真，續說明當前外部現象，檢驗當前大陸對於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視程度。

一、千人計畫的緣起與目標

人力資本理論在馬克思的論述中並沒有特別發展出理論，僅於《資本論》提出勞動價值與剩餘價值的概念，同時也揭示人力資本的存在的影響力與階級概念的產生，然而從大陸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亦可窺探出，1949 年毛澤東時期中共核心思想，明顯是階級鬥爭的概念偏重於人才培育發展，建政初期過度倚賴前蘇聯史達林在軍事技術轉移以及武器裝備轉渡援助。然而在 1960 年蘇「中」關係正式決裂後蘇聯專家撤退，中共面對技術能量斷層狀況下，甫始力栽培本土的科技人才，吸收當時留法海歸博士錢三強，留美科學家錢學森、大陸科學家錢偉強，花費約 8 年時間建構國防工業體系，加速在 3 年內跨越當時尖端科技研究的突破口，旋於 1964 年至 1970 年陸續向國際告昭已具備實踐「原子彈」、「氫彈」以及「東方紅一號衛

星」的研發技術能力。

然而 1958 年正值三面紅旗推行之際，隨之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群眾運動等亂象，使階級鬥爭、不斷革命的行徑不曾停止，導致國家資源以及知識能量呈現停滯、產生不進而退現象，尤其從 1956 年到 1965 年期間，由於國家政策問題，導致能接受大學教育的畢業學生不超過 5%，教育體制明顯呈現菁英主義風格，(陳永發，2011)因制度缺陷造成就業分配問題，迫使學生示威抗議。

以馬克思資本論視之，社會型態發展必須將下層結構生產力(即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政治思想同步共存，甚至經濟基礎的考慮還必須大於上層建築的發展，(朱鐵生、丁維陵及姚伯茂，1988)反觀大陸 1958 年迄 1974 年，卻滯於「以階級鬥爭為綱」做為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為挹注社會主義思想改造大陸人民思維不惜一切發動為期十年的思想革命；導致大學聯考廢止、學校停課，教職員和學生無所適從，文革行徑的確澈底消滅革命的所有障礙，但也將所有人才培育的教育體制同時付之一炬。

綜觀毛澤東領導時期，對於思想改造的範疇勝過於人才培育的重點。為超英趕美，對於科技自主研發的追求是不停止地，對於菁英人才引進也是持續不斷前進的策略，然而當時下層結構科學理論基礎的薄弱也反映出菁英主義教育體制緣故，造就沒有知識基礎現象，所以只能不斷的引進人才利用人才來突破窘境。

從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至 2007 年底，大陸海外留學人數約二十萬人留滯於海外工作，導致大陸嚴重面臨到尖端人才匱乏、競爭力弱，科研型人才過多，實際創業型人才不足，造成人才專業、產業和區域結構分布失衡，幾經研議為貫徹科學發展宏觀，遂行科教興國及人才強國戰略，開始積極吸引大陸海歸和外籍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援以提升國家總體力量。

2008 年 12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於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權娟、李放，2012)啟動千人計畫，目標在戮力國家發展戰略核心前進，使用 5 至 10 年大量引進海外高端人才；人才種類計有創業、創新、創新團隊、文化藝術、頂尖、青年、新疆西藏、外國專家等 8 類，企圖帶領市場邁向技術、戰略創新突破以及新興學科與產業步伐，同時全力發展企業、實驗室、學科以及金融機構等組織為下層結構奠定完善基礎。

2013 年引進外籍研究員 5,105 名，從事科技、經濟類別的學者占 1,519 名，藝術類別占 3,514 名，囿於政策推動能見度較低關係，造成大陸海歸留學生雖達 353,500 名，但是大部分仍未達「千人計畫」以及「萬人計畫」的錄取標準，鑑此，大陸開始透過憲法針對制度賦予省級、市級政府在制定「海外人才吸引計畫」的同時，也能與中央政府享有一定的權利去推動政策，(中國與全球化智庫，2017)截至 2016 年陸續引進外籍頂尖人才 313 員提升科技創新與創業領軍人才能量。

大陸在國際經濟變遷、國內階級鬥爭、文革與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人才流失的問題不減反增，中共除面對世界各國不斷大舉巧奪刮分人才的前提下，也兼顧著國內群眾動盪不安劣勢，針對當時人力資本制度欠佳、風氣不良及經濟誘因不足等因素，不斷借鏡美國、德國、新加坡、日本等國家如何吸引尖端人才逆流，增強國家各方產業鏈能量，提升國家經濟及國際地位方法。

二、千人計畫的角色與屬性

千人計畫的發展目標，是為因應大陸國家發展戰略在 2050 年前，欲達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強國過渡期下之產物，然而其真正核心的目的是在迅速引進約 1 萬名海外籍和國內創新創業科技領軍、青年菁英等人才，換言之，千人計畫的引智效益也突顯大陸內部人才缺陷現象。

據此本文認為構成千人計畫在人才戰略工程的角色條件計有兩項，第一項：凝聚創新型科技研發人才，開發 AI 人工智慧技術等相關科技研究創新發明能力，取代傳統生產方式發展經濟市場及建設國防。第二項：打造城鎮、建立法治、藝術、哲學等上層能量，維持社會型態運動規律。然而本質背後的意涵，其實也是為下一步的萬人計畫埋下揭幕的序曲。

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及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1973)反觀中共推行的千人計畫，正因熟稔「生產方式」的重要性，所以意圖透過科技能力的生產方式以躍進或轉型姿態改造國家整體生產力模式，滿足國內人民物質需求，開創國內市場，同時亦趨使外資入城開發商機與更多民生就業機會。

然而綜觀千人計畫與萬人計畫共同關注的高科技尖端技術研發知識學者，以及科技隊伍和各實驗基地的建構項目，可窺探就是將核心聚焦於科技人才培植，根據國際世界科技趨勢帶動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外部影響原因所導致的現象，即構成千人計畫屬性之條件。

三、千人計畫的對立與統一

千人計畫，必然造成國家內部社會型態之中的海歸派(包含大陸、外籍學者)與本土派學者之間充滿相斥現象，由於在短時間內大量吸收各國科研技術人員，在外部的國際之間自然也會引起各國的關注與嚴斥的輿論聲浪，透過 2018 年美國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報告－「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和世界的技術和知識產權」充分揭露大陸多項不法行徑與爭議，(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2018)陳述其侵略野心及與日遽增之威脅，同時也引起各國疑慮及警惕，然而如何提升人才素質，改善管理規範、落實考核機制、汰劣執行亦是將來各國產界發展值得關注的議題。

統一內部，是大陸不斷面臨的問題，即循千人計畫篩選制度下的高優渥待遇，管理當前引進大陸的高層次與尖端菁英人才，在本土派與非本土派專家賴以共生的前提下，逐步促進內部的相互性、影響性、協調性以及制約性的功能運作，組織人才隊伍在有效度有規模的能量的條件下提升整體能力，在外部國際之間提倡大陸資源與世界共享的概念，結合外資共同開發大陸經濟及小康社會城鎮建設，試圖藉由相互作用營造良善氛圍，消弭國際撻伐聲浪。

中國大陸運用海歸學者國家提升人才素質，然而對於留學生的忠誠心則採取保留態度且透過長期考核來觀察與評鑑決策派職的層級與職務，從 2004 年王飛凌遭中國警察以涉嫌竊取國家機密羈押逮捕案，更突顯當時大陸對於防範海歸人才的其心可測。基此原因對於海歸人才的政務派職多以科技及經濟等領域為主要趨勢，而政治領域則多以本土派為主要核心作為發展，也造成海外華裔學生返陸者皆以科技、經濟、高層次企業管理人員或專業領域科學家為導向。

肆、千人計畫對大陸人才戰略效益

一、經濟科技局勢與千人計畫之影響

鑒於中國 1980 年起不斷吸引海外留學生以及外籍專家學者，迄今造成國際人才流失回流向大陸地區，尤其在短時間匯集數千計萬的人數以及藉由諸多回流學者同步轉入產權技術，使統戰謀略透過千人計劃的引才手段及銳實力的形式昇華呈現，就統戰觀點而言，千人計畫除引起各界撻伐同時也被美國視為一項間諜計畫，目的在透過招募國外具科研資歷的人員來華工作，實踐其主導全球技術最終目的，同時給予大陸人才與科技應用能力帶來達到可預期的成果與效益，從華裔美籍王擎博士參加千人計畫收受 300 萬美元，且涉及超過 360 萬美元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研究基金詐騙罪名與官方利用孔子學院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等案例亦可說明中共統戰的事實。

千人計畫常運用於統戰謀略發展的觀點，鮮少聚焦於人才戰略工程的手段探討，由於中共統戰手法慣用竊取科學技術以改善科技的應用能力，故普遍吸引眾目於統戰觀點之下，然而對中共而言，此舉僅能達到截長補短的局部效果，並無力改變科學基礎理論能力缺陷事實。換言之，若欲瞭解大陸如何提升國家整體人才知識能力，本文認為必須轉而挹注於中國人力資本與人才戰略發展核心問題觀點，使識者明晰中共欲解決問題勢必正視問題核心的關鍵，並非再仰賴往昔統戰或銳實力形式，而期待改變根本缺陷的問題。本文嘗試從人資本理論角度，藉由中共人才工程發展的脈絡在政策變革抽繹千人計畫引才手段之影響力，離析中國大陸科技研發能力與生產力轉型與人才戰略發展與效益。

隨著 2001 年大陸加入國際世界經濟貿易組織(WTO)，吸引國際資本及產能流入對外貿易快速成長，貿易總額從 2000 年 4,742 億美元至 2005 年達 1 兆 4,221 億美元，順利推動經濟成長 3 倍位踞國際前三貿易國。惟當時大陸教育性質普遍偏向於技術職能勞動，對於知識能量較為薄弱間接影響科技生產力之主導權，導致總體經濟生產力仍倚國際市場流路帶動開發。

2004 年為解決當時窘境，中共頒布《2003-2007 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教育部，2004)繼續實施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建設重點大學和

學科，以學術為建設的核心，創造學科隊伍基地。援引長江學者獎勵計畫與高等學校創新團隊計畫為核心，推展「高層次創造型人才計畫」，廣攬國際與境內人才資源，積極面向國際引進優秀人才。研擬有利政策構建吸引、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支持體系，結合關鍵領域理論學科研究和國家重大現實問題研究，培養頂尖的技能型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

技能型人才是技術創新與科技成果轉化之重要關鍵，除加強高等、中等技職院校建設，按區域經濟市場與勞動發展實際需求條件，促進產學緊結合，培養現代化建設急需技能型與軟體產業實用型人才，尤其是各類型高技能人才。更進一步改革公費留學工作制度，配合國家高等教育發展及科技創新，促進國際頂尖高等學校與科研機構合作，同時加強農村教育改革，推展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增進普通高中、學前教育和特殊教育有效整合教育資源，充分發揮農村學校的綜合功能。另外加強針對高層次創新與具備學術領導能力人才的考核遴選機制，加強引進與支持優秀留學菁英回國就業服務。

2008 年適逢美國金融風暴造成許多國家股市崩盤效應，衍生大量高知識分子失業進而導致各國人才流失，對當時正缺乏菁英人才的大陸來說，儼然形成人才回流現象，配合當時環境大陸開啟「千人計畫」，優先錄取 3 類型人才：海外華僑、經濟高技能型、創新科技型，並妥善解決海外高層次人才在居留和出入境、醫療、住房、保險、子女入學等優惠及專項資金。

2010 年大陸留學海歸數達 13.48 萬人創歷史新高，2011 年 8 月截至第 6 批共引進 1,510 人(創新型 1,161 人創業型 349 人)、引進的海外正教授數量，是改革開放前引進數量總和的近 20 倍約一千四百人(包含 50 名發達國家院士)，該計畫迄 2013 年底分別啟動 10 批次，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計 4,180 員，(司江佛，2013)至 2016 年底第 13 批引進約 944 人，(盛若蔚，2017)錄取率約 16.5%(創業型約 47 人)，(CAAI, 2016)集中於沿海省市經濟開發地區為大陸帶來商機，由於千人計畫亮點已備受大陸在各產業界的矚目，2011 年中共再發展千人計畫－青年人才項目規劃長期重點培養本土在各產業的創新創業型科技人才。

2014 年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崔大佛指出，將近 75%專家學者是以兼職身分到大陸，並無放棄在其他國家的職位，認為此計畫僅增加知名度，對教育知識改善也只是局部性發展，由於千人計畫包括大千人(A 組返陸工作超過 6 個

月、B 組歸國工作超過 2 個月)及青年(全職返陸工作)等 2 類，(牛珩、周建中，2007)依此現象所產生的觀點，對千人計畫之本質探討似乎已經看到內部矛盾的醞釀效應。

大陸在每一次科技和技術進步中，所出現的法律爭議也相對產生，(德勤，2018)尤其 AI 人工智慧發展強調促進技能進步和業界應用，卻對道德規範仍存在政策的缺失。然而目前大陸人工智慧核心研究在專利技能維度，有關人工智慧法律及道德方面之研究都極為堪慮與挑戰。

以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投資人力資本理論觀點視之，西奧多認為經濟的關鍵源自於人力資本的投資 5 項條件：1.個人或家庭在遷移適應的工作機會。2.在職工作者的培訓。3.非企業組織的成人教育及農業推廣。4.醫療設施及保健服務 5.初、中及高等教育。

從大陸 2004 年頒布《2003-2007 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與推動千人計畫，可呼應大陸人才缺陷本質的問題，積極援引人力資本投資觀點針對國內教育政策改革與海外引才制度開放之意圖。

由於當時大陸內部缺乏人才等需求，適逢美國金融危機，產生各國失業人才迅速回流到大陸的現象，刺激國內經濟及各項產業快速成長。接續以馬太效應視之，馬太效應為認為：「強者愈強弱者越弱，即造就貧富懸殊原因」，由於大陸沿海地區經濟開發刺激就業機會關係，也更進一步的拉開東西部的貧富差距，然而磁吸效應加上馬太效應的共鳴下，雖讓沿海地區經濟開發更為迅速，卻同時讓西部貧窮加重釀成教育水準失衡，導致人才流失而過度集中於沿海的問題。

大陸與美國之間本是對立關係，大陸人才長期短缺是內部原因，據 2008 年美國金融風暴的外部因素導致外海外人才回流大陸，然而本土與海外人才在能力、待遇、溝通、誠信度以及思維問題，衍伸教育能量有所限制，這是矛盾的普遍性。

由於集中沿海地區造成東西貧富差距，使人才流動散布不均導致教育力度不足也造成矛盾的特殊性，然而主要的矛盾就是經濟，更進一步的審視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人才，大陸因應當時窘境創新制度政策及措施改善內部本土人才專業力，引進海歸派增進各產業專業度，伺機改善與美國之間一致性關係，朝向相互協調、影響照映規律運動發展。反瞻當時僅解決本質的問題，但實際的根本上仍有被忽視不足之處。

從 2008 年迄 2020 年千人計畫引進大批海歸學者企圖逐步建構中國大陸完善小康社會環境與提升整體經濟效益，依循中國人力資本發展的脈絡可發現中國大陸人才計畫於 1970 年代就陸續推展各項制度與政策，鄧小平時期中共人才戰略工程策略採取向西方學習與引進西方人才兩條路線，打造紅與專並重的技術人才同時將人才培育提升至戰略高度。

1999 年至 2008 年在中國大陸大舉吸引海歸與改革留學生制度過程，從中國海歸每年流動量與出國留學學生比例之關聯性，窺視經濟發展與海外留學生與海外學生的流動比率產生的相互作用，導致儘管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人數比回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高，但是回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的比例卻在不斷增加，同步的趨勢也使中國大陸的均 GDP 的產生變化效應(Amelie F. Constant, Bienvenue N. Tien , Klaus F. Zimmermann & Jingzhou Meng, 2013)。

人力資本的挹注是發展社會與經濟結構變遷主要重心，當教育發展帶來的人力資本效益達到一定程度的進化階段，相對的也會把社會發展與經濟結構相互帶動出創造更進一步的新結構。觀察中國大陸人均 GDP 比率與留學生往返變化從 1999 年占 32.6%中國學生返回家園，人均 GDP 約 7,000 元。與 2008 年中國 GDP 人均約 22,000 元人民幣，海外留學生與海歸的比例約 38.5 %留學生返回家園，能明確看到人力資本與經濟追趕的相互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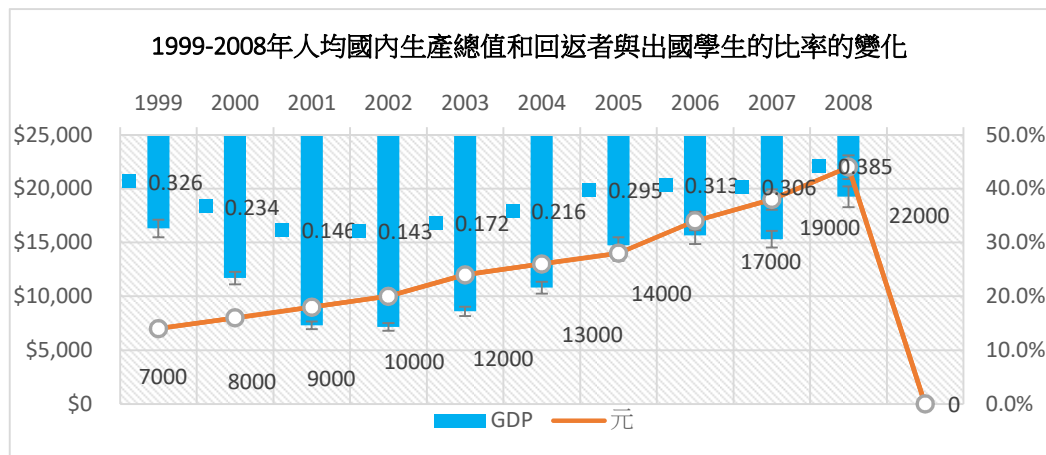


圖 4-1-1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2009》，第 20 – 28 頁；世界銀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China's Laten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chieving milestones and competing for the top》，Amelie F. Constant, Bienvenue N. Tien, Klaus F. Zimmermann & Jingzhou Meng)

2020 年國際世界經濟形態正逢生產力轉換階段，「人才不足」是中共經濟體系刻正面臨的窘境，加上更多國家參與全球引智競爭激烈，若再以往昔招募手法將難以突破瓶頸。當前中國大陸人才培育亟需變革與省思的是政府過分主導引才制度導致政策過於粗糙。傳統引才手段、篩選和管理方式偏重強調政府角度，在人才引進、薪酬、獎勵與考核等方法帶有強烈政治意識形態存在(王珏，2020)，難以調適外部競爭和內部轉化的需求，形成管理與策略仍停滯在口頭及書面，使制度優勢遠未形成，無法應對國際人才競爭新格局。

二、千人計畫與大陸科研能力之效益

2017 年大陸國務院頒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 號)，大陸正加速人工智慧化、社會、經濟、國防深度融合為主，提升新一代 AI 人工智慧科技創新力未來戰略目標，分三步走：

第一步，2020 年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與世界先進水平同步，成為新的重要經濟增長點，於基礎理論及核心技術獲得進展、運用技術應用層面改善民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核心產業超過 1,500 億元，帶動相關產業超過一兆元。

第二步，2025 年基礎理論實現突破，部分技術與應用達到世界領先，帶動國家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動力，於理論技術體系初步建立。進入全球價值鏈高端。在智慧型製造、醫療、城市、農業、國防建設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產業超過 4,000 億元，帶動相關產業超過 5 兆元。

第三步，2030 年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成為主要創新中心，為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及經濟強國奠定基礎，產業競爭力達到國際領先，建設社會、國防各方面應用與拓展，形成核心技術，完備產業鏈、高端產業群，產業超過 1 兆元，帶動相關產業超過 10 兆元。

當前中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處於經濟發展關鍵節點，往昔憑藉出口低技術的勞動力密集型結構模式已失去動力，為尋找改變生產力形式創造新結構契機，大陸積極迅速拓展科技研發能力，依據《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 號)指出，中國大陸已將「千人計畫」作為加強發展 AI 人工智慧型領域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引進工作的手段，並結合薪資待遇及優

政策惠措施，針對錄取者發放人民幣 100 萬元(約新臺幣 450 萬元)，享有醫療、保險、不受居住年限居住等優惠激勵企業界、科研機構引進人工智慧型人才。

然而依據上揭《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 號)所顯示，中國大陸等同是在建構一部屬於中國的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的生產力結構，並伺機在 2030 年把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理論達到世界領先，成為主要創新中心，為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及經濟強國奠定基礎達到國際領先。換言之，人工智能將會是未來推動經濟體主流趨勢，能促進人工智能快速起步的方法相對就是運用千人計畫的途徑，通過人力資源累積千人計畫引進具備科技研發的人才逕而轉化或提升本身結構。

2015 年透過千人計畫不斷引進的人才效益，使中共當局科研體系在基礎設施與研究能力有顯著改善，同時對海歸學歷也普遍不再強調，由於大批留學生往海外發展，產生全國博士後人才極為缺乏的狀態，使人才結構產生新的變化現象《轉型中的中國科研，2015》，根據上述觀點、官方文件與現象本研究認為千人計畫與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關聯性是值得觀察與省思。

據 2018 年《中國海歸人才吸引報告》大陸教育部資料顯示，截至 2016 年底千人計畫引進約六千人，依 2019 年 11 月 19 日美國聯邦科研機構代表官員在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指出截至 2017 年底，千人計畫引進約七千人，(United States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2019)同時中共也要求招募入選的研究員，需把在美國實驗室知識產權轉移到大陸，多次嚴重侵犯美國智慧財產權益損失難以估計。2018 年中共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無錫交流大會專家聯誼會長錢穎一提及，迄 2018 年千人計畫引進約八千人。(郭媛丹，2018)綜觀 3 筆資料所顯示研判千人計畫成長的數字，是以平均每年概約千人的數字擴展。

面對美國以及世界各國的輿論撻伐千人計畫是否會停滯？針對本研究第一個假設問題，在此的答案是否定的。何以見得？正因為科技型人才擁有知識及技能，才能為大陸發展無限原力的創新。中共於「十二五」期間，圍繞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求，科技人才隊伍迅速增加，人才資源總量約達七千一百萬人，但是科學基礎理論型、高端研發型和高技能型結構性仍不足，(王曉潔，2017)大陸科學技術發展以來皆以應用類型為主要導向，因為國體發展

的關係，往往是由上而下的概念去衍伸，在長期發展下的大陸，科學技術基礎能力嚴重先天不足，雖然對於科技的應用層面值得一提，但是基礎理論與研發能力的窘境，是難以突破的障礙，所以對於研發能力的課題必然是深受阻礙。

由於業界內部產製的人才培訓仍未成體系，大陸師資不足與教學資源落後，且開設人工智慧專業的學校普遍低於 2%，(雍黎，2019)造成學校端與產業端人才供給水準均偏低，(劉園園，2019)導致 AI 人工智慧科技最核心的芯片研發能力欠佳，綜整上述可窺探出大陸對未來產業鏈與科研發展目標仍有精進的空間。

就科研環境而言，依 2012 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千人計劃』實施狀況問卷調查綜述」顯示，創新型人才對國內評價；占 49%認為研究風氣公關活動多於學術研究、45.9%反映科研審查不透明、40.1%反映科研人際關係需花時間處理，(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2011)主要問題則反映在「科研團隊能量偏弱」及「科研經費不足」，綜整以上皆是大陸需不斷修正的問題，然而 2020 年面臨即將驗證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囿於以上小康社會門檻以及人才結構窘境，迫使大陸必須繼續推行千人計畫發展。

大陸為提升科技能力向國際世界引進人才，導致全球化的磁吸效應。以勢能效應視之，大陸為迅速引進創新型、創業型海內外頂尖人才及智慧技能產權轉化為大陸成果，不惜耗資巨資吸引人才回流之現象，造成更為強烈的勢能效應，綜整兩種效應對於人才的回流效果已顯奏效。

據中共 2018 年《自然資源科技創新發展規畫綱要》對高尖端創新人才引進之目標，制定 2020 年前引進院士 1-2 人，國家級科技創新領導人才 10 人、國家級科技創新人團隊 1 批、部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 100 人、部科技創新團隊 30 批作為實踐的指標，然而就國內人工智慧專業學校不足 2%，業界人才培訓還未成形，學校與業界人才供給水準仍欠佳等問題，似乎還沒有看到根本上解決，面對 2020 年的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目標，本文研判雖然引進的人才能如期，但就實際層面是無法實踐的必然結果。

從首批 2008 年至 2015 年入選的千人計畫學者事蹟概述彙整，發現國際期刊論文數量，以生命科學領域－王曉東院士 Cell、Science、Nature、Nature Chemical Biology、Mol Cell、PNAS 等頂級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 70 多篇，引用超過 15000 次為首要。其次，物理學領域－張首晟教授在智產權事蹟以

「量子自旋霍爾效應」，成功改善芯片製造技能突破窘境為人工智慧的發展更向前跨越下一步為核心。

最後，以研究團隊觀察－量子學家潘健偉於 2014 年至 2020 年為量子學領域再創突破，獲得克利夫蘭獎與《Nature》、《Science》雜誌等肯定，就整體而言－千人計畫的潛在以帶動轉化中共人力資本結構，可臆測的是當前人才培育戰略工程的發展，將隨千人計畫推展具備跨越的動力。

表 4-2-1 2008-2015 年千人計畫海歸學者效益概述分析

2008-2015 年千人計畫海歸學者效益概述分析					
項次	領域	姓 名	時任 / 經歷	發 表 學 術 論 文 數 量	專 利 與 優 異 事 蹟
1	物理學	張首晟	斯坦福大學終身教授	《Science》科學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 8 篇，Phys. Rev. Lett. 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 50 餘篇，引用約 15000 次	量子自旋霍爾效應
2	生物工程	李曉江	埃默里大學終身教授	Nature、Cell、PNAS 等國際知名期刊上發表 100 餘篇論文，引用約萬餘次	製備世界首例帕金森病轉基因猴模型，首次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和體細胞核移植技術，成功培育首例亨廷頓舞蹈病基因敲入豬
3	生物工程	施一公	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授	發表論文逾 200 篇。2019 年，分別在《自然》、《科學》、《細胞》各發表了一篇論文，引用約 8000 次	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
4	生物工程	張學記	美國醫學與生物工程院院士	國際一流刊物發表論文近 400 篇	擁有 65 項發明專利，出版專著 7 部，已有 30 餘項技術實現產業化，產品銷往全球 100 多個國家得到廣泛應用
5	生命科學	王曉東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Cell、Science、Nature、Nature Chemical Biology、Mol Cell、PNAS 等頂級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 70 多篇，引用超過 15000 次	費薩爾國王科學獎
6	生物科學	林鑫華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	國際一流的專業雜誌上共計 30 餘篇，(迄 2008 年期間統計作者或通訊作者文章 19 篇，其中 Cell 1 篇、Nature 1 篇、Nature Cell Biology 1 篇、Molecular Cell 1 篇、Development Cell 1 篇，Development 7 篇。)	美國癌症協會學者獎(2007-201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海外傑出青年科學家獎(2007；B 類)；Basil O'Connor 學者獎(2002-2004)；日本第十五屆複合糖國際研討會青年科學家獎(1999)
7	力學工程	余振蘇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終身教授	從事湍流和數學模型研究，研究成果涉及流體力學，應用數學，天文學，和生物學。發表	1993 年獲美國 Sloan 學者獎；1998 年獲國家海外傑出青年基金

邱勝浩

				論文 80 餘篇，其中 40 餘篇論文發表在 Nature、Physical Review Letters、Physical Review、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Physics of Fluids、Communication in Mathematical Physics、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等多領域的國際著名學術刊物上，論文累計引用次數超過 1600 次。1994 的發表的 SL 標度律模型，SCI 引用 600 多次	1999 年 4 月被國家教育部聘為首批“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2002 年獲中國青年科學家獎； 2003 年獲國家自然科學傑出青年基金
8	生命科學	王 擎	克利夫蘭醫院血管遺傳中心主任	發表科研論文等 143 篇，在《Nature》、《Science》等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發表論文 8 篇。其科研成果被臨床應用，挽救許多病人的生命	QT 綜合徵和心律失常遺傳學的奠基人，共發現 8 個人類疾病基因。發現 3 個長 QT 綜合徵基因和 Brugada 綜合徵的第一個基因
9	量子學	潘建偉	中國科學院院士	研究團隊在《自然》《科學》《物理評論快報》等國際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約 200 篇，2012 年 5 月，潘建偉在《現代物理評論》上發表題為“Multiphoton entanglement and interferometry”；是中國科學家在該刊物的首篇實驗論文	2014 年 11 月團隊發現抵禦黑客攻擊的遠程量子密鑰分發系統安全距離擴展至 200 公里，將成碼率提高 3 個數量級，成果刊於《物理評論快報》2019 年 1 月團隊獲得 2018 年度克利夫蘭獎；該獎項設立 90 年來，中國科學家在本地完成的科研成果首次獲得榮譽，2020 年再創世界紀錄。潘建偉、包小輝團隊在實驗室實現長距離量子糾纏，分別 22 和 50 公里。2020 年 6 月 15 日《Nature》雜誌刊登潘建偉團隊主導的量子通信研究《基於糾纏的千公里級安全量子加密》。6 月 18 日《Science》雜誌以“First Release”刊登潘建偉、苑震生在超冷原子量子計算和模擬研究的最新進展，題為“Cooling and entangling ultracold atoms in optical lattices”《在光學晶格中冷卻和糾纏超低溫原子》
10	物理學	李 春	電子科技大學教授	發表 SCI 收錄論文 53 篇，在 NanoLett.、ACS Nano 等著名期刊發表 SCI 論文 53 篇，引用 1200 次，單篇最高 SCI 引用 115 次。曾從事鐳射與物質相互作用、超快光子學與超快過程、二維原子晶體光探測與集成光電子器件研究	2012 年 9 月回國于電子科技大學工作，入選校“百人計畫” 2013 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計畫，2013 入選年四川省“千人計劃”，2015 年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基金支持

從人力資本理論觀點淺析中國大陸人才戰略之發展與效益

資料來源：

每日頭條(2018)。著名華裔物理學家張首晟和他的「量子自旋霍爾效應」理論。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science/abx8k4x.html>

弗雷賽斯(2020)。震驚！著名華人生物學家李曉江教授“遭解雇，被捕，宣判”始末。aminer：

https://www.aminer.cn/research_report/5ebba169ab6e30e67b2c9bea

生物探索(2019)。學術圈又被「逐客」！亨廷頓綜合征研究權威李曉江教授夫婦被美國埃默里大學解僱。biodiscover：

<http://www.biodiscover.com/news/principle/734183.html>

李仲維(2020)。兩岸人物／明星科學家創業 施一公名利雙收：。udn：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4449487>

生物探索(2018)施一公等 23 位「千人計劃」專家 2017 創新創業成果一年度回顧。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science/gyaqbol.html>

劉華東(2017)。張學記：成功，要結在愛國的常青樹上。rmzxb：<https://rmzxb.com.cn/c/2017-08-30/1757054.shtml>

中國科技網(2017)。北科大張學記教授當選美國醫學與生物工程院院士。千人智庫：

<https://rmzxb.com.cn/c/2017-08-30/1757054.shtml>

分析測試百科網(2016)。NIBS 王曉東院士 Molecular Cell 封面文章發表凋亡新成果。m.antpedia：

<https://m.antpedia.com/news/1342288.html>

中國科學院(2011)。中國細胞生物學學會第十二次全體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大會 CSCB：

https://www.cscb.org.cn/2011beijing/cp4_linxh.php

組織人事處(2008)。動物研究所召開“海外高層次人才”招聘評審會。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

http://www.ioz.ac.cn/rcjy/rczp/200812/t20081209_2070403.html

學術動態(2020)。科技興蒙——家畜種質資源創新與繁育技術學術研討會暨院士工作站揭牌儀式順利召開。內蒙古大學生命科學學院：<https://smkxxy.imu.edu.cn/info/1071/5651.htm>

北京大學工學院(2020)。教職員工一余振蘇。北京大學工學院：

<https://www.coe.pku.edu.cn/jzyg/qbjylb/876485.htm>

北京友誼賓館(2018)。第二屆中國系統科學會議專題研討一余振蘇。indigopk：

<http://www.indigopk.com/cssc2018/dhzt2/201804/W020180401402094857321.pdf>

尚漫(2020)。再登《Science》！中科大潘建偉團隊新突破，量子計算和模擬向前一步。雷鋒網：

<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2006/qDzTBBJ7bU09Fsi5.html>

中國大陸新聞(2017)。中國量子之父潘建偉獲選為 Nature 期刊 2017 年度十大風雲人物。enago：

<https://www.enago.tw/academy/chinese-physicist-makes-it-to-natures-10-for-2017/>

喻菲 徐海濤潘建偉(2017)。與量子糾纏的人生。中科院：

http://xn--fiqv77h35r.xn--ses554g/xzfc/201909/t20190925_4716850.shtml

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2015)。2016 年中國電子學會第二十二屆青年學術年會。iaeej：

http://www.iaeej.com/config/xydzgc/news_category/2016-09-27/%E4%B8%AD%E5%9B%B

三、千人計畫與 AI 科技人才生產力發展

物質社會的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改變人類生活方式、形成更進階化的社會型態方式，然而人類的意識形態也會隨附著進化後的社會型態，進而產生新的思維與意識，如何提升生產力方式，平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優化總體經濟能力是永遠不會停止反思，從 2008 年千人計畫的使命展開，大陸除引進大量多元化的知識能量，同時也運用知識，將傳統生產力轉換機械動能生產力致力邁向未來 AI 人工智慧化生產力的目標，如果說科技是知識的化身，那麼人才就是科技的創造者，因為在角逐國際地位的戰場，人才就是決勝的關鍵。

從 2016 年大陸在中國科學院頒布《率先行動跨越發展－中國科學院『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科發規字〔2016〕94 號)總體戰略提及，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已箭在弦發，國際科技創進加速，科技變革將決定未來國際市場的主導能量，在大陸內部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與科技強國相比之下，大陸科技基礎及創新能力仍落後，尤其體制、制度以及機制層面也是存在著問題。

其次，為實踐科技變革決心中共核定「科學技術跨越發展指標」、「創新人才隊伍建設」及「三重大產出」等 14 項目標前進，在 2020 年前管制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實驗發展等經費支出保持 4：5：1 的比例、提出創新理論解決科技關鍵問題、取得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技術推廣與轉化應用、控管外籍專員占科研人員比例 3%以上，其中基礎理論前沿領域在 6%以上，據此可得知中共發展 AI 人工智慧化科技創新創業型人才的不足與變革之意圖。

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管理辦法、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畫管理辦法》組通字〔2017〕9 號，千人計畫，甄選 8 類型分別為創新、創業、青年、外國專家、頂尖人才、創新團隊、新疆西藏、文化藝術型人才。萬人計畫，甄選 3 類型，分別為傑出人才、領軍人才(科技創新、科技創業、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名師)、青年拔尖人才，然而針對西部地區亟需缺才，可給予傾斜支持。

綜觀以上官方資料可以看出中共對於知識能量、科技人才以及面對西部地區人才不足的重視程度。尤其組通字〔2017〕9 號，已實證本研究第一個假設問題，本研究已可瞭解，千人計畫關鍵的選才類型就是科技創新型、科

技創業型人才，也是為後續萬人計畫引才的鋪陳，繼而開創 AI 人工智慧科技發展，成為解決經濟生產力的因應之道。

以美國經濟學家史丹利－人力資本理論發展新的觀點視之，史丹利認為：「學校教育可提高收入及生產力，主要是透過提供知識、技能與方法分析問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其他投入的知識生產，關鍵是科技拓展」。針對本研究發現大陸在 2016 年《率先行動跨越發展－中國科學院『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科發規字〔2016〕94 號)，即以科技做為發展經濟市場核心、研發國防自主、創建社會。基此，上述政策可驗證大陸不斷循人力資本理論發展科技能力事實。

當前中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處於經濟發展關鍵節點往昔憑藉出口低技術的勞動力密集型結構模式已失去動力，為尋找改變生產力形式創造新結構契機，大陸積極迅速拓展科技研發能力，依據《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 號)指出，中國大陸已將「千人計畫」作為加強發展 AI 人工智慧型領域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引進工作的手段，並結合薪資待遇及優政策惠措施，針對錄取者發放人民幣 100 萬元(約新臺幣 450 萬元)，享有醫療、保險、不受居住年限居住等優惠激勵企業界、科研機構引進人工智慧型人才。

然而依據上揭《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 號)所顯示，中國大陸等同是在建構一部屬於中國的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的生產力結構，並伺機在 2030 年把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理論達到世界領先，成為主要創新中心，為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及經濟強國奠定基礎達到國際領先。換言之，人工智能將會是未來推動經濟體主流趨勢，能促進人工智能快速起步的方法相對就是運用千人計畫的途徑，通過人力資源累積千人計畫引進具備科技研發的人才逕而轉化或提升本身結構。

2015 年透過千人計畫不斷引進的人才效益，使中共當局科研體系在基礎設施與研究能力有顯著改善，同時對海歸學歷也普遍不再強調，由於大批留學生往海外發展，產生全國博士後人才極為缺乏的狀態，使人才結構產生新的變化現象《轉型中的中國科研，2015》，根據上述觀點、官方文件與現象本研究認為千人計畫與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關聯性是值得觀察與省思。

伍、結論

本研究透過美國經濟學家人力資本理論解構大陸引才的野心，窺探其國家整體發展與人才培育之疑慮，審視大陸人才戰略在千人計畫的過去及現在發展軌跡，相互檢證中共多年以來不斷借鏡世界各國廣攬人才培育菁英的事實。

依歷史即可見證大陸舉賢用才之影響力，遠自春秋戰國時代秦始皇重用楚國李斯，廣招各國賢才，納進各國異士，最後秦朝崛起稱霸天下。然而在大陸歷經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洗禮的階級鬥爭下知識分子早已離析分崩流離失所，對當時中共而言僅就知識分子的匯集與運用也是一門嚴峻的挑戰。

邇來，大陸大量引進海外高層人才以及留學海歸青年是必然事實，為鞏固在國際地位安全性，各國力挽狂瀾招攬尖端人才，運用厚實高端人文基礎發展各領域專業菁英，鑑於大陸版圖幅員遼闊，西部人口分布偏僻且資源侷限、貧富差距及知識水準自然落後，多數人選擇背西遷居抑或是海外發展，面對美國自由經濟市場及民主意識形態高漲降低海歸大陸的選擇。

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舉才惟菁而用，大陸為實踐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現的基礎前提下，戮力建設小康社會推動城市發展，強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聯性，在發展期限下完成政策需要的就是菁英分子的凝聚與影響力，改變生產力結構繼而突破現狀，本研究援引人力資本論觀點解構千人計畫之影響與效益，願與各界學者交流相長。

參考資料

中文部分

一、專書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著作編譯局編(197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甘肅：人民。

姚伯茂(1988)。馬克思主義原理。載於朱鐵生、丁維陵(主編)：人類社會的結構與發展規律(187頁)。長春：吉林大學。

陳永發(2011)。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臺北：聯經。

二、期刊

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2011)。「千人計劃」實施狀況問卷調查綜述，中國人才，391，18。

牛珩，(2007)。海外引進高層次人才學科領域的定量分析與國際比較，科技管理研究，6，244-245。

司江佛(2013)。構建海外引進人才與本土人才協調發展機制研究，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雙月刊，5，31。

科技促進發展編輯部(2009)。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一千人計劃究，科技促進發展，4，39。

三、研究報告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中國吸引國際技術人才的政策與實踐比較研究報告(編號：ILO ISBN：978-92-2-531127-3，IOM ISBN：978-92-9068-741-2)。

德勤，(2018)。人工智能行業綜述篇，2018年中國人工智慧產業白皮書，11。

四、報紙

王輝耀(2018.09.10)。當代「海歸」趕上了一個偉大時代(新論)。人民日報，第5版。

王曉潔(2017.08.14)。中國需加強人工智慧人才培養。人民日報海外版，第3

版。

習近平(2017.10.19)。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開幕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解放軍報，第3版。

郭媛丹(2018.08.20)。中國千人計畫遭非議令人不解。環球時報，第7版。

雍黎(2019.09.12)。產業蓬勃發展遇上千萬人才缺口。科技日報，第6版。

劉園園(2019.07.11)發展人工智慧晶片中國不能「偏科」。中國航空報，第7版。

五、網頁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0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中國人大網：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8/content_5002538.htm。檢
索日期：2019.12.03。

教育部(2004)。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jiaoyu/8216/42366/42375/3072460.html>。檢
索日期：2019.12.20。

樂意、秦晶(2016)。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603/c69113-28410390.html>。檢索日
期：2019.12.03。

權娟、李放(2012)。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於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的通知。中國人才網：
<http://cpc.people.com.cn/GB/244800/244856/18246001.html>。檢索日期：
2019.11.20。

CAAI(2016)。祝賀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副理事長任福繼院士進入國家“千人計劃”入選名單。中國人工智能學會：
<http://caai.cn/index.php?s=/home/article/detail/id/281.html> 檢索日期：
2019.12.29。

英文部分

一、專書

Gary S. Becker (1993),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Gary S. Becker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hicag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ll rights reserved”, pp. 19-24.

二、期刊

Theodore W. Schultz. (1961),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51 (1), pp .1-9.

Theodore W. Schultz. (1960), Capital Formation by Edu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68, (6), pp. 571-583.

三、網頁

Allan Bloom, (1991). “**The Republic of Plato**”.Inpstylut Nauj Politycznych UW:
http://www.inp.uw.edu.pl/mdsie/Political_Thought/Plato-Republic.pdf.(檢 索
日期：2020.03.05)

Adam Smith,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arlymoderntexts:
https://www.earlymoderntexts.com/assets/pdfs/smith1776_1.pdf.(檢索日期：
2020.03.05)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2018).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hitehouse Gov: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6/FINAL-China-Technology-Report-6.18.18-PDF.pdf>.(檢索日期：2020.03.09)

United States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2019).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STAFF REPORT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https://www.hsgac.senate.gov/imo/media/doc/2019-11-18%20PSI%20Staff%20Report%20-%20China's%20Talent%20Recruitment%20Plans.pdf>.(檢索日期：
2020.03.09)

中共對台操作「輿論戰」之研究

洪銘德

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黃恩浩

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

摘 要

為了因應現代化作戰環境改變，在觀察美國於伊拉克戰場中以資訊科技為核心所進行的「三戰」後，中共重新檢視資訊作戰或資訊科技發展對其政治工作的影響，並將「三戰」視為其政治工作結合與發揮軍事作戰功能的核心戰法。其中，中共對台發動輿論戰的主要目的，除了有助於爭取國際輿論支持，在國際社會上孤立台灣外；更利於製造台灣內部動亂，讓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外，同時並塑造對中共有利之價值觀，促使台灣社會越來越向中共靠攏。本文的主要目的為分析說明近期中共對台輿論戰作為，首先說明輿論戰的定義，以做為瞭解中共對台實施輿論戰之基礎。其次，分別針對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統戰部、中宣部等單位進行說明，以利於對中共相關負責對台發動輿論戰之單位有所瞭解。再次，說明中共對台輿論戰常用的策略，並透過實際案例佐證近期中共對台所操作之輿論戰。

關鍵字：三戰、輿論戰、統戰工作、大眾媒體

A Study of China's Public Opinion Warfare towards Taiwan

Ming-Te Hu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DSR

Paul A. Hu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DSR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flict environment and after not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hree Warfare" center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Iraq battlefield, the PRC re-examined the implications of its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n political tasks. The "Three Warfare" is considered by the PRC as its dominant tactic for operating political tasks. As such, China's public opinion war against Taiwan has two overarching goals. First, the PRC seeks the suppor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ims to isolate Taiwan from the world. Second, the PRC attempts to instigate chaos within Taiwan, with the aim of letting public lose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ment while establishing favorable views toward the PRC, which in turn pushes Taiwanese society to be more inclined to the PRC.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the PRC's public opinion war against Taiwan in recent years and discussed the definition of public opinion war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re introduced to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units responsible for the

洪銘德、黃恩浩

PRC's public opinion war against Taiwan. Lastly, China's common tactics for carrying out the public opinion war were illustrated and the actual cases were also elaborated to show the PRC's operations.

Keywords: Three warfare, Public opinion warfare, United front works, Mass media

壹、前言

受到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影響，中共已認知到軍事行動成功的關鍵，除了有賴精良武器裝備、正確戰術戰法以及精準掌握作戰時機等條件外，非軍事手段亦扮演重要的角色，故中共以美軍為師，開展「三戰」(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與軍事行動相互搭配運用，期望以非武力作為輔助軍事行動以達成戰略目標(方錦誠，2010)。由於現代戰爭係結合政治、軍事、外交等之整體作戰，以及精神力量的對戰，誰能有效影響敵方軍心與士氣，誰就較有機會贏得勝利(孟繁宇，2007：82)。

戰爭不僅是種政治行為，亦是政治工具，除了為摧毀敵人軍事權力外，更重要的是屈服其意志，以利於創造獲勝契機。中共將「三戰」視為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重要作戰模式，廣泛被運用於作戰前、中、後期，對戰場勝負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孟繁宇，2006：89-91)。對此，2003 年 11 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江澤民在聽取關於美伊戰爭的經驗總結後指出，面對新型態戰爭環境，中共必須要開展「三戰」，並提升其所扮演的角色(許如亨，2008：53)。2003 年 12 月中共中央軍委會頒布新修訂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強調「三戰」的運用，將其列為「戰時政治工作」重點，並開始教材編撰與部隊訓練(沈明室，2007：225)。

為了因應作戰環境改變，且在觀察美國在伊拉克戰場中以資訊科技為核心所進行的「三戰」後，中共重新檢視資訊作戰或資訊科技發展對其政治工作的影響，並將「三戰」視為其政治工作結合與發揮軍事作戰功能的核心戰法(沈明室，2007：227)。對中共而言，「三戰」為政治與軍事所需的綜合精神效應，不僅有助於在戰爭中發揮政治影響力與精神殺傷力，且輿論戰若能在平時被積極有效運用的話，將有助於擴大作戰效果(孟繁宇，2007：82)。

中共「三戰」概念與作為早已引起美國的關注，因為 2013 年美國國防部所資助之《中國：三戰》(China: Three Warfares)研究報告即針對中共「三戰」進行詳細解說，指出中共「三戰」是個「動態的三維作戰過程」，透過其它非軍事手段構成的戰爭。北京當局的目標是獲取資源、影響力、領土以及提升國家意志。對於美國而言，「三戰」極具欺騙性，旨在改變戰略環境與打擊敵人意志(Halper, 2013: 11-12)。

其中，關於輿論戰，中共則參考美國在波灣戰爭期間的輿論操作，目的在於瓦解敵人的民心士氣(閻亢宗，2017：12)。隨著資訊爆炸時代的來臨，新聞傳媒已從單一傳播進化至立體數位傳播方式，資訊透過電視、網路、通訊衛星等高科技媒介傳遞而不受疆界限制。傳統戰爭的界線已被打破，戰場已從前方擴大至後方，從軍人擴及至民眾，從國內延伸至國際，輿論戰已成為實現國家軍事戰略的首要武器(孔英，2004)。加上，對台工作為中共的重要統戰工作，短期目標著重在操縱與影響我國輿論、提升民眾對於中國的認同與好感、建立內應網絡以及影響或介入干預我國內政與各項選舉等；最終目的則是統一台灣，藉由製造社會混亂而讓中共能以保護台灣人民為由而武力犯台(Cole, 2017)。

中共對台「輿論戰」作為，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是動員整個黨政軍系統來進行。為了能夠清楚探討中共近年來對台灣進行的輿論戰作為，本文主要是以現象分析的質性研究角度，同時採用文獻分析法對此議題進行論述。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是，究竟要如何界定中共的「輿論戰」？以及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對台操作輿論戰的作為為何？為了詳盡分析這個研究問題，本文首先說明「輿論戰」的定義，以作為瞭解中共對台實施輿論戰之基礎。其次，分別針對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統戰部、中宣部等單位進行說明，以利於對中共相關負責對台發動輿論戰之單位有所瞭解。再次，說明中共對台輿論戰常用的策略，並透過實際案例佐證近期中共對台所操作之輿論戰。

貳、「輿論戰」的界定

嚴格來說，目前關於「輿論戰」並未有統一的定義，因此本文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先簡要將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輿論戰定義一覽表請參閱表 1)，之後再歸納出輿論戰的定義。

第一、盛沛林、王林、劉亞三人在《輿論戰 100 例：經典案例評析》一書指出，「輿論戰是根據國家戰略意圖和軍事鬥爭任務，以輿論為武器，綜合運用各種傳媒和訊息資源，激勵我方戰鬥精神，削弱敵方戰鬥意志，為爭取政治主動和軍事勝利營造有利輿論環境的鬥爭行動」(盛沛林等主編，

2005：1)。

第二、朱金平在《輿論戰》一書中指出，輿論戰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意涵。廣義的輿論戰是指「對立雙方就共同涉及的某種事件、現象與問題進行的輿論對抗」；狹義者則意指「敵對雙方在某場戰爭中使用一切手段所進行的輿論對抗」(朱金平，2005：6-7)。

第三、陳輝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三戰」的研究和訓練〉一文指出，輿論戰的重點是掌握新聞輿論，在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充分被利用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網路、電子郵件、行動電話等進行宣傳，對敵人形成強大輿論壓力(陳輝，2004)。

第四、郝玉慶、蔡仁照、陸惠林三人在〈資訊時代的新聞輿論戰〉一文中指出，輿論戰是指「交戰雙方為改變敵對方觀點、壓制其意志、引導國際輿論，透過報紙、電視、廣播和網際網路等大眾媒體，進行的新聞輿論資訊攻擊與防護行動」(郝玉慶等，2005)。

第五、秦克麗在〈輿論戰在高技術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輿論戰是高技術戰爭中的「政治武器」、「牽引武器」、「催化武器」以及「麻醉武器」，係為強化戰爭制勝的籌碼以及瓦解敵軍的重要手段，有助於贏得戰爭主動權，並有效激發官兵的作戰士氣(秦克麗，2004)。

第六、黃進福等四人在〈中共三戰：不見煙硝的戰爭〉一文中，指出輿論戰是一場「想像的戰爭」，有計畫地透過傳播媒體向受眾(閱聽人)傳遞經過選擇之訊息和材料，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輿論攻勢，從而影響受眾的情感、動機、主觀判斷和行為選擇，藉此主導新聞輿論以對民意造成影響(黃進福等，2006)。

第七，2013 年美國國防部所資助之《中國：三戰》研究報告，指出輿論戰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活動，透過所有能影響公眾輿論的手段，包含電影、電視節目、書籍、網路以及全球媒體網絡，旨在對認知及態度產生長期影響」(Halper, 2013: 13)。輿論戰旨在「影響國內和國際輿論，以支持中共的軍事行動，並勸阻對手採取違背中共利益的行動」(Halper, 2013: 18)。

第八、美國國防部所發布之《2019 年中國軍力報告》，指出中共根據「三戰」戰略，對文化機構，媒體組織以及美國和其它國家、國際機構之商業、學術和政治界實施影響力行動，以利於自身的安全和軍事戰略目標(US DoD, 2019: iv-v)。其中，輿論戰是指向民眾傳遞訊息，藉此指導與影響輿

論，並獲得國內外聽眾的支持(US DoD, 2019: 112)。

表 1 「輿論戰」定義一覽表

作者	篇名／書名	定義
盛沛林、王林、劉亞	《輿論戰 100 例：經典案例評析》	輿論戰是根據國家戰略意圖和軍事鬥爭任務，以輿論為武器，綜合運用各種傳媒和訊息資源，激勵我方戰鬥精神，削弱敵方戰鬥意志，為爭取政治主動和軍事勝利營造有利輿論環境的鬥爭行動
朱金平	《輿論戰》	輿論戰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意涵，廣義的輿論戰是指對立雙方就共同涉及的某種事件、現象與問題進行的輿論對抗。狹義者則意指敵對雙方在某場戰爭中使用一切手段所進行的輿論對抗
陳輝	〈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三戰」的研究和訓練〉	輿論戰的重點是掌握新聞輿論，在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充分被利用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網路、電子郵件、行動電話等進行宣傳，對敵人形成強大輿論壓力
郝玉慶、蔡仁照、陸惠林	〈資訊時代的新聞輿論戰〉	輿論戰是指交戰雙方為改變敵對方觀點、壓制其意志、引導國際輿論，透過報紙、電視、廣播和網際網路等媒體，進行的新聞輿論資訊攻擊與防護行動
秦克麗	〈輿論戰在高技術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	輿論戰是高技術戰爭中的「政治武器」、「牽引武器」、「催化武器」以及「麻醉武器」，係為強化戰爭制勝的籌碼以及瓦解敵軍的重要手段，有助於贏得戰爭主動權，並有效激發官兵的作戰士氣
黃進福、張原萱、李耀衫、朱芝嫻	〈中共三戰：不見煙硝的戰爭〉	輿論戰是一「想像的戰爭」，有計畫地透過傳播媒體向受眾(閱聽人)傳遞經過選擇之訊息和材料，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輿論攻勢，從而影響受眾的情感、動機、主觀判斷和行為選擇，藉此主導新聞輿論以對民意造成影響
Stefan Halper(史蒂夫·哈爾珀)	《中國：三戰》	輿論戰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活動，透過所有能影響公眾輿論的手段，包含電影、電視節目、書籍、網路以及全球媒體網絡，旨在對認知及態度產生長期影響」。
美國國防部	《2019 年中國軍力報告》	輿論戰是指向民眾傳遞訊息，藉此指導與影響輿論，並獲得國內外聽眾的支持。

資料來源：盛沛林等主編，2005：1；朱金平，2005：6-7；陳輝，2004；郝玉慶等，2005；秦克麗，2004；黃進福等，2006；Halper, 2013: 18; US DoD, 2019: 112

綜合上述相關定義，本文將輿論戰簡要地定義為：根據國家戰略，有計畫地運用各種媒體傳播訊息，以利於平時在國內及國際上塑造輿論，有效控制輿論態勢。至於戰時，一來有助於鼓舞我方民心士氣；二來則可藉此製造敵方社會動亂，動搖其民眾信心及其對政府的支持。

參、中共對台輿論戰之相關部門

中共以宣傳與統戰策略起家，早年主要以喊話、標語及傳單為主，隨著科技進步與大眾媒體的發達，中共輿論戰的策略與載具不斷推陳出新，加大輿論戰運用的複雜度與衝擊力道(王崑義，2006：2)。加上，近來中共加大對我操作三戰力度，不斷利用台灣內部爭議事件散布渲染訊息，企圖影響民意，引導社會輿論走向(鄒文豐，2020)。以下就中共對台實施輿論戰之相關部門進行概述：

一、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是中共中央主管對台工作的職能部門，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簡稱「國台辦」，則為國務院主管台灣事務的辦事機構，主要職責為包含：研究、擬訂對台工作方針政策；組織、指導、管理、協調國務院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對台工作；研究台灣形勢和兩岸關係發展動向；以及負責對台宣傳、教育工作和有關台灣工作的新聞發布等(國台辦，2011b)。重要的是，習近平上任後組成「對台小組」來指導與處理台灣問題。根據寇健文教授的研判，中共未公開對台小組的成員名單，但是從媒體與相關文件研判，習近平的對台小組可歸納如下表：

表 2 習近平的對台小組成員(研判)

時間	姓名	黨政軍職務
2018 年迄今	習近平(組長)	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
	汪洋(副組長)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丁薛祥	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
	劉 鶴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許其亮	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
	楊潔篪	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王 毅	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
	尤 權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
	陳文清	國家安全部部長
	劉結一	中台辦、國臺辦主任
	王曉暉	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陳光軍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助理

資料來源：郭瑞華，2017：114-115；寇健文，2019：48。

根據工作職責，國台辦設有 11 個職能局與機關黨委，分別為秘書局、綜合局、研究局、新聞局、經濟局、港澳涉台事務局、交流局、聯絡局、法規局、投訴協調局、政黨局、機關黨委(國台辦，2011a)。現任國台辦主任由曾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劉結一擔任，並設有 4 名副主任，目前為裴金佳、陳元豐、劉軍川以及龍明彪。其中，「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為國台辦旗下的重要對台研究機構，固定透過舉辦「兩岸關係」或「一國兩制」為主題之研討會，邀請我國相關學者專家前往參加(寇健文，2019：56)。中共對台工作組織請參考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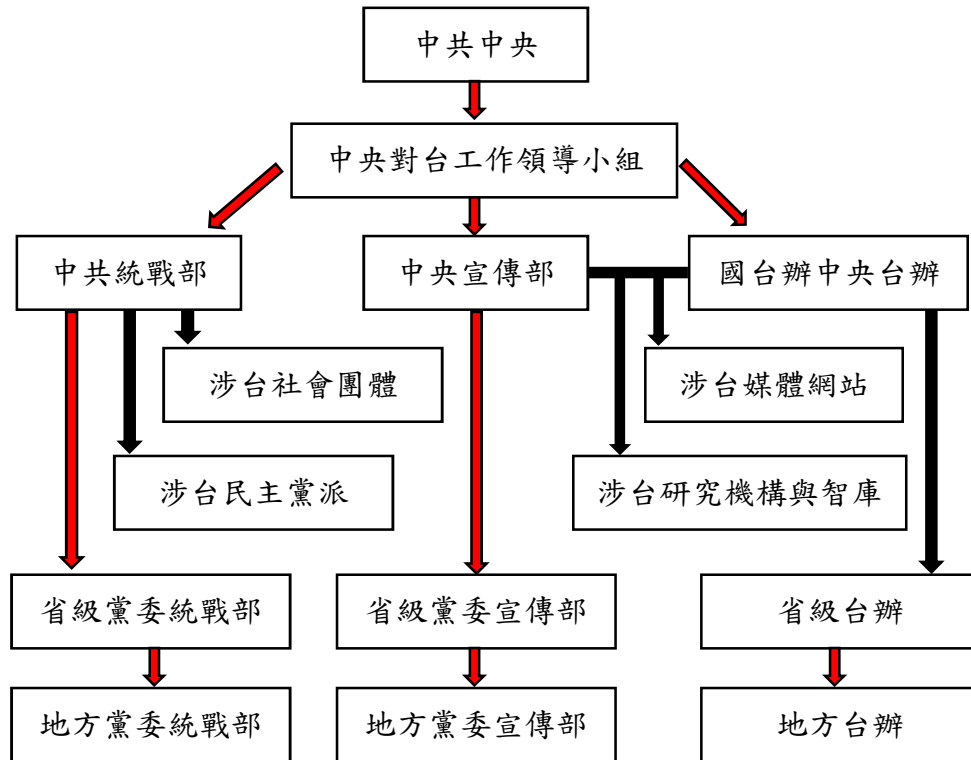


圖 1 中共對台工作組織

說明：➡：領導；➡：指導

資料來源：READr，2019。

關於國台辦對台之輿論戰，例如：國台辦對台發動輿論戰以阻止「反滲透法」過關，因為若該法通過的話，將使得中共對台滲透分化受到阻礙。在蔡英文總統於 2019 年 12 月 14 日宣示年底一定要通過該法後，不僅《人民日報》連續撰寫文章批評，且特定台灣媒體也配合發動攻勢。同時，國台辦所業管之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簡稱「台企聯」，亦刊登題為〈再弄惡法、民心不寧〉之廣告，批評「反滲透法」是綠色恐怖(呂伊萱，2019)。

二、統戰部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簡稱「統戰部」，是中共中央具體操作統戰工作的機構，由掌管統戰的政治局常委領導，主要職責包含：調查研究統一戰線的理論和重大的方針政策，組織貫徹執行中央關於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負責開展以祖國統一為重點的海外統戰工作以及負責開展海內外統一戰線的宣傳工作等(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2010)。目前，統戰部共設有 16 個局級機構，包含：4 個辦公室以及 12 個局。4 個辦公室分別為辦公廳、政策理論研究室、機關黨委、離退休幹部辦公室。至於 12 個局，則包含黨派工作局、民族工作局、港澳台統戰工作局、非公有制經濟工作局、無黨派及黨外知識分子工作局、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西藏工作局、新疆工作局、僑務綜合局、僑務事務局、宗教綜合局、第 12 局(負責宗教事務)。¹

在中共對台工作上，統戰部除了持續操作包含輿論戰在內之三戰外，並結合籠絡政治勢力及基層組織等傳統地面戰，形成立體網絡。除了對台工作小組及國台辦外，統戰部成為中共在各個交流領域中發揮影響力的最直接管道(仇佩芬，2019)。其中，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全國台聯」，為中共設立對台的統戰團體，在各省設分會，負責聯絡居住中國的台灣人(陳建志，2020)，其宗旨是「在愛國統一的旗幟下，廣泛團結聯絡台灣島內、港澳和海外的台灣同胞，……為反對『台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為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實現祖國統一，為振興中華、促進中華民族大團結而貢獻力量」(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2014)。

為了有助於拉攏媒體人以利於對台進行輿論戰，2020 年 9 月 21 日，全國台聯在雲南昆明舉辦「2020 年兩岸媒體人雲南行」。期間，全國台聯副會長鄭平除了指出兩岸媒體人是兩岸新聞輿論的傳播者，是講好兩岸故事、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力量，強調希望透過參訪考察，以利於宣傳雲南的改革與發展，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李娜，2020)。

三、中宣部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簡稱「中央宣傳部」。該部是主管意識形態宣傳和理論研究工作，指導宣傳政策的領導機構，且負責指揮新聞、廣

¹ 統戰本來僅下設 8 個局，但 2018 年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後，由統戰部統一管理宗教工作和僑務工作，再增設 4 個局以負責僑務與宗教工作。請參閱 Joske, 2019。

播、電視等相關單位。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與旅遊部、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亦受中宣部領導。中共的對台宣傳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的宣傳局負責，但須受到中宣部的業務指導(寇健文，2019：83)。根據2018年所通過之《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不再保留國家新聞出版廣播總局。新組建的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負責廣播電視管理，至於新聞出版及電影管理工作則歸中宣部管理，並對外加掛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國家電影局招牌(人民網，2018)。關於中宣部的管轄範圍請參考表3。

表3 中宣部的管轄範圍

中宣部	內容	意識形態	對應機構：中宣部理論局、宣教局
		文化藝術	對應機構：文化部
		教育學術	對應機構：教育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對外宣傳	對應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媒介	新聞報刊	對應機構：中宣部新聞局、全國黨報黨刊系統
		影視傳播	對應機構：國家新聞出版與廣播電視總局、國家電視台、地方衛視、電台
		圖書出版	對應機構：中宣部出版局
		互聯網	對應機構：國家網信辦

資料來源：西西皮，2017。

儘管過去中宣部在對台工作參與不多，但在「大外宣計劃」持續推動下，對台宣傳成為國際宣傳的一環，故中宣部在對台工作中扮演的角色較過往顯著，例如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即傳出中宣部名列第一線工作單位之中(仇佩芬，2019)。

四、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

2015年11月，習近平於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就軍事改革做出

方向指導後，後續相關改革於 2016 年 1 月開始逐步落實，例如將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將二砲部隊正名為火箭軍以及成立「戰略支援部隊」。戰略支援部隊係由以下單位整併而成，分別為原總參謀部直屬的二部(情報部)、三部(技術偵察部)、四部(電子對抗與雷達兵部)、五部(信息化部)、原總政治部的聯絡部與「三戰」基地，和原總裝備部負責科技情蒐單位等(揭仲，2016)。其中，中共將國安部、統戰部以及省市、公安部、解放軍等網軍部隊整合至「解放軍戰略支援部網路系統部門」，該部門為中共發動對台資訊戰之主要單位，2018 年九合一選舉成為該部門成立後之首個實戰練兵目標，同時並透過臉書(FaceBook)、YouTube、PTT 等散播假消息，以期有助於在 2020 年扶植親北京的政權(寇謐將，2019；游凱翔，2018)。另外，「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基地」，(簡稱「311 基地」，部隊番號「61716 部隊」)，不僅為對台進行心理戰和宣傳戰的前哨，亦參與對台發動網絡戰(陳津萍、張貽智，2019：39)。戰略支援部隊可能組織規模請參考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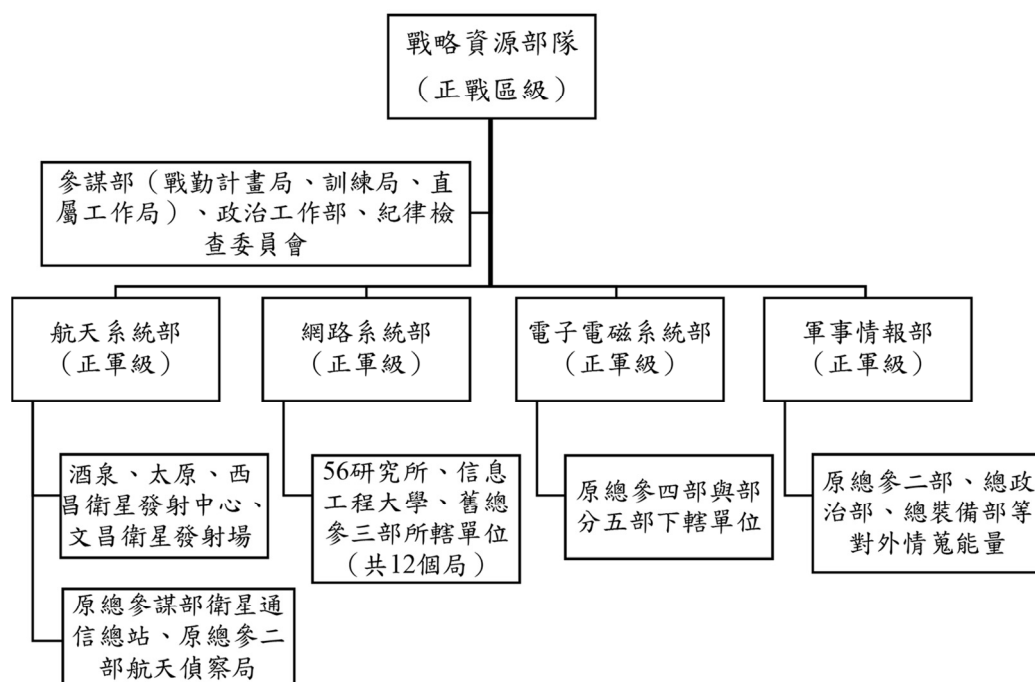


圖 2 戰略支援部隊可能的組織規模

資料來源：林穎佑，2017：119。

五、國家安全部

中國國家安全部，簡稱「安全部」，垂直領導全中國國家安全機關。主要職能包括：情報收集分析、反間諜、政治保衛等，是中國最大和最活躍的對外情報機構，也部分參與國內安全事務。2017 年 6 月 27 日，中共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規定「中央國家安全領導機構對國家情報工作實行統一領導」。該部亦為中共對台實施輿論戰的部門，旗下網軍不僅針對石門水庫或電廠進行駭客攻擊，亦常常攻擊台灣健保、監理處及戶政資料庫，因為這些資料係為中共遂行資訊戰的基礎(陳洧農，2019)。

六、共青團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共青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群團組織，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管轄，指導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開展工作。共軍共青團係按照《中國共產黨青年團章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和共青團中央的指示、規定，在部隊各級黨的委員會、政治機關領導以及該級首長的指導下，開展各種適合青年特點的教育和活動，在完成任務中發揮突擊作用(張志銘，2016)。共青團亦為中共對台實施輿論戰之其中一個部門，透過指揮帝吧(百度貼吧的一個論壇版塊)網友到臉書或 YouTube 等處瘋狂留言(被稱為「帝吧出征」)。2016 年，帝吧曾號召中國網民到蔡英文總統的粉絲專頁及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三立電視台等媒體洗版(中央社，2016)。

七、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宣傳局

原總政治部之宣傳部負責透過文藝、體育、宣傳等方法，從事中國國內政治教育與對外軍事宣傳等工作，下設新聞出版局、藝術局、文化體育局、宣傳局、部隊教育局、對外宣傳局(原先為理論宣傳局、部隊宣傳局、對外宣傳局等)等。在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於 2016 年 1 月撤銷，同時成立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之後成立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宣

傳局，其主要工作是對解放軍進行宣傳，並籌辦軍中文藝演出、軍事體育推展等其他活動(周復之、林立偉，2018：89)。2016 年 1 月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組織調整後，就「輿論戰」而言，宣傳局為中共對內對外之平台，一方面鞏固己方、凝聚向心，另一方面則負責對外主導輿論，「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其主要職責(陳津萍、張貽智，2019：43)。

八、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網絡輿論局

2016 年 1 月 1 日發布《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一文後，中共正式宣告啟動軍改工作，強調推進深化國防和軍隊的改革(新華網，2016)。其中，原總政治部改為「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工作部」，並設置網絡輿論局。原總政治部內並無專責引導網路輿論事務的編制，僅於原總政治部宣傳部之中設置網路辦公室。在此次軍改後，該辦公室被提升為網絡輿論局，負責網路輿情研判、輿論導引等事務(周復之、林立偉，2018：89)。2016 年 1 月軍改後，與上述宣傳局一樣，網絡輿論局亦為中共對內對外平台，不僅有助於凝聚中共內部向心力，亦負責對外主導輿論，有助於中共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一目的(陳津萍、張貽智，2019：43)，在中共對台輿論戰中扮演一定的角色。2017 年 11 月 19 日，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網絡輿論局指導、中共軍網負責營運維護的「網絡涉軍舉報平台」正式上線運行。

肆、中共對台操作輿論戰之策略

由於受到西方世界提出的「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中共一直感受外界對其崛起存有偏見，從 2009 年北京當局開始投入約 450 億人民幣進行全球宣傳計畫，也就是「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簡稱「大外宣」。其實早在 1950 年代，毛澤東就已經有「大外宣」的想法，例如：1955 年，毛澤東對《新華社》負責人吳冷西說：「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們的聲音！」1958 年，毛澤東提出創辦《紅旗》雜誌，作為中國對外宣傳其政策和理論的窗口，「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

因此，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就相當強調，必須主動管控世界對中國的印象。中共透過海外統戰工作來扼殺批評、宣揚中國正面看法，並鼓勵民主國家選民對國內政策施壓而有利中共。2013 年，習近平在中國思想宣傳工作會議指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換言之，為能利用中共觀點來洗腦全世界的人，藉此掌控「國際話語權」且與西方世界媒體「爭奪話語權」，中共積極開始在海外進行紅色滲透(何清漣，2019：26)。其中，中共透過開辦海外中文媒體研究中心、網站、雜誌；舉辦各種海外研修班，規訓海外中文媒體從業；定期舉辦會議，讓他們成為成中共「宣傳先鋒」，從對中共有利的角度來報導(何清漣，2019：113-124)。

關於對台輿論戰，中共除了持續透過傳統大眾媒體企圖改變選民認知以影響選舉外，也早已投入許多資源、人力與科技來推動網路輿論戰。因此，在 2020 年台灣總統與立委大選中，中共以台灣做為其進行網路輿論戰的試驗場，提高對台輿論戰力道以企圖影響民意走向與選舉結果。對此，相關國安單位與學者專家在選前即提出警告，例如：第一、我國國安局警告指出，中共為影響台灣民意走向，將加大操作「三戰」力度。其中，關於輿論戰，中共可能採取以下相關作為：(一)施加單邊作為，並輔以媒體渲染，製造官民嫌隙以及中央與地方矛盾；(二)利用新科技加強輿情及新媒體資訊監測，以作為研擬對台政策參考；(三)挖掘與培養兩岸新媒體意見領袖，並扶持傾陸台青和學者以期引導輿論走向(王承中，2019)。

第二、科蘭滋克(Joshua Kurlantzick)在〈中國如何干預台灣選舉〉(How China Is Interfering in Taiwan's Election)一文中，指出中共操作台灣輿論的作法包含多種混合手段，以期在台灣內部製造混亂，對選舉結果造成影響，包含利用 FB、微博等社群媒體以及 Line 散布假訊息；透過親中商人收購以對台灣傳統媒體加強控制，以及每個月對台灣發動數以萬計次的網路攻擊(Kurlantzick, 2019)。第三、史密特(Gary Schmitt)與馬明漢(Michael Mazza)兩人在〈讓敵人盲目：中國共產黨對台灣民主的干預〉(Blinding The Enemy: CCP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Democracy)此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共透過媒體、網路社群、地方組織以及台商介入台灣的選舉。其中，PTT 為中共散布假訊息的主要工具，約有 100-200 萬中產階級之台灣民眾使用 PTT，選前大量 PTT 帳號在蝦皮、淘寶等拍賣網站進行拍賣，且影響力高者甚至可賣至台幣 20 萬元(美金 6,500 元)。同時，部分帳號立場從原本親民進黨之溫和派，轉

變為親國民黨或是親共產黨(Schmitt & Mazza, 2019: 8-9)。

關於中共對台輿論戰常用的策略，主要包含以下幾項(王崑義，2006：22)：

一、滲透媒體與置入性行銷

從傳播學的「子彈理論」(bullet theory)(Schramm, 1971)，又稱「皮下注射針理論」(hypodermic needle theory)(Berlo, 1960)，或是稱為「刺激反應理論」(stimulus-response theory)的角度觀之(DeFleur and Bale-Rokeach, 1989: 163-165)，閱聽人對媒體訊息毫無招架能力，只要媒體訊息能「命中目標」，即能發揮效果(Severin and Tankard 著，羅世宏譯，2010：152)。因此，為了影響台灣社會民眾的想法與觀念，中共透過多管道滲透台灣媒體之現象早已存在一段時間，因為 2003 年資深媒體人楊士仁即發文指出此現象，台灣媒體因不景氣而陷入經營困境，中共透過提供資金或入股投資，藉此滲透台灣媒體(何清漣，2010)。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為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在 2008 年斥資 204 億台幣買下《中國時報》、《工商時報》、《時報周刊》、中天電視以及中視等媒體。同時，中國愛奇藝、騰訊、優酷等新興媒體亦以代理商來規避限制進入台灣，增強對台灣媒體的影響(李哲全，2019)。關於置入性行銷，如同《路透社》(Reuters)所報導之〈買「新聞」：中國利用媒體收買台灣人心〉(Paid 'news': China using Taiwan media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on island – sources)一文(Lee & Cheng, 2019)，因為直接購買新聞是最便利且具時效性之方法，中共透過購買新聞之置入性行銷方式對台進行輿論戰。

二、透過文化交流塑造中國正面形象

為有助於形塑自身正面形象以利於對台進行輿論戰，中共透過交流名義強化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友好的印象(陶聖屏、林宜瑾，2007：39)。例如首先透過補貼首次至中國旅遊者，根據數據顯示，只有 750 萬台灣人去過中國，仍有 1,500 多萬台灣民眾仍未去過。為鼓勵更多人到對岸走走看看，除了持續辦理行之多年的學生、教師及校長交流活動外，中共亦透過補貼首次到中

國觀光者，例如：2018、2019 年的平潭、莆田及湄洲島四天三夜行程，每人只要 3,900 元(BeClass, 2018; BeClass, 2019)。如此，不僅有助於透過片面展現中國發展的美好前景，並增進台灣民眾對於中國的認同感。其次則為密集安排村里長前往大陸進行交流，透過招待擁有一定地方影響力之四、五年級生村里長去一些經過建設的地方，希望讓他們有「人家中國很先進，現在很有錢」的印象，甚至藉此在其潛意識裡植入「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比中華民國民主更優越」(張凱翔等，2017；唐主桂，2017)。

三、利用中介機構進行輿論戰

由於中共長期對台進行統戰與滲透，故能透過統戰系統所建立的網絡及組織遂行輿論戰，除了購買臉書粉絲專頁、招募「網紅」以及購買新聞外，亦可透過中介機構進行宣傳，也就是透過台灣行銷公司來操作輿論戰。由於透過「層層外包」的訂單，業者並不清楚背後的真正委託者，行銷公司會依據訂單需求招募社群網軍及小編，進行輿情分析。例如：在美中貿易戰中，中共透過散布台灣不能依靠美國的訊息，希冀藉此製造台灣內部矛盾(龍率真，2019)。

四、透過網軍散布假新聞

根據 2019 年 4 月瑞典德堡大學所主持 V-Dem 資料庫所發布的報告顯示，2018 年針對世界各國遭受外國假訊息攻擊程度進行調查，在 179 個國家或地區中，台灣為接收來自外國政府或其代理人假訊息最嚴重國家(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 Institute, 2019)。中共透過網軍製造假新聞以影響輿論，採取的方式包含：殭屍帳號洗版、加工新聞事件回銷台灣、挑起爭議性議題以擴大社會對立與製造社會分裂以及在 LINE 群組散布假訊息等(李怡欣等，2019)。

五、採取軟硬兼施兩手策略

中共對台採取軟硬兼施策略，關於軟的方面而言，中共不斷透過釋出各

項優惠措施(惠台措施)以吸引台商前往大陸投資，藉此爭取台商及特定利益團體的認同與支持。同時，中共並透過兩岸民間交流及大眾傳媒造勢，以期引導我國輿論發展。就硬的方面而言，則透過軍事演練與軍機艦等作為來擾台，一來可發揮「以武促統」的效果，二來則可藉由媒體形塑一旦台灣宣布獨立的話，中共就會武力攻台之輿論，對我國軍民造成實體及心理雙重壓力(王俊南，2014)。

伍、實際案例

一、文教交流

中共透過兩岸交流以利於呈現中國發展的美好假象，提升民眾對於中國的認同與好感，以讓台灣社會傾向中國，有助於對台發動輿論戰。相關具體作為包含：

(一)加強兩岸基層教育人員交流：

除了青年學子外，中小學教師與校長亦為中共極力接觸與拉攏的對象，中共利用暑假期間舉辦各種交流與參訪活動(蘇永耀，2017)，例如 2019 年 7 月 10 日通州區政府所主辦之「第五屆京台基礎教育校長峰會」，兩岸中小學校長、師生代表共有 400 多人參加。其中，台灣中小學校長協會榮譽理事長薛春光表示，希望可以藉由此次峰會，讓兩岸教育界人士坐下來，建立起兩岸校長的專業對話機制(張語庭，2019)。2019 年 10 月 10 至 14 日，苗栗縣通霄國中、通霄國小 108 名師生家長前往福建省平潭區參訪當地實驗學校、圖書館以及文創特區。

中共藉由參訪交流名義包裝其政治意圖，刻意於活動中呈現中國發展的美好假象，有助於提升對於中國的好感與認同(鍾麗華，2019)，增強對於中小學校園的影響力，並利於未來對台灣發動輿論戰。同時，中共也能藉此建立聯繫管道，以利於之後讓中國的中小學教員來台「回訪」，擴大基層的活動面向與影響力(蘇永耀，2017)。

(二)鎖定大專青年：

由於現階段中共採取「一代(青年一代)一線(基層一線)」政策，基層及新一代青年成為重點拉攏對象，特別是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後，大專青年更是重中之重。對此，中共以低價甚至免費的交流旅遊團吸引大專青年，特別是國內頂尖大學的學生自治組織幹部與意見領袖，以利於宣揚習近平思想、一帶一路以及一國兩制等。由於這些學生菁英未來可能成為新一代政治領袖，除了希望藉此有助於對台發動輿論戰，甚至能夠培養引領風向、左右台灣輿論以及影響政策的代理人(吳柏軒、蕭玗欣，2019)。

二、媒體

根據 2001 年 11 月 21 日詹姆士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所發表的〈中國政府是如何試圖控制美國的華語媒體〉(How China's Government Is Attempting to Control Chinese Media in America)一文提及，中共主要透過四種方式滲透海外中文媒體：(一)以全資或控股方式直接掌控報紙、電台和電視台；(二)利用經濟手段影響與其有商業往來的獨立媒體；(三)置入性行銷：買斷獨立媒體的廣播時間和廣告，用於登載明顯來自中共官方的宣傳內容；(四)讓來自政府的專業人士受聘於獨立媒體，伺機發揮其影響力(Duzhe, 2001)。

其中，關於中共透過購買新聞報導以利於對台發動輿論戰，首先，2019 年 7 月 17 日《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即報導題為〈台灣總統大選初選凸顯對於中國影響媒體的恐懼〉(Taiwan primaries highlight fears over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一文，指出「中國時報與中天電視的記者告訴金融時報，他們的編輯主管直接聽從國台辦的指示；國台辦是北京政府負責處理台灣事務的機構」、「他們並未介入所有事務，主要與兩岸關係及與中國有關的議題，他們對於報導角度及其是否登在頭版具有話語權」(Hille, 2019)。

其次，2019 年 8 月 9 日《路透社》所發布題為〈買「新聞」：中國利用媒體收買台灣人心〉之報導指出，藉由訪問 10 名台灣記者、新聞部主管以及取得國台辦簽署的合約文件後，確認中共至少向五個台灣媒體集團支付報導費用，例如：國台辦支付 3 萬人民幣給某報社，以刊登 2 篇中國如何吸引台商之專題報導。同時，國台辦並透過設立「九州文化傳播中心」及「海峽兩

岸出版交流中心」等數位公司購買新聞，例如前者即於 2017 年支付 12 萬 300 人民幣報導中國某省的招商及觀光宣傳(Lee & Cheng, 2019)。

三、網站與社群媒體

台灣的網路自由環境亦讓中共有可趁之機，中共透過大量設立類似「內容農場」網站，並冠上「傳媒」或「新聞網」等名稱，藉此宣導中國官媒所提供之新聞內容、觀點，或是散布假訊息。由於這些網站使用媒體名稱及其編排方式，且民眾不加以查證的話，就可能誤以為是真正媒體而信以為真。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傳播媒體的影響力亦隨之增強，人們可以直接透過傳播媒體現場直播觀看事件現場，這造成傳統輿論戰手段已有所轉變，不能僅依靠報紙、電視以及廣播等傳播媒體遂行輿論戰，網路、通訊等新興媒體在輿論戰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孟繁宇，2007：81)。如同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所發表的〈敵對社會操縱：當前現實和新興趨勢〉(Hostile Social Manipulation: Present Realities and Emerging Trends)報告所言，近來中共積極透過資金投入與提高技術，以利於透過社群媒體操控輿論，同時，該報告亦指出，中共透過在社群媒體上購買廣告以利於宣傳，並透過商業公司於推特等平台上購買支持和影響力(Mazarr, et. al, 2019)。加上，由於社群媒體內容的生產成本低廉，容易成為假新聞製造者進行攻擊的途徑；且受到同溫層現象影響，人們喜愛從特定社群媒體獲得資訊，因而成為有心人散布假新聞的溫床(青年日報，2018)。由於社群媒體不僅為社交、娛樂的主要平台，亦是形塑輿論的主要推手，故成為中共推動輿論戰的策略之一，中共藉由 LINE、臉書、推特與抖音等網路社群媒體或軟體來操控輿論。

就 2019 年 11 月 4 日所發布之 26 條措施而言，在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 20 個部門推出，且國台辦強調「保障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灣同胞台灣企業提供更多同等待遇」後，中共官媒如《新華網》與《人民網》同步加強宣傳，於網頁上發布新聞指出該政策能為台灣企業與青年帶來機會，能獲得台灣民眾認同，例如新華網即刻意報導在陸青年台商的現身看法，指出台灣青年應該把握這一波政策紅利。同時，央視主播甚至喊出「灣灣，回家

吧」，中共刻意營造對台「讓利」氛圍，大肆宣傳與台灣共享發展機遇，希冀讓台灣民眾產生赴陸發展這一想法(邱國強，2019；國台辦，2019；查文曄、李寒芳，2019；徐弘毅，2019；何磊靜，2019)。

與此同時，「26 條措施」公布後，至少 19 家台灣網路媒體，亦即冠上「傳媒」或「新聞網」等名之「內容農場」網站，不僅隻字未提總統府與陸委會的回應與說明，甚至全文照貼「26 條措施」，且同步轉載〈逐條解讀 26 條措施〉、〈一圖讀懂 26 條措施〉以及 3 篇《中國台灣網》評論員解讀文章(鍾麗華，2019)。這係為中共常用的輿論戰策略之一，因為早在 2019 年 7 月就有類似情況發生，20 幾家網路媒體直接轉貼《中國台灣網》題為〈今日蔡當局霸道拔『管』，明年民眾輕鬆拔『蔡』〉文章(喬偉綱，2019)(詳如附表)。

四、社會基層

除了透過文教、媒體以及網站與社群媒體外，滲透台灣社會地方基層亦有助於中共對台操作輿論戰，例如中共透過中華統一促進黨(簡稱「統促黨」)來深入地方基層。統促黨為一親共統派政黨，支持中共政治主張、反對台灣獨立，一方面利用協助台商赴陸投資等利益誘惑，藉此要求台商在意識形態上支持中共；另一方面透過在全台各地舉辦講座、增進台灣人對中國的理解和支持(自由時報，2019)。根據《天下雜誌》調查發現，「統促黨早已深入鄉鎮，積極串接村里、農漁會、宮廟到對岸，也藉由社福及學校單位接觸低收入戶孩子。長期經營草根，打算以鄉村包圍都市……」(天下編輯部，2018)。因此，透過統促黨在地方基層布下綿密的人情網絡，將有助擴展人際網絡以增加中共進行輿論戰管道，例如：《中央社》就曾報導中共利用「病毒式社群散播」遂行其輿論戰，亦即透過所吸收的代理人，如地方現任或退任新聞工作者、基層組織等活躍人士，協助建立 LINE 群組或是臉書封閉社團等(侯姿瑩，2019)。

五、軍事恫嚇

關於今年共機頻頻擾台，主要目的是為了回應美軍大幅提升在台灣南方

空域的軍事存在以及台美關係的明顯升溫(洪子傑，2020a：10)。據國防部長嚴德發在立法院表示，截至 2020 年 10 月 7 日為止，入侵我國防空識別區的共軍戰機共有 1,710 架次，其中 217 架次入侵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且有 49 架次逾越台灣海峽中線，為 1990 以來的最高數目(游凱翔，2020)。同時，除了軍機擾台外，中共亦透過例行演訓、對台軍事演練，藉此動搖台灣民眾的民心士氣，並發揮對台軍事恫嚇效果(洪子傑，2020b：20-21)。因此，中共企圖持續透過軍機擾台、例行演訓以及對台軍事演練等武力展現作為，除能發揮「以武促統」效果外，亦可藉此威嚇台獨勢力，並對我軍民帶來實體與心理雙重壓力(王俊南，2014)。

陸、結論

根據上述，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受到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影響，中共將「三戰」視為其政治工作結合與發揮軍事作戰功能的核心戰法，並將輿論戰應用於對台統戰。關於中共對台輿論戰的主要目的，除了有助於爭取國際輿論支持，在國際社會上孤立台灣外；亦利於製造台灣內部動亂以讓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外，並塑造對中共有利之價值觀，促使台灣社會越來越向中共靠攏。

其次，中共對台進行輿論戰之部門主要包含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統戰部、中宣部、戰略支援部隊、中國國家安全部、共青團、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宣傳局以及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網絡輿論局。再次，中共對台輿論戰採取以下策略：滲透媒體與置入性行銷、透過文化交流塑造中國正面形象、利用中介機構進行輿論戰、透過網軍散布假新聞以及採取軟硬兼施策略。第四，根據相關案例顯示，中共透過文教交流、媒體、網站與社群媒體、滲透社會基層以及軍事恫嚇等面向對台實施輿論戰。

最後，中共遂行輿論戰的策略與途徑將日趨多元，除了持續強化傳統媒體操作外，以台灣媒體作為代理人，藉此降低台灣社會的警戒心，網站及通訊媒體或軟體亦成為其主要利用工具之一，中共企圖透過網站與社群媒體來操縱輿論走向，甚至影響選舉。對此，政府應該持續強化相關反制措施，以期能夠避免中共滲透，有效因應無煙硝味的輿論戰。

附表 中國兩次網路媒體操作對照

時間	事由	網路媒體
108 年 7 月	轉貼中共官媒《中國台灣網》的報導文章(〈今日蔡當局霸道拔「管」，明年民眾輕鬆拔「蔡」〉)。	1. 慈善新聞報 2. 兩岸時報總社 3. 城鄉新聞報 4. 指傳媒 5. 兩岸時報 6. 民生新聞網 7. 華民通訊社 8. 中華時報 9. 若水傳媒 10. 兩岸好康報 11. 海峽連線指導 12. 村里新聞網 13. 藝傳媒 14. 台中生活大小事 15. 台灣省新聞記者協會新聞網 16. 亮點新聞網 17. 冠騰傳媒 18. 民生報導 19. 兩岸好報 20. 亞傳媒 21. 法訊時報 22. 台灣全球新聞網
108 年 11 月	全文照貼〈26 條措施〉，且同步轉載逐條解讀 26 條措施〉、〈一圖讀懂 26 條措施〉以及《中國台灣網》評論員 3 篇解讀文章	1. 慈善新聞報 2. 兩岸時報總社 3. 城鄉新聞報 4. 指傳媒 5. 民生新聞網 6. 華民通訊社

		7. 若水傳媒 8. 兩岸好康報 9. 海峽連線指導 10. 村里新聞網 11. 藝傳媒 12. 台中生活大小事 13. 台灣省新聞記者協會新聞網 14. 亮點新聞網 15. 冠騰傳媒 16. 民生報導 17. 兩岸好報 18. 亞傳媒 19. 台灣全球新聞網
--	--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公開資訊。劃底線者為兩次皆有參與者。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一、專書

- 王崑義 (2006)。《中共對台輿論戰》。台北市：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朱金平 (2005)。《輿論戰》。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
- 何清漣 (2019)。《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新北市：八旗文化。
- 盛沛林等主編(2005)。《輿論戰 100 例：經典案例評析》。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Severin, Werner J. and James W. Tankard, Jr 著，羅世宏譯 (2010)。《傳播理論一起源、方法與應用(三版)》。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刊

- 沈明室 (2007)。〈中共三戰運用層次、策略與我國反制作為〉，《復興崗學報》，90，223-244。
- 周復之、林立偉 (2018)。〈科技興軍戰略下的共軍政治工作資訊能力發展與大數據運用〉，《復興崗學報》，113，頁 81-106。
- 孟繁宇 (2006)。〈論析輿論戰與戰爭之關係〉，《復興崗學報》，86，87-113。
- 孟繁宇 (2007)。〈中共「輿論戰」之析論〉，《展望與探索》，5(10)，81-101。
- 林穎佑 (2017)。〈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與規模〉，《展望與探索》。第 15(10)，102-128。
- 洪子傑 (2020a)。〈2020 年上半年解放軍台海周邊動態觀察〉，《國防安全雙週報》，6，9-17。
- 洪子傑 (2020b)。〈近期共機多架次逾越台海中線之簡析〉，《國防安全雙週報》，13，19-25。

- 張志銘 (2016)。〈習近平時期共軍共青團組織運作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50(5)，87-96。
- 郭瑞華 (2017)。〈中共 19 後對臺政策走向與人事布局〉，《展望與探索》，15(11)，103-118。
- 陳津萍、張貽智 (2019)。〈軍改後中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組織與職能之研究〉。《軍事社會科學專刊》，15，27-50。
- 陶聖屏、林宜瑾 (2007)。〈中共對我「輿論戰」之理論取向與運用之研究〉。《復興崗學報》，89，31-52。
- 閻亢宗 (2017)。〈中共對臺台輿論戰與我對應策略〉。《康大學報》，7(1)，1-15。

三、網路資料

- BeClass (2018)。〈2018 台灣與福建文化交流補助甄選簡章與報名表〉。
BeClass：<https://reurl.cc/1xnDNQ>。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7 日。
- BeClass (2019)。〈2019 台灣與福建省平潭交流甄選〉。BeClass：
<https://reurl.cc/oLNIEg>。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7 日。
- READr (2019)。〈一統去交流：全方位解析兩岸青年交流團〉，
《READr》：<https://www.readr.tw/project/unitedfront>。檢索日期：2020 年 11 月 22 日。
- 人民網 (2018)。〈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人民網》：<https://reurl.cc/6lbOLd>。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
- 中央社 (2016)。〈陸鄉民發動攻勢 狂灌特定台灣媒體臉書〉。《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1200460.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 (2010)。〈主要職責〉。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1200460.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 (2014)。〈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簡介〉。《中國統一戰線新聞網》：<http://tyzx.people.cn/BIG5/n/2014/0505/c384709-24976748.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
- 仇佩芬 (2019)。〈中國操作「三戰」擾台大選 「大統戰」整合空中地面戰場〉。《上報》：

-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8544。檢索日期：2020年9月25日。
- 天下編輯部 (2018)。〈白狼的統促黨比你想的更接地氣！宮廟、農漁會、深綠鄉鎮都有它〉。《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1632>。檢索日期：2020年10月3日。
- 孔英 (2004)。〈透視資訊化戰爭中的新聞輿論戰〉。《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1078/2536528.html>。檢索日期：2020年9月22日。
- 方錦誠 (2010)。〈中共發展輿論戰之特色與研析〉。《青年日報》：
<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1/m1001026-a.htm>。檢索日期：2020年9月10日。
- 王承中 (2019)。〈2020大選 國安局：中共將加大對台三戰力度〉。《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4220257.aspx>。檢索日期：2020年9月25日。
- 王俊南 (2014)。〈當前中共對台「三戰」的策略運作〉。《清流月刊》，3，1-4，<https://reurl.cc/4mbEmX>。檢索日期：2020年10月5日。
- 自由時報 (2019)。〈《路透》報導統促黨與中國合作 布局大選奪台〉。《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34579>。檢索日期：2020年10月2日。
- 西西皮 (2017)。〈誰控制現在，就控制未來——中共宣傳系統的「攻心計」〉，《端傳媒》：<https://reurl.cc/x0jOA4>。檢索日期：2020年11月22日。
- 何清漣 (2010)。〈何清漣：紅色資本滲透與台灣媒體「靠岸」〉。《美國之音》：<https://reurl.cc/q8KWog>。檢索日期：2020年9月30日。
- 何磊靜 (2019)。〈創業台青：「26條措施」讓我們信心滿滿〉。《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tw/2019-11/06/c_1125199833.htm。檢索日期：2020年10月1日。
- 吳柏軒、蕭玗欣 (2019)。〈中國免費、低價團 鎖定大專意見領袖〉。《自由時報》：
<https://features.ltn.com.tw/english/article/paper/1291619>。檢索日期：2020年10月10日。

- 呂伊萱 (2019)。〈台商登廣告批「反滲透法」 陸委會：做生意絕對不受影響〉。《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013074>。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
- 李佳鴻、鄭少凡 (2011)。〈中共對台輿論戰 招數大公開〉。《看雜誌》：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1/3652>。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1 日。
- 李怡欣、莊麗存、賴玟茹 (2019)。〈「網攻台灣」中共網軍造假新聞五大手法(一)〉。《大紀元》：<https://reurl.cc/avMmgG>。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1 日。
- 李哲全 (2019)。〈中國對台滲透作為與因應思辨〉。台灣新社會智庫：
<https://reurl.cc/2glkrv>。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6 日。
- 李娜 (2020)。〈「全國台聯 2020 兩岸媒體人雲南行」啟動〉。《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s://reurl.cc/2glkV4>。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
- 邱國強 (2019)。〈繼 31 條後 中國再推出對台 26 條〉。《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1040030.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 侯姿瑩 (2019)。〈中國操作訊息戰手法 國安人士分析：有 4 大特徵〉。《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7110256.aspx>。
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5 日。
- 查文曄、李寒芳 (2019)。〈大陸專家：「26 條措施」大幅提升台胞獲得感，加速兩岸融合發展進程〉。《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12/c_1125222703.htm。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 唐主桂 (2017)。〈陸招待里長打統戰？里長現身說法：這種方式非常高級〉。《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711005387-260407?chdtv>。
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9 日。
- 徐弘毅 (2019)。〈同等待遇聚力融合——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台商看好「26 條措施」新機遇〉。《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12/c_1125222921.htm。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 秦克麗 (2004)。〈輿論戰在高技術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新浪網》：

- <http://jczs.news.sina.com.cn/2004-08-11/0908216540.html>。檢 索 日 期：
2020 年 9 月 25 日。
- 郝玉慶等 (2004)。〈信息時代的新聞輿論戰〉。《全球防務》：
<http://www.defence.org.cn/article-2-18710.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
- 國台辦 (2011a)。〈內設機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
http://www.gwytb.gov.cn/gtb/201101/t20110109_1685186.htm。檢索日期：
2020 年 9 月 25 日。
- 國台辦 (2011b)。〈主要職責〉。國務院台灣辦公室：
http://www.gwytb.gov.cn/gtb/201101/t20110109_1685185.htm。檢索日期：
2020 年 9 月 21 日。
- 國台辦 (2019)。〈國務院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出台《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國台辦：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911/t20191104_12214930.htm。檢 索 日
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 寇健文 (2019)。〈中國大陸對台工作組織體系與人事〉。大陸委員會：
<https://reurl.cc/d0dRgy>。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
- 寇謐將 (2019)。〈台灣選舉裡的中國巨蟒：北京之策略與目標〉。《今周
刊》：<https://reurl.cc/0OarOM>。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6 日。
- 張凱翔等 (2017)。〈推動成立「中華台北村里長聯合總會」 中國統戰 收編
村里長〉。《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17816>。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8 日。
- 張語庭 (2019)。〈薛春光：望建起「兩岸校長對話的機制」〉。《中時新聞
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711002221-260409?chdtv>。
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6 日。
- 莊翊晨 (2019)。〈台灣已進入準戰爭狀態？ 專家揭秘中共對台資訊戰背後
秘密〉。《今周刊》：<https://reurl.cc/D6bVX5>。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 許如亨 (2008)。〈共軍「三戰」就是戰時心理戰一評「誤解」最多的大陸政

- 策〉。《新世紀智庫論壇》，43，53-61：
<http://www.taiwanncf.org.tw/tforum/43/43-15.pdf>。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15 日。
- 陳建志 (2020)〈對台統戰蒐資 觸角伸向下一代〉。《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66837>。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7 日。
- 陳洵農 (2019)。〈沈伯洋 | 戰爭早已開打：假新聞與資訊攻擊〉。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https://www.feja.org.tw/46799>。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 陳輝 (2004)。〈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三戰」的研究和訓練〉。《新浪網》：<http://mil.news.sina.com.cn/2004-07-16/1738210714.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3 日。
- 喬偉綱 (2019)。〈台灣 23 家網媒抄中國官媒「拔蔡」 陸委會籲速修法防紅色滲透〉。《上報》：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7094。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2 日。
- 揭仲 (2016)。〈淺論中共「戰略支援部隊」之建置與戰力〉。《青年日報》：<https://www.ydn.com.tw/News/114773>。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
- 游凱翔 (2018)。〈境外假消息攻勢 國安單位加強跨國合作因應〉。《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1810240288.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8 日。
- 游凱翔 (2020)。〈嚴德發：49 架次共機逾越台海中線 30 年來最多〉。《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10070130.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11 月 24 日。
- 黃進福等 (2006)。〈中共三戰：不見煙硝的戰爭〉。《青年日報》，版 3：
<https://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1/eb0045.htm>。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
- 新華網 (2016)。〈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117646695.htm。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 鄒文豐 (2020)。〈【全民國防】抵禦中共「三戰」威脅 捍衛民主〉。《青年日報》：
<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216263>。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6 日。
- 管瑞平 (2019)。〈苗栗百名師生赴陸文教參訪滯留 校方：天候因素〉。《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1910170065.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6 日。
- 龍率真 (2019)。〈中共操作輿論戰 傷害民主自由〉。《青年日報》：
<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189217>。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2 日。
- 鍾麗華 (2019)。〈中國宣傳 26 條 台灣網媒「全文照貼」〉。《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972771>。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2 日。
- 蘇永耀 (2017)。〈中國滲透我中小學校長 廣邀暑假參訪〉。《自由時報》：<https://reurl.cc/Y1MLax>。檢索日期：2020 年 10 月 6 日。

英文部分

一、專書

- Berlo, David K. (1960).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San Francisco: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DeFleur, Melvin L. and Sandra Bale-Rokeach (1989).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Longman.
- US DoD (2019).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Washington D.C.: US DoD.

二、專書論文

- Schramm, W. (1971). Th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s. In W. Schramm, & D. F. Roberts (Eds.),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3-53.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三、網路資料

- Cole, J. Michael (2017). "China Seeks Vicious Circle of Violence Through United Front Activities in Taiwan." *Taiwan Sentinel*, September 26, 2017, At <https://sentinel.tw/china-violence-ufw-tw/> (Accessed 2020.9.12).
- Duzhe, Mei (2001). "How China's Government Is Attempting to Control Chinese Media in America."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November 21, 2001, <https://reurl.cc/v1KOoN> (Accessed 2020.9.28).
- Halper, Stefan (2013). "Chin: Three Warfar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ay 2013, At <https://cryptome.org/2014/06/prc-three-wars.pdf> (Accessed 2020.9.10).
- Hille, Kathrin (2019). "Taiwan primaries highlight fears over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Financial Times*, July 17,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036b609a-a768-11e9-984c-fac8325aaa04> (Accessed 2020.9.28).
- Joske, Alex (2019). "Reorganizing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New Structures for a New Era of Diaspora and Religious Affairs Work."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May 9, 2019, <https://reurl.cc/Qd1yyO> (Accessed 2020.9.25).
- Kurlantzick, Joshua (2019). "How China Is Interfering in Taiwan's Electi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7, 2019, At <https://www.cfr.org/in-brief/how-china-interfering-taiwans-election> (Accessed 2020.9.15).
- Lee, Yimou & I-hwa Cheng (2019). "Paid 'news': China using Taiwan media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on island – sources." *Reuters*, August 9, 2019, At <https://reurl.cc/aleKRZ> (Accessed 2020.9.23).
- Mazarr, Michael J. et. al (2019). "Hostile Social Manipulation : Present Realities and Emerging Trends." Rand Corporation, September 4, 2019, <https://reurl.cc/nVYRVl> (Accessed 2020.9.29).
- Schmitt Gary J. & Michael Mazza (2019). "Blinding the Enemy: CCP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Democracy."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October 2019, At <http://globaltaiwan.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GTI-CCP-Interference-Taiwan-Democracy-Oct-2019-final.pdf> (Accessed 2020.9.15).
- 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 Institute (2019). "Democracy Facing Global

中共對台操作「輿論戰」之研究

Challenges V-DEM Annual Democracy Report 2019.” V-Dem Institute, May 21, 2019, <https://reurl.cc/ldaKj9> (Accessed 2020.9.23).

我國新南向研究之期刊計量分析

尹新豪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研究所研究生

摘 要

東南亞與南亞兩大區域具有龐大的消費市場與內需供求的商機，逕自成為世界各國欲爭取合作的對象。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調整原以經貿為主的南向政策，推出雙向交流、整合資源、以人為本的「新南向政策」，爭取該區域經貿交流的機會，以分散對中國風險。本研究欲瞭解新南向政策在我國學術研究的脈絡與趨勢，首次採用「描述型書目計量」的方法，以「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收錄新南向相關期刊為研究標的，自 2016 年新南向政策規劃初期至今(檢索日期：109 年 4 月 23 日)共計 166 篇，分析我國新南向研究之文獻成長趨勢、主題分布、作者特性與期刊特性。研究結果文獻數量呈現無法預測、不規則的渾沌現象；在主題分布以「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為主；在作者特性，生產力偏低，多以獨著為主；期刊以「臺灣經濟研究月刊」刊載最多文獻，且期刊文獻的數量分布不符合布萊德福定律。鑑於推動新南向工作是國家當前重要政策，希冀激起各界研究能量，以利提供相關單位參酌方針。

關鍵字：書目計量、文獻成長、布萊德福定律、新南向政策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Journals for New Southbound Research in Taiwan

Hsin-Hao Yin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Abstract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are two regions with huge consumer markets and domestic demand and supply opportunities that make them attractive to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fter President Tsai Ing-wen inaugurated in 2016, she adjusted the initial “Go South Policy” based on economy and trade, and launched a two-way exchange, integrated resources, and a people-centered “New Southbound Policy” to strive for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in the regions to diversify risks to Chin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s and trends of the study on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Taiwan,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method of “descriptive bibliometric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used the “Airiti Library”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o collect the “New Southbound” related journals and articl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 2016 (retrieval date: April 23, 2020), a total of 166 academic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to analyze its literature growth trends, topic distributions, author characteristics, and journal features.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presented an unpredictable and irregular phenomenon. In detail, the main theme distribution was “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trade/economic expansion”; the author characteristics revealed low productivity and independent work mostly; the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Monthly” included the most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policy, but the number distribution of journal articles did not follow Bradford's law.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promoting the “New Southbound” work is an important national policy, we hope to arouse the research enthusiasm from various academic fields in order to provide relevant guidelines.

尹新豪

Keywords: Bibliometric, Literature growth, Bradford's law, New Southbound Policy

壹、前言

東南亞及南亞兩大區域龐大的消費能力與內需市場，已被各國視為最具有商機的新興市場。復因美國延續「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策略，提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印度的「東行政策」(Act East Policy)等，彰顯出東南亞已成為世界各國爭奪市場的重要地區。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力推「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期藉由實質強化與東南亞等區域的全面鏈結，減少對中國大陸的經貿依賴，重新定位臺灣在亞洲發展的重要地位。

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 Scientist)曾說過：「如果說我看的比他人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seen farther than others, it is because I wa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因此，我們必須要在既有的文獻紀錄基礎上，持續產製更新文獻的知識。圖書館學家布萊德福(S. C. Bradford)也曾說：「未曾經過處理的文獻，顯的雜亂無章，如同棄置在科學文獻堆中，毫無用處」(S. C. Bradford, 1948: 9-10)。為此，如何運用書目計量的方式，以有系統的數學計算、統計方法等，對相關期刊文獻的本質、作者特性、數量等予以分析研究(何光國，1994：7-8)，也就成為學術研究的先期課題，並藉此瞭解該主題研究的脈動與趨勢。

以期刊文獻作為研究標的，因它具有研究主題範圍較小、研究時間較短以及發表數量較多等特色(Bingham & Bowen, 1994)。為此之故，本文將採用「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所建構之學術資料庫作為研究資料的來源，並同時採用描述型書目計量的方法，來剖析我國新南向研究之文獻成長趨勢、主題分布、學科分布以及作者特性與期刊特性，用以瞭解新南向政策在我國各領域研究的脈絡與趨勢。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採用描述型書目計量的方法，探討我國新南向研究之期刊生產力，因而就書目計量以及新南向政策研究進行回顧論述，並聚焦於期刊所發表之文獻進行相關表徵的描述與解釋。

書目計量學(bibliometrics)一詞係於 1969 年由普里查德(A.Pritchard)首先提出，其定義經多次修正之後，界定為「利用數學及統計的計算法，對所有傳播的出版形式及其作者進行組織、分類及量化的評估」。目的旨在於提供知識結構與傳播的資訊。它可區分為「描述型書目計量學」(descriptive bibliometrics)與「評估型書目計量學」(evaluative bibliometrics)兩類型，描述型重點在於描述文獻特性，用於生產力的計算，例如某特定領域論文、圖書、期刊或其他類型資料文獻的數量分布及其研究內容特性，另亦可以時間、主題及地理區域作為區分標的，加以分析研究；而評估型的書目計量則是針對主題研究所引用之參考書目或引文，來計算文獻被引用的情形(蔡明月，2003：5-7)。

描述型書目計量的用途在於描述某一特定主題或學科文獻的特性，包括文獻形式特性、文獻內容特性、文獻作者特性以及期刊文獻特性等四種(林巧敏，2009：104)。在重要的定律的應用方面，則有布萊德福定律(Bradford's Law)、齊夫定律(Zipf's Law)以及洛卡定律(Lotka's Law)等三定律，並分別應用於期刊分布、詞頻分布以及作者分布等不同層面。然而，在文獻成長現象方面則呈現出線性成長、指數成長、邏輯斯第(Logistic)成長以及非線性動態的渾沌現象等四種類型。

林巧敏等 2010 年提及書目計量學已成為探究知識發展趨勢之重要研究方法，因各種書目資料所包含的內容，就已涵蓋了相關的表徵。所以，就可以用來理解該主題學術研究之文獻成長、學科興衰更迭以及作者生產力等。另分於 2009 年及 2010 年運用書目計量方法，針對臺灣地區資訊組織文獻以及檔案學研究加以分析，就文獻成長、主題分布以及期刊分布等特性加以探討，研究結果發現文獻成長均呈現出非線性動態成長的渾沌理論現象；期刊文獻數量的分布也不符合布萊德福定律所述的各區期刊種數之比值 $1:n:n^2$ 等結果(林巧敏，2009：101-121；林巧敏、范蔚敏，2010：16-37)。

另就我國新南向政策的學術研究方面，吳福成 2016 年研析，隨著東南亞的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的建立，以及南亞大國印度的經濟崛起，兩大區域近 18 億 5,000 萬人口的龐大消費與內需市場，

皆被各國視為最具有商機的新興市場。另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成本上漲，以及經濟發展趨緩，因而進入「新常態」，不少在中國投資經營運作的外商企業，甚至中國企業都紛紛走出去，把生產基地或營運據點移轉到東南亞或印度(吳福成，2016)。就在全世界主要國家競相搭上東協列車之際，我國亦挾著「距離近」、「華人眾多」、「臺商已有布局」等優勢。賡續原有南向政策成為新版的新南向政策；運用國家總體資源，鼓勵臺商進入東協市場卡位，取得東協高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商機。於是，就在我政府銳意擘畫與經營，適時提出新南向政策，如今在國內也因政策利多的激發下，各領域的研究熱情與網路的討論也有被燃起之勢。

2017 年楊昊分別從制度與網絡兩個軸線全般性的檢視臺灣新南向政策的進展。在制度軸線方面，他梳理出自 2015 年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之後的構想、規畫、與執行三階段。在網絡軸線方面，他分析新南向政策涉及到由中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間、國內到國際的三重利害關係的網絡，並就研究所得，給予政府部門推動新南向政策，全般政策考量的建議，分別是：一、必須從國際格局與區域變遷的動向來提升新南向政策的戰略定位；二、必須在「新南向政策中的兩岸論述」與「兩岸架構中的新南向機會」兩種不同政治思維與戰略中要有更清晰的表態；三、政府未來應根據 18 個新南向國家的特色，分別發展量身定做的計畫，以利集中資源，同時也能帶動國內相關部門的一同投入；最後，政府部門應展現決心，促成新南向國家與我國共榮發展、塑建區域的影響力(楊昊，2017：123-136)。

2018 年林顯明探討臺灣與新南向 18 國人才交流之政策、現況與發展，在新南向政策「以人為本」的基礎上，教育部成為推動人才交流重要的機關單位，並說明了新住民子女方面等八項具體的政策推動措施，以及我國與新南向政策國家學生交流往來(含學位班、非學位班)、畢業留臺就職、赴海外就業等三面向。在「引進來」策略方面，執行成效已日益展現、但在吸引僑生和外籍生畢業後留臺工作方面，政府還需要創造更多誘因，如完善的人事制度、薪資結構與工作環境等，才有可能吸引更多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在「走出去」方面，工作成效較為有限，臺生赴新南向國家進行短期研修、取得學位或實習的人數不增反減，希望政府部門能再提出良策，鼓勵大專院校更多的臺生赴新南向國家學習與交流，從而促進雙邊更好的、有效的瞭解與互動(林顯明，2018：60-65)。

2019 年朱英嘉、莫桂娥探討臺灣新南向觀光政策的發展與現況，透過相關文獻的釐清發現，自 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兩岸關係發生迥異變化，中共縮減來臺觀光旅遊人數，嚴重影響到臺灣地區觀光市場，我政府基於國家安全考量，避免過度向中共傾斜，進而轉向瞄準東南亞市場，以「迎客、導客、留客、常客」為號召，吸引東南亞各國旅客來臺旅遊，以刺激臺灣觀光產業及周邊產業的消費成長。未來無論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更替，或是兩岸關係有了新變數，或是國際關係的迥異變化，新南向政策都會是我國對外關係的重要戰略(朱英嘉、莫桂娥，2019：78-92)。

2019 年日本學者駒見一善探討兩岸關係緊張下關於臺灣的民眾交流，中共自 2013 年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代一路倡議，英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及 2018 年提出「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惠臺 31 項措施)，2016 年蔡英文政府上任後，兩岸關係丕變，政府為了減緩對中共經貿的依賴，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兩岸開始在東南亞、南亞及紐澳地區有了顯著競逐現象的產生，兩岸的官方對話、交流逐漸趨緩，國際間彼此相互角力且持續升溫(駒見一善，2019：110-116)。

2020 年唐豪駿則以經貿合作面向探討美中貿易衝突對新南向地區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等六個主要國家之影響，研究結果認為，我國宜參考渠等主要國家之產業政策，誠如越南同時兼具 CPTPP 與 RCEP 的成員，及與歐盟簽署自貿協定，成為外資外移的首選。其餘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也積極透過國內政府政策引導，利用自身的優勢吸引外資，冀能抵銷因中共經濟成長遲緩所帶來的貿易衰退。印度則是因政府的保護主義傾向，以及國內投資環境不佳，使其決定退出 RCEP，在這波美中貿易衝突中受益有限，唯僅藉由國內龐大的人口紅利在吸引外資。根據各國的發展利基，引導我國不同性質的產業前往新南向政策地區布局，冀能在印太地區發展以我國作為節點的臺商產業供應鏈(唐豪駿，2020：86-92)。

綜上所述，足以彰顯有關我國新南向政策主題的學術研究自 2016 年規劃至今，已有近 5 年的時間，相關研究的期刊文獻多以官方所發布之官方數據及官方文件等作資料來源，多採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來探討新南向政策現況、發展與未來趨勢。渠等學術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並未觸及書目計量學，尤其是以期刊文獻作為研究的標的。因此，本文意圖使用「描述型書目計

量」的方法，針對我國新南向政策相關研究所呈現之表徵，聚焦於期刊所發表之學術研究成果，從而窺探文獻數量的成長與分布，主題的類型以及作者特性等，進而掌握新南向政策之研究脈絡與未來發展之趨勢。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描述型書目計量學」的方法，針對我國「新南向政策」主題之研究所發表相關期刊的文獻數量、主題分布、期刊特性以及作者特性等加以探究分析。

二、樣本的選取

期刊文章所需要的研究時間，相對於專書、碩博士論文所需的研究時間較短、發表數量亦是較多，較能即時反應其發展的動態，適合作為研究的標的(Bingham & Bowen, 1994)。故本文的研究取樣是由「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網址：<http://www.airitilibrary.com>)所收錄，可即時獲取電子全文之文獻，以「新南向」單一詞彙於篇名、關鍵字及摘要等三欄位進行檢索，時間範圍 2016 年政策規劃初期迄今(檢索日期：109 年 4 月 23 日)，研究文獻範圍設定為臺灣出版之期刊文獻進行取樣，以瞭解新南向政策在我國研究的趨勢，經系統篩選去除會議資料、碩博士論文、中國大陸相關文獻，共有 179 篇，另再扣除 2015 年(含)之前的 9 篇，及未標示作者的 4 篇，實際可用之期刊文獻共計 50 種期刊、166 篇期刊文獻，涵蓋了學術研究與技術報告等範疇。

三、研究主題歸類

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14 日所核定之新南向政策工作計畫，區分「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鏈結」等四大工作主軸，計有

「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等 15 項推動措施及相關計畫重點。有鑑於新南向政策研究主題分類目前並無一致認定之主題分類表。為此之故，為了研究順利，本研究借用此一工作計畫並以此作為本研究主題分類之參照。

各項分類主題內容範圍說明如下：

(一)經貿合作：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基礎建設工程合作與系統整合輸出、金融支援等內容。

(二)人才交流：人才培育、產業人力合作、新住民培力等內容。

(三)資源共享：醫療及公共衛生合作、觀光促進、文化交流、農業合作、科技合作等內容。

(四)區域鏈結：區域整合、協商對話、策略聯盟、僑民網路等內容。

(五)其他：整體敘述、無相關等內容。

本文主題分類共計五類，研究主題涉及兩項(含)以上的推動措施，以探討內容較多者為主，若探討全般整體性說明，或未涉及四大工作主軸內容等二項屬於「其他」類，每一文獻以歸納一個主題為限。

肆、研究成果與分析

一、文獻數量成長

世界萬物，只要有生機和合適的生長環境，就能成長。人會長大，樹會長高，圖書館的文獻書籍亦是如此，也代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與文化知識水準的提升。文獻數量如果以累積方式計算，文獻量絕對是有增無減，若以逐年方式計算，應該是上下起伏消長互見(何光國，1994：11)。「新南向政策」自 2016 年核定相關計畫，遂於 2017 年開始推動，迄今近 4 年的時間，由表 1 可得知相關期刊文獻各時期的篇數。

表 1 期刊文獻逐年分布統計表

年代	年度篇數	累計篇數
2016	21	21
2017	50	71
2018	55	126
2019	37	163
2020	3	166

由圖 1 可觀察到 2016 年為政策規劃階段，期刊文獻數量較為有限，直至 2018 年計 55 篇達到最高峰，此後開始下降的趨勢。整體文獻的成長藉由累計文獻篇數曲線來觀察，初期呈成長曲線至飽和狀態時開始有轉折的改變，期刊文獻數量成長趨於緩和，最後出現遲緩衰退的現象。因此，在文獻成長現象則屬於非線性動態的渾沌成長(non-linear dynamics and chaos)。此種現象是指受到各種內在機制與外在因素的影響，文獻數量以非常不規律的方式變化，無從判斷是屬於線性或指數曲線(張瀚文，2012)。說明了我國新南向政策，初期是相當熱門的探討議題，目前文獻發表數量處於沈靜的狀態中。

近年兩岸關係的白熱化，誠如前財政部長許嘉棟指出，當前政府欲以新南向政策加深目標國家的交流，以取代兩岸僵局下交流的困境(賴錦宏、沈婉玉、戴瑞瑤，2020)；研究員楊書菲亦提及，在兩岸缺乏互信的基礎上，中共試圖打壓我國與目標國家的經濟交流，「新南向政策」執行效益，似乎不樂觀(楊書菲，2017)；中共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提出，「兩岸關係好，臺灣才會好」(尹賽楠，2020)，若否，新南向政策難以帶動我國的經濟成長(陳昱旗，2017)，此牽連著我國與各個國家交流的基礎，亦說明了兩岸關係與新南向政策推動的密不可分，間接的影響相關期刊文獻的數量，唯有新的議題，誠如當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預計在年(2020)年底簽署之影響、我國與東協國家的經貿策略、美國「印太戰略」之影響、兩岸關係等新刺激下，冀以喚醒國內的研究動能。

尹新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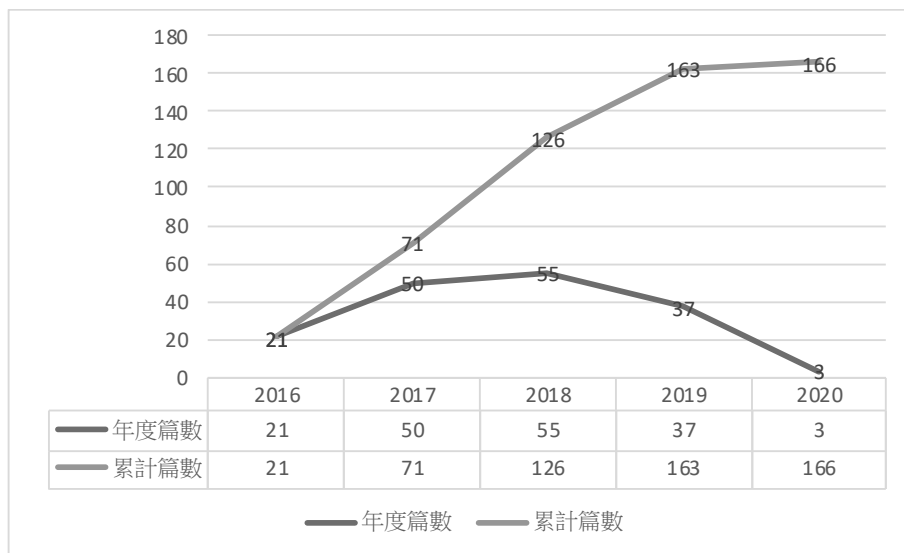


圖 1 期刊文獻數量成長曲線圖

二、研究主題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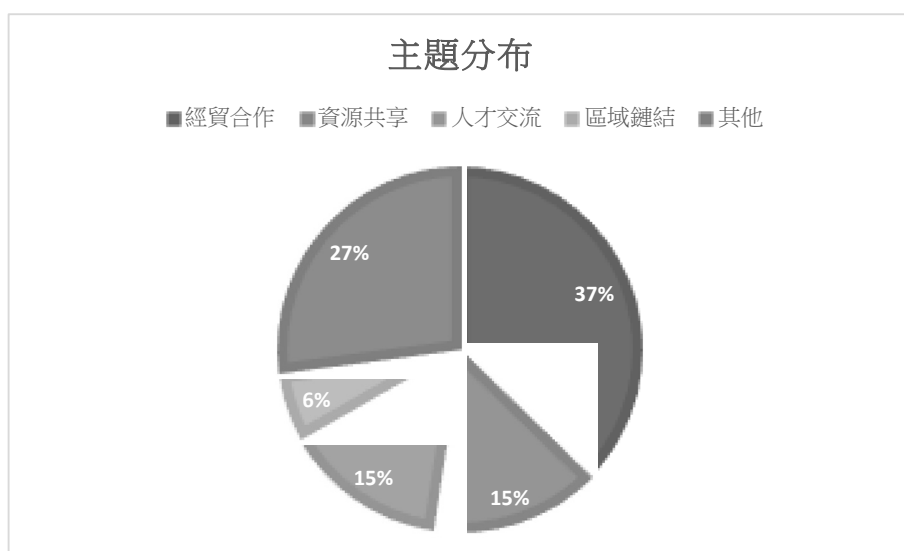


圖 2 四大工作主軸研究主題之圓餅圖

圖 2 所示，新南向政策相關期刊文獻之主題分布，根據前述五類的歸類方式加以分析，在「經貿合作」類，有 62 篇(佔 37%)居首位，其中以 2018 年發表 21 篇最多，作者以唐豪駿發表「美中貿易衝突對新南向地區主要國家之影響」、「我國 5+2 產業創新與新南向工業 4.0 之合作契機」、「開發新南向的需求市場－以電子商務為例」3 篇最多，期刊以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之「經濟前瞻」刊載 18 篇最多；在「其他」類，有 45 篇(佔 27%)，此類涵蓋闡述新南向政策全般內涵，非僅針對單一主軸、項目實施說明，如陳尚懋等員 2019 年發表《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在泰國的實踐》乙文，研究指出泰國積極推展區域經濟合作，提升在區域的經貿競爭力，逐成為兩岸爭取合作的對象，文中分析「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的內涵，與探討在泰國的實踐。另一部分，僅在摘要、關鍵字提及「新南向」乙詞彙，本文內涵未涉及新南向相關工作的推展，如陳欣欣 2020 年 4 月發表《從新聞產製談新住民女性刻板印象研究》乙文，研究主題係臺灣主流媒體如何產製與本地不同國籍或種族的新住民女性，「新南向政策」為其中一組關鍵字，全文未涉及新南向相關工作；在「資源共享」類，有 25 篇(佔 15%)，以 2018 年發表 12 篇最多，作者以魏于翔發表「天然藥物及藥材開發產業化推動與新南向發展策略規劃研討會報導」等 2 篇最多，期刊以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出版之「臺灣經濟月刊」刊載 6 篇最多；在「人才交流」類，有 24 篇(佔 15%)，以 2017、2018 年均為 8 篇較多，作者以楊真宜、張芳全分別發表 2 篇最多，期刊以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出版之「臺灣經濟月刊」刊載 3 篇最多；在「區域鏈結」類有 10 篇(佔 6%)，以 2017 年發表 4 篇最多，作者均發表 1 篇，期刊以「經濟前瞻」刊載 5 篇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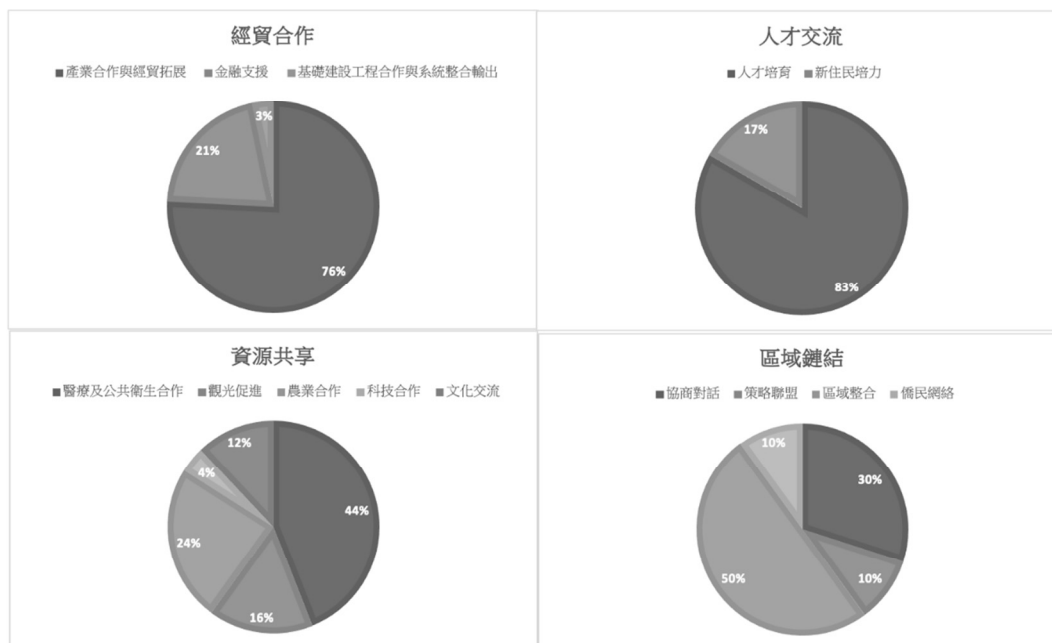


圖 3 四大工作主軸之研究主題項目之圓餅圖

圖 3 所示，新南向政策四大工作主軸之主題分布的分析，在「經貿合作」類中，以「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項 47 篇(佔 76%)最多，其後依序「金融支援」項 13 篇(佔 21%)、「基礎建設工程合作與系統整合輸出」項 2 篇(佔 3%)，發表時間 2016 年 5 篇、2017 年 20 篇、2018 年 21 篇、2019 年 15 篇、2020 年 1 篇；在「資源共享」類中，以「醫療及公共衛生合作」項 11 篇(佔 44%)最多，其後依序為「農業合作」項 6 篇(佔 24%)、「觀光促進」項 4 篇(佔 16%)、「文化交流」項 3 篇(佔 12%)、「科技合作」項 1 篇(佔 4%)，發表時間 2016 年 1 篇、2017 年 4 篇、2018 年 12 篇、2019 年 8 篇、2020 年無發表；在「人才交流」類中，以「人才培育」項 20 篇(佔 83%)最多，「新住民培力」項 4 篇(佔 17%)次之，發表時間 2016 年 2 篇、2017 年 8 篇、2018 年 8 篇、2019 年 6 篇、2020 年無發表；在「區域鏈結」類中，以「區域整合」項 5 篇(佔 50%)最多，「協商對話」項 3 篇(佔 30%)次之，以「僑民網絡」及「策略聯盟」兩項皆為 1 篇（各佔 10%）最少，發表時間 2016 年 1 篇、2017 年 4 篇、2018 年 3 篇、2019 年 2 篇、2020 年無發表。

在「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項之主要探討內容，其在 2020 年僅唐豪駿發表期刊 1 篇並指出，在美中貿易衝突下新南向地區主要國家的利弊分析，以及我國該需如何因應有利經貿市場的發展。2019 年共發表 10 篇期刊，計有王珍一等著《採購策略與供應商關係對採購績效之影響：泰國臺商製造業之研究》指出，我國在泰國的的臺商，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採購策略應採取混合型策略，爭取客戶實質信任，以創造出採購績效；林煜堂《婆羅洲華人與臺灣「新南向政策」的契機與挑戰》指出，兩岸和平共處應該是新南向政策的政治遊戲規則，在此基礎上，婆羅洲島馬來西亞的砂拉越及沙巴，以及汶萊和印尼的加里曼丹等三國都可接受和參與該項政策；盧鈺雯《印尼臺商布局與挑戰》指出，臺商赴外投資前，應廣泛收集與掌握標的國家更多正確的訊息，儘可能降低風險；李明勳《新南向政策下的經貿合作與拓展－成果研析與展望》指出，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後，在貿易、投資、政府開發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的成果研析，並提出未來展望，其中強調不可避免中國因素；唐豪駿《我國 5+2 產業創新與新南向工業 4.0 之合作契機》指出，從工業 1.0 的機器時代、2.0 的電氣化時代、3.0 的自動化時代到 4.0 的智慧化時代，除了生產方式的創新，更帶動生產邏輯的改變。當前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皆已提出該國工業 4.0 的政策，洽與我國 5+2 產業創新計劃有合作的契機；吳惠萍《新南向電商社群網紅新經濟》指出，「跨境電商」為潛力產業中最受看好的產業，由於東南亞各國文化、語言不同等，為了能銷售出商品，必需使目標市場的消費者「看見、瞭解、喜歡」臺灣的商品；林雅鈴《馬哈迪推動新政之臺馬產業合作策略》指出，馬來西亞政府推動國家工業 4.0 政策，以及第 11 大馬計畫關鍵產業，與我國 5+2 產業創新計畫發展不謀而合，唯有雙方產業互補合作，方能創造有利商機；吳玉瑩等著《深化臺菲產業合作之方向與作法》提出，我國與菲律賓在紡織製鞋、機械產業、新興產業、潔淨能源、資訊服務等產業之合作方法；陳鴻穎《審視新南向國家展覽趨勢，洞見我國未來產業契機》分析我國與新南向六國整體辦展狀況，藉以瞭解新南向各國未來趨勢產業；李伯言《深入新南向，台灣新創生態圈的他山之石》分析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創新產業生態，以得出我國新創的他山之石。

綜上所述，新南向政策相關期刊之研究，在研究主題分布方面，以「經貿合作」類為主要研究的範疇，其中又以「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項為多數

專家學者探討的內容，佔總篇數 166 篇的近三成(28%)，另在時間軸上，四類主題之發表自 2016 年至 2018 年除「區域整合」類在 2017 年最多篇，其餘均在 2018 年發表最多篇數，且在 2018 年之後有衰退的現象，在探討主題內容方面，多以臺灣企業要邁出國際前需要瞭解各國的政治氛圍、市場生態與投資環境等，以獲取最有效益之成果。

三、作者特性分布

(一)文獻作者數量分析

表 2 期刊文獻作者數量統計表

發表篇數	作者數	累計作者數	累計作者數百分比(%)	文獻數	累計文獻數	累計文獻數百分比(%)
3 篇	4	4	1.88	12	12	7.23
2 篇	12	16	7.51	24	36	21.69
1 篇	197	213	100.00	130	166	100.00
合著群皆僅發表 1 篇，計 105 位，發表 38 篇。						

總計 166 篇期刊文獻中，總計作者有 213 位，其中以發表 3 篇期刊文獻最多，計有 4 位作者，在總數 213 位作者中，僅佔 1.88%的作者，所發表期刊共 12 篇，佔所有文獻數近約一成(7.23%)；在作者總數 213 位中，超過九成以上(92.49%)的作者，僅發表 1 篇期刊文獻，佔期刊文獻總數 166 篇近八成(78.31%)的比例，詳如表 2。其中，發表 2 篇的主題分布「整體敘述」6 篇、「經貿合作」9 篇、「人才交流」6 篇、「資源共享」2 篇、「區域鏈結」1 篇，合計 24 篇；發表 3 篇的主題分布「經貿合作」4 篇、「資源共享」2 篇、「區域鏈結」1 篇、「人才交流」1 篇、「整體敘述」4 篇，合計 12 篇。

(二)合著數量分布

166 篇期刊文獻，總計 213 位作者中，有近八成(77.11%)的期刊文獻是一人作者，有近一成五(14.46%)的文獻是二人作者，研究主題分別「經貿合作」類 10 篇、「人才交流」類 4 篇、「資源共享」類 4 篇、「區域鏈結」類

2 篇、「其他」類 4 篇；三人合著文獻的佔總數的 3.61%，研究主題分別「經貿合作」類 1 篇、「資源共享」類 4 篇、「其他」類 1 篇；四人(含)以上作者，發表的期刊佔總文獻數的 4.82%，研究主題分別「經貿合作」類 4 篇、「人才交流」類 1 篇、「資源共享」類 1 篇、「其他」類 2 篇，詳如表 3。

表 3 期刊文獻作者合著數量統計表

合著作者數	文獻篇數	百分比(%)
一人作者	128	77.11
二人作者	24	14.46
三人作者	6	3.61
四人(含)以上作者	8	4.82
小計	166	100.00

分別計算各年度文獻篇數與作者人次數，詳如表 4。2016 年為新南向政策規劃階段，平均作者 1.05 人次，至 2018 年平均作者數增加至 1.64 人次為最高峰，之後有衰退的現象。

表 4 期刊文獻平均作者統計表

年代	平均作者數	文獻篇數	作者人次	備考
2016	1.05	21	22	
2017	1.28	50	64	
2018	1.64	55	90	
2019	1.46	37	54	
2020	1.00	3	3	

(三)作者生產力分析

新南向政策從 2016 年初期規劃階段，2017 年推動階段，至今執行近 4 年的時間，研究相關的期刊文獻計 166 篇，期刊文獻生產力較高的計有吳福成、唐豪駿、楊昊、林顯明等 4 位專家學者，各別發表相關期刊文獻計 3 篇，合計 12 篇，具有一共同性均屬社會科學類(詳見附錄 1)。學者吳福成任職台灣經濟研究院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心，擔任該中心副主任乙職，近五年期刊文獻發表計有 30 篇(詳見附錄 2)，其中於 2017 年發表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計有 3 篇，分屬「區域鏈結」、「資源共享」、「經貿合作」類之主題；學者楊昊任職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擔任該中心執行長及該中心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近五年期刊文獻發表(含共同著作)計有 12 篇(詳見附錄 3)，其中發表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計有 3 篇，皆屬「其他－整體敘述」類之主題；學者唐豪駿任職台灣經濟研究院，擔任該院助理研究員，近五年期刊文獻發表(含共同著作)計有 8 篇(詳見附錄 4)，其中發表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計有 3 篇，皆屬「經貿合作」類之主題；學者林顯明現職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於 2017 年 9 月赴比利時魯汶大學跨文化、遷徙與少數族群研究中心(IMMRC)攻讀社會文化人類學雙博士學位，近五年期刊文獻發表計有 21 篇(詳見附錄 5)，其中發表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計有 3 篇，分屬「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其他－整體敘述」類之主題。

綜上所述，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之作者近九成僅發表 1 篇，文獻發表數單一作者以 3 篇為最多，以及發表 1 篇與發表 2 篇、3 篇的主題分布皆為「經貿合作」為多數；在合著方面，有近八成的期刊文獻是一人作者，以及與二人、三人(含以上)合著之主體分布皆以「經貿合作」為多數，此與研究主題分布之結果相同，且作者平均數在 2018 年後也有減少的現象，渠等亦說明了該相關期刊發表之生產力偏低；另外，四位生產力較多的作者，皆任職於相關領域之工作，以吳福成近五年期刊文獻發表有 30 篇居冠，以臺灣經濟完就月刊刊載 15 篇最多，海峽評論、亞洲金融季報分別 7 篇次之，其中，有關「新南向」的有 3 篇，皆刊載於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四、期刊特性分布

本研究蒐集 166 筆期刊文獻分布於 50 種期刊，根據以布萊德福定律 $1:n:n^2$ 之計算公式探討文獻分布，統計每一種期刊所刊登之文獻篇數，並依照篇數多寡遞減排序，詳如表 5。本研究取 166 篇的 $1/3$ 約 55 篇作為分界線，將期刊分布依累積文獻數分為三區，可得前 2 種期刊刊登 61 篇期刊文獻，佔文獻總數的 36.75%，其餘的 105 篇期刊文獻則分布於 48 種期刊。第一區有 2 種期刊，共有 61 篇期刊文獻；第二區有 8 種期刊，共有 56 篇期刊文獻；第三區有 40 種期刊，共有 49 篇期刊文獻。各區期刊種數的比例為 2:8:40，若以布萊德福定律 $1:n:n^2$ 之計算公式，求得 n 值為 4，得出萊德福定律之比值為 $1*2:4*2:4^2*2$ ，等於 2:8:32，本研究比值(2:8:40)與布萊德福定律之數值(2:8:32)不相吻合，說明了相關期刊文獻的數量分布不符合布萊德福定律。另外，由表 5 可觀察出二成的期刊(20%)，能提供七成(70.48%)的相關研究文獻，顯示多數的文獻有集中在少數期刊發表的情形。

表 5 期刊文獻之期刊分布統計

刊載相關 文獻篇數	期刊 種數	累計期 刊數	累計期刊數百 分比(%)	累計文 獻數	累計文獻數百 分比(%)
32 篇	1	1	2.00	32	19.28
29 篇	1	2	4.00	61	36.75
19 篇	1	3	6.00	80	48.19
9 篇	1	4	8.00	89	53.61
6 篇	2	6	12.00	101	60.84
5 篇	1	7	14.00	106	63.86
4 篇	2	9	18.00	114	68.67
3 篇	1	10	20.00	117	70.48
2 篇	9	19	38.00	135	81.33
1 篇	31	50	100.00	166	100.00

表 6 相關期刊文獻前十名期刊

期刊名稱	相關文獻篇數	出版社	刊期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32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月刊
經濟前瞻	29	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	雙月刊
證券服務	19	臺灣證卷交易所	雙月刊
新社會政策	9	台灣新社會智庫	雙月刊
戰略安全研析	6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雙月刊
全球政治評論	6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季刊
發展與前瞻學報	5	社團法人台灣對外關係研究暨發展協會	季刊
會計研究月刊	4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月刊
問題與研究	4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季刊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	3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季刊

由表 6 得知，研究「新南向政策」領域最多之期刊(機構)，刊載前十名期刊依序為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32 篇、經濟前瞻 29 篇、證券服務 19 篇、新社會政策 9 篇、戰略安全研析與全球政治評論皆為 6 篇、全球政治評論 5 篇、會計研究月刊與問題與研究同為 4 篇及農業生技產業季刊 3 篇，其中以雙月刊、季刊為主，以月刊次之。另外，刊載期刊數最多的臺灣經濟研究月刊，係由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出版，該院為臺灣第一個由民間成立之獨立學術研究機關，由辜振甫於 1976 年 9 月 1 日創辦，主要從事國內、國外之經濟與產業經濟之研究，提供政府、企業與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以利國家經濟的發展(台灣經濟研究院)。其次，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社係政府為確保國家經濟穩定發展與持續成長，提出財政經濟改革之措施，資金來源不同於前者，由政府撥款與工商界捐助，成立獨立之研究機構，研究國內外經濟情勢，提出政策建言，備供政府諮詢參考(中華經濟研究院)。

伍、結語

根據上述研究分析，歸納新南向政策從規劃初期至今，近 5 年的時間，有關相關研究文獻之期刊文獻數量成長、研究主題與學科的分布、作者特性與期刊特性分析結果，說明陳述如下：

一、推動初期文獻數量明顯成長，之後有衰退現象

新南向政策自 2016 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開始規劃，2017 年全面推動執行，至今日近 5 年的時間，相關期刊文獻的學術研究發表篇數至 2018 年達到高峰，隨後至今有減緩衰退的現象，文獻成長曲線隨時間呈現不規則變化，屬於非線性動態成長的渾沌理論現象。說明了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現處於沈靜時期，需注入新刺激與動能以激發學術研究能量。

二、主題以「經貿合作」最多、「區域鏈結」最少

新南向學術研究主題分布是以「經貿合作」類最多篇數，佔總篇數的 37%，以「區域鏈結」類最少，僅佔總篇數的 6%；在「經貿合作」類別中，又以「產業合作與經貿拓展」項目最多篇數。

三、作者生產力偏低，多以獨著為主

新南向政策研究在作者整體的分布情形，超過九成以上的作者，僅發表 1 篇期刊文獻，佔期刊文獻總數 166 篇近八成的比例；在作者平均數，自 2018 年後有減少的現象；在合著的分析，二人(含)以上合著期刊數佔總期刊篇數僅約二成三，以一人作者發表的期刊數佔總期刊篇數近八成為多數。

四、以《臺灣經濟研究月刊》刊載最多、期刊分布不符合布萊德福定律，且多數文獻集中於少數期刊發表

總計 166 篇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分布在《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等 50 種期刊中，根據布萊德福定律將文獻篇數大致區分為三區塊，各區期刊種數之比值不符合布萊德福定律所述的比例 $1:n:n^2$ 的關係；其次，研究發現二成的期刊(20%)，能提供七成(70.48%)的相關研究文獻，多數的文獻有集中在少數期刊發表的情形；另外，刊載相關文獻最多的期刊係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出版之《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約佔總篇數的二成。

五、「兩岸關係」既是苦藥，亦是良藥

「兩岸關係好，臺灣才會好」，不可否認新南向政策的推動與兩岸關係的關聯，更不可忽視兩岸關係也間接影響了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的研究狀況。目前新南向相關的期刊文獻在臺灣各領域的研究有趨緩情勢，鑑於推動新南向工作是國家當前重要政策，希冀在兩岸關係、區域經貿整合環境等新刺激下，學術先進能再激起研究漣漪，以利提供相關部門良方建樹。

附錄 1 新南向相關期刊文獻數前 4 位作者

作者	年代	期刊	題目	主題	學科	學經歷
吳福成	2017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新南向政策與海上絲路的競合關係	區域鏈結	社會科學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心副主任
	2017		新南向台灣農業新契機	資源共享		
	2017		從越南經濟連結 APEC 看新南向政策	經貿合作		
唐豪駿	2017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開發新南向的需求市場：以電子商務為例	經貿合作	社會科學	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2019		我國 5+2 產業創新與新南向工業 4.0 之合作契機	經貿合作		
	2020		美中貿易衝突對新南向地區主要國家之影響	經貿合作		
林顯明	2017	新社會政策	臺灣新南向政策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畫：內容、成效與挑戰	整體敘述	社會科學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18		臺灣與新南向 18 國人才交流與互動情形之現況與發展	人才交流		

	2018		新南向國家學生在臺留學之社群媒體使用與社會資本	資源共享		
楊昊	2016	全球政治評論	臺灣新南向政策的格局與路向	整體敘述	社會科學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2017	問題與研究	檢視臺灣的新南向政策：議程、網絡與挑戰	整體敘述		
	2018	問題與研究	形塑中的印太：動力、論述與戰略布局	整體敘述		

附錄 2 期刊文獻發表(作者：吳福成)

項次	篇名	期刊	出版年
1	台灣被蔡政府邊緣邊緣邊緣化－RCEP 實現後對台海兩岸影響的初探	海峽評論	2019
2	兩岸在 APEC 的定位與互動	海峽評論	2019
3	這不是一個華府說了算的世界－評川普藉口改革改變 WTO 開發中國家認定	海峽評論	2019
4	中俄印合作反撲美利堅	海峽評論	2019
5	中美貿易戰催出中俄戰略合作新時代	海峽評論	2019
6	中美貿易戰對「中國製造 2025」之挑戰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8
7	中國共享經濟的政策、創新與挑戰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8
8	政權更替後的馬來西亞經濟政策	亞洲金融季報	2018
9	中俄能源合作戰略新趨勢－以油氣項目為例分析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8
10	CPTPP 最新發展及對亞太經濟整合之影響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8
11	前瞻中國功能農業發展新局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	2018
12	泰國經濟發展的光與影	亞洲金融季報	2018
13	前瞻中國功能農業發展新局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8
14	融入全球價值鏈提高中小企業競爭力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8
15	「亞非成長走廊」與「一帶一路」的競合關係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8
16	印尼－穿透陰霾的赤道一串珍珠	亞洲金融季報	2018
17	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政經意涵－以脫貧、就業和內需為例說明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7

18	緬甸的經濟情勢曲直向前	亞洲金融季報	2017
19	中國服務業發展政策之觀察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7
20	中國創新生態體系政策之觀察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7
21	越南推動品牌價值戰略之觀察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7
22	菲律賓經濟新藍天仍有幾片烏雲罩頂	亞洲金融季報	2017
23	韓國經濟前途多艱	亞洲金融季報	2017
24	從越南經濟連結 APEC 看新南向政策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7
25	新南向台灣農業新契機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7
26	新南向政策與海上絲路的競合關係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7
27	印度經濟的光與影	亞洲金融季報	2017
28	中俄「軟聯盟」劍指美國	海峽評論	2016
29	中國「金融崛起」時代來臨	海峽評論	2016
30	前瞻廈門自貿實驗區與金門對接的機遇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6

我國新南向研究之期刊計量分析

附錄 3 期刊文獻發表(作者：楊昊)

項次	篇名	期刊	出版年
1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打造新型態的行動智庫	新社會政策	2019
2	Unpacking Taiwan's Presen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Issues & Studies	2018
3	形塑中的印太：動力、論述與戰略布局	問題與研究	2018
4	再探東南亞「外援」政治：發展、變革與在地回應	遠景基金會季刊	2018
5	「以人為中心的東南亞政治研究」專號導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2018
6	政治轉型必須以人民為導向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2018
7	檢視臺灣的新南向政策：議程、網絡與挑戰	問題與研究	2017
8	2017 年中共與越南簽署雙公報的戰略意涵	戰略安全研析	2017
9	2016 年越南全國黨代表大會後的政治新局分析	戰略安全研析	2016
10	南海仲裁案的區域效應與轉變中的越南南海戰略	台灣國際法季刊	2016
11	臺灣新南向政策的格局與路向	全球政治評論	2016
12	新南向政策的願景與挑戰	戰略安全研析	2016

項次 5、6、9、12 係共同著作(非第一作者)。

附錄 4 期刊文獻發表(作者：唐豪駿)

項次	篇名	期刊	出版年
1	美中貿易衝突對新南向地區主要國家之影響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20
2	多重威脅結構下的國家行為邏輯：中國戰國時期之同盟策略分析	中國大陸研究	2019
3	我國 5+2 產業創新與新南向工業 4.0 之合作契機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9
4	促進台菲雙邊經貿與產業合作之政策建言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8
5	以西漢前期對胡越之行動檢視攻勢現實主義	政治學報	2017
6	開發新南向的需求市場 以電子商務為例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7
7	區域經濟整合中的新興議題：「政府控制事業」及其對台灣的影響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6
8	中國大陸電信動態觀察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2016

項次 5 係共同著作(非第一作者)。

附錄 5 期刊文獻發表(作者：林顯明)

項次	篇名	期刊	出版年
1	台商回臺投資之政治經濟意涵	新社會政策	2020
2	社群網站與社會資本：比利時臺灣移民使用經驗之初探	資訊社會研究	2019
3	美國印太戰略之發展與臺灣的機會和挑戰	新社會政策	2019
4	證券交易所稅的課徵與廢除(2012－2015)：論述制度主義的觀點	中國行政評論	2019
5	新南向國家學生在臺留學之社群媒體使用與社會資本	新社會政策	2018
6	臺灣與韓國大型造船產業之比較政治經濟分析(1970～2001 年)：從發展型國家到資本主義多樣性的觀點	社會科學論叢	2018
7	歐洲超級多樣性(Super-Diversity)之理論概念與研究啟示	人口學刊	2018
8	從行動通訊技術之發展：論中美貿易衝突與臺灣的機會與挑戰	新社會政策	2018
9	臺灣與比利時博士培育機制之比較	台灣教育	2018
10	臺灣與新南向 18 國人才交流與互動情形之現況與發展	新社會政策	2018
11	當前臺灣產業發展的困境與挑戰：兼論新內閣團隊的政策方向	新社會政策	2017
12	臺灣新南向政策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畫：內容、成效與挑戰	新社會政策	2017
13	九二共識的變遷與延續：從新制度主義到論述制度論的觀點解析	國家發展研究	2017
14	Bernard Williams 之哲學觀點：論其對效益主義與價值 多元論的看法與評析	新社會政策	2017
15	國際氣候變遷治理之國家義務與協議強制性：從 COP1 至 COP21	新社會政策	2016

16	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	全球政治評論	2016
17	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之研究	新社會政策	2016
18	臺灣農村農業轉型之研究－高雄美濃為例	兩岸基層選舉與 地方治理研究通訊	2016
19	重大議題融入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之實踐 與省思：以太陽花學運為例	新社會政策	2016
20	女權即是人權：從校園懷孕女學生個案反 思臺灣女性人權	性別平等教育季 刊	2016
21	兩岸新世代生產模式的發展和挑戰：臺灣 生產力 4.0 與中國製造 2025	新社會政策	2016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一、專書

朱宏源(2004)。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縣：正中書局。

何光國(1994)。文獻計量學導論。臺北市，三民書局。

蔡明月(2003)。資訊計量學與文獻特性。臺北市：華泰文化。

二、期刊

王珍一、林明宣、林郁芬、李政雄(2019)。採購策略與供應商關係對採購績效影響：泰國台商製造業之研究。**致理學報**，第 39 期，311-354。

朱英嘉、莫桂娥(2019)。兩岸關係下，台灣新南向觀光政策的發展及困境。**發展與前瞻學報**，第 23 期，73-92。

江懷哲(2018)。邁向「三維」的新南向政策－國內轉型、區域參與、大國鏈結。**新社會政策**，58 期，39-44。

吳玉瑩、盧鈺雯(2019)。深化臺菲產業合作之方向與作法。**經濟前瞻**，181 期，98-102。

吳惠萍(2019)。新南向電商社群網紅新經濟。**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2 卷第 2 期，89-98。

李伯言(2019)。深入新南向，台灣新創生態圈的他山之石。**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2 卷第 1 期，98-104。

李明勳(2019)。新南向政策下的經貿合作與拓展|成果研析與展望。**新社會政策**，62 期，10-18。

林巧敏(2009)。臺灣地區資訊組織文獻書目計量分析。**圖書資訊學刊**，第 7 卷第 1/2 期，101-123。

林巧敏、范蔚敏(2010)。臺灣地區檔案學文獻計量分析。**圖書與資訊學刊**，第 2 卷第 1 期(72 期)，16-38。

林偉翔、林雯瑤(2012)。北市醫學雜誌之書目計量分析。**北市醫學雜誌**，第 9 卷第 1 期，45-60。

- 林雅鈴(2019)。馬哈迪推動新政之台馬產業合作策略。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2 卷第 2 期，24-32。
- 林煜堂(2019)。婆羅洲華人與台灣「新南向政策」的契機與挑戰。淡江史學，31 期，115-136。
- 林顯明(2018)。臺灣與新南向 18 國人才交流與互動情形之現況與發展。新社會政策，第 57 期，52-67。
- 唐豪駿(2019)。我國 5+2 產業創新與新南向工業 4.0 之合作契機。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2 卷第 2 期，15-23。
- 唐豪駿(2020)。美中貿易衝突對新南向地區主要國家之影響。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3 卷 2 期，86-92。
- 張瀚文(2004)。大學圖書館專業期刊研究主題之比較研究：以《大學圖書館》與《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為例。大學圖書館，8 卷 2 期，76-93。
- 張瀚文(2006)。臺灣地區新聞學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引用網路資源分析。圖書與資訊學刊，第 56 期，74-95。
- 莊文忠、張順全(2013)。公共行政領域碩士論文主題與方法的研究趨勢—多層次分析觀點。公共行政學報，第 45 期，75-108。
- 陳尚懋、劉泰廷、林珮婷(2019)。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在泰國的實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5 卷第 4 期，153-174。
- 陳欣欣(2020)。從新聞產製談新住民女性刻板印象研究。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8 期，167-195。
- 陳琮淵彙整(2017)。「新南向政策與智庫建設」青年學者論壇。臺灣東南亞學刊，12 卷 1 期，137-164。
- 陳鴻穎(2019)。審視新南向國家展覽趨勢，洞見我國未來產業契機。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2 卷第 1 期，90-97。
- 游忠諺、謝建成(2017)。電子資源資料之書目計量研究—以癌症研究為例。技術學刊，第 32 卷第 1 期，61-89。
- 楊書菲(2017)。中國大陸對東協經貿佈局戰略對我推動「新南向政策」之機會與挑戰。經濟前瞻，170 期，105-110。
- 過子庸、金士懿(2018.12)。對我國「新南向政策」目標國的研析。發展與前瞻學報，第 22 期，49-73。

蔡明月、徐韻婷(2009)。臺灣與中國大陸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論文之主題分析研究－以 1997-2006 年為例。**圖書與資訊學刊**，第 1 卷第 3 期(第 70 期)，17-38。

蕭新煌、楊昊(2016)。新南向政策的願景與挑戰。**戰略安全研析**，第 136 期，6-13。

戴慧紋(2018)。我國新南向創業策略方向。**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1 卷第 10 期，79-84。

譚瑾瑜(2017)。新南向政策之展望。**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0 卷第 2 期，15-21。

關曉光、王靜逸、袁宏績、羅薪又(2018)。印尼 2014 年所頒放流水邊準之導讀。**中興工程**，第 139 期。

三、網路資料

尹賽楠(2020.10.20)。劉結一主任在第 23 屆京台科技論壇上致辭(全文)，中國臺灣網：

http://www.taiwan.cn/xwzx/la/202010/t20201020_12302247.htm。檢索日期：2020/11/9。

王梅玲(1995.12)。布拉福定律。國家教育研究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3032/>。檢索日期：2020/4/28。

吳福成(2016.8.1)。新南向政策機遇與挑戰之研析(貿易政策論叢)。台灣經濟研究院：

<https://www.tier.org.tw/achievements/pec3010.aspx?GUID=c38a28fb-685d-41fa-9ef8-7c47417f8984>。檢索日期：2020/6/10。

張瀚文(2012.10)。文獻成長。國家教育研究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896/>。檢索日期：2020/4/27。

陳昱旗(2017.8.11)。觀點投書：兩岸對抗讓新南向真成難向！，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312226>。檢索日期：2020/11/9。

創立緣起。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s://www.cier.edu.tw/about/origins>。檢索日期：2020/6/10。

創立緣起與願景。台灣經濟研究院：

<https://www.tier.org.tw/intro/abouttier.aspx>。檢索日期：2020/6/10。

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www.airitilibrary.com/Home/Index>。檢索日期：

2020/4/2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多邊組第二科(2019.3.14)。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現況－國家一覽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767&pid=339851&dl_DateRange=all&txt_SD=&txt_ED=&txt_Keyword=&Pageid=0。檢索日期：2020/6/10。

葉芳瑜(2018.3.26)。「新南向政策」與「一帶一路」發展現況－對我國全球經貿戰略布局之影響。科技政策觀點：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85>。檢索日期：2020/4/23。

賴錦宏、沈婉玉、戴瑞瑤(2020.5.12)。台商看新南向：東南亞無法改變兩岸供應鏈，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121092/4556773>。檢索日期：2020/11/9。

英文部分

Bernick, E., & S. Krueger (2010). An assessment of journal qualit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3, 98-106.

Bingham, R. D., & W. M. Bowen (1994). “Mainstream” public administration over time: A topical content analysi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4(2), 204-208.

Bradford, S. C.(1948). Documentation (Landon: Crosby Lockwood).

Forrester, J. P. (1997a). The rich diversity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s: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s, Part1.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1(1), 3-26.

Forrester, J. P. (1997b). The rich diversity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s: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s, Part2.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1(2), 209-226.

Forrester, J. P., & S. S. Watson (1994). An assess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s: The perspective of editors and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4(5), 474-482.

Houston, D. J., & S. M. Delevan (1990).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 assessment of journal public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0(6), 674-681.

Perry, J. L., & K. L. Kraemer (1986).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75-1984.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6(3), 215-226.

Raadschelders, J. C. N., & K. H. Lee (2011).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mpirical and qualitative observations f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0-2009.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1(1), 19-33.

Stallings, R. A., & J. M. Ferris (1988).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Work in PA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8(1), 580-587.

Streib, G., B. J. Slotkin, & M. Rivera (2001).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from a practitioner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1(5), 515-525.

Wright, B. E., L. J. Manigault, & T. R. Black (2004).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asure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 assessment of journal publication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35(6), 747-764.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復興崗學報」徵稿簡約

本學報為本院綜合性學術刊物，園地公開，每年出版 2 期，各於 6、12 月出版。敬邀各界人士踴躍賜稿。相關事宜如下：

一、徵稿論文範圍：

以軍事社會科學(軍人、軍隊及其與社會關係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領域)為主，本學報置重點於此一領域之軍事社會學、軍事心理學、軍事倫理學、軍事政治學、軍隊社會工作、軍事新聞、軍事應用藝術、軍事管理學，以及相關領域之政治作戰、全民國防、中國大陸等主題的研究。

二、審稿原則：

- (一) 來稿收到後，由編輯組邀請相關專長領域學者兩位雙向匿名審查，並請其提出建議：(1)採用；(2)修正後採用；(3)修正後再審；(4)不採用。
- (二) 審查結果，如兩人均不採用，或一人不採用、一人修正後再審，則不採用。如兩人意見不同，則送第三人審查，以作決定，審查標準評定原則如下表。

審查人 1 審查人 2	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再審	不採用
採用	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再審	送第三審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採用	修正後再審	送第三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不採用
不採用	送第三審	送第三審	不採用	不採用

備註：第三審如為不採用或修正後再審者，即不予採用。

- (三) 來稿如果經過審查人建議「不採用」，本學報將附上審查意見請作者參考。作者如對審查意見持有異議，可具陳反駁意見。本學報將在編審委員會會議中討論議決，並將結果告知作者。
- (四) 完成審查並修正流程之「採用」、「修正後採用」、「修正後再審」稿，經本學報編審委員會議定稿後，將決審意見表送請作者查照。建議修改之稿件，作者如未能於期限內修改完成，本學報保留是否刊登之決定權。

- (五) 若稿件之內容涉及軍事機敏性，需要修正而作者不同意修正者，恕不採用。

三、稿件規範：

- (一) 來稿請依復興崗學報「註釋體例」撰寫，格式不符者，本學報有權退回，要求修改後再予受理。撰寫格式請參閱本院全球資訊網站(<https://www.fhk.ndu.edu.tw>)。
- (二) 投稿中、英文均可，每篇以 8 千至 2 萬字為限(含註釋)。
- (三) 本學報不接受已刊登之作品，並不得一稿多投；若經發現或被檢舉確有此情況者，列入永久拒稿名單。
- (四) 文稿引證資料務必註明出處，不得抄襲，文責自負；保證無涉及侵權情事。
- (五) 論文若由學位改寫者，須於文中註明「本文為碩、博士論文改寫」；若由研究專案改寫者，亦須於文中註明「研究計畫名稱及獎補助單位」。
- (六) 論文首頁註明：中英文論文題目、姓名、摘要(500字以內)及關鍵詞(不超過6個)。並請檢附作者真實姓名、學歷、單位現職、聯絡地址、電話及 E-mail。
- (七) 作者可以註明希望迴避之評審委員兩位。

四、本期刊採雙向匿名審查及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之限制。來稿請至國防大學校務資訊系統(<https://mis.ndu.edu.tw>)→「雜誌期刊系統」辦理線上報名投稿。

五、經採用之稿件，本刊將酌贈稿酬，並致贈當期出版刊物 1 冊。

六、來稿一經刊登，版權暨著作權即歸本學報所有，轉載須經本學報同意。惟作者可自行彙集其作品編印出版，但應註明已刊載於本學報。

*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學報承辦人王小姐，電話：02-28925125

E-mail：ndufhk@ndu.edu.tw, ndufhk@gmail.com

敬愛的讀者：

謝謝您對本學報的愛護與支持，為加強對讀者提供更完美的服務，請詳填下列各欄，寄回本院學報編輯部，本編輯部將依您寶貴意見，不斷追求進步與更新內容。

一、您的職業：

☐軍 ☐公 ☐教 ☐工 ☐商 ☐學生 ☐其他

二、您的最高學歷：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其他

三、您從何得知本學報：

☐書局 ☐圖書館 ☐學校 ☐其他

四、您對本學報的滿意程度：

1. 文稿內容：☐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_____

2. 編輯校對：☐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_____

3. 紙張印刷：☐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_____

4. 封面設計：☐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建議：_____

5. 您給予我們的批評與建議：

